



石地著

# 古代治国智慧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大大小小数十个朝代，这些朝代或更迭交替，或同时并存。每个朝代，都有或长或短的生存历史，都有一套治国治民的做法。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古代治国智慧

ISBN 978-7-89900-345-9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阮琳越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http://www.dajianet.com)

E-mail : [kf@mail.wpcsh.com](mailto:kf@mail.wpcsh.com)

电话：010-58110486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5年12月 第1版

字数：95000

定价：2元

## 序言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大大小小数十个朝代，这些朝代或更迭交替，或同时并存。每个朝代，都有或长或短的生存历史，都有一套治国治民的做法。

老子曾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同是“烹小鲜”，有的是色、香、味俱佳，令人百尝不厌；有的却是平平淡淡，令人浅尝辄止。何以有此差别？根本原因，乃操厨者技艺差别所致也。

同是“治大国”，有的是百业俱兴，仓廩丰实，货充物足，民乐其业；有的却是百业凋零，府若悬磬，饿莩遍地，哀鸿遍野。何以有此差别？重要原因，乃为政者治国谋略优劣所致也。

治国谋略，顾名思义，即与治理国家有关、对治理国家有益的谋略。然而，国家机器是复杂的，国家事务是繁多的，这就使治国谋略的内容呈现为一副色彩缤纷、内容丰富的生动画卷。

封建帝王是一国的首脑，其自身的明智与昏庸，对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有直接影响。一些有头脑有眼光的帝王，在巩固自己统治方面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例如春秋时的晋文公，先用帮助周襄王重执朝政并辞功不受赏的行为，告诉本国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再用坚决兑现“只攻打原国三天”的承诺的行为，教育百姓要讲“信”。又用自身对“礼”的遵守，教育百姓要守“礼”。晋文公教民的谋略确有令人深思之处。再比如北魏时，孝文帝为推进拓跋族汉化进程，决意将首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但当时很多目光短浅的贵戚重臣都加以反对。孝文帝便用占卜、制造迁都舆论，再向近臣秘密交底以争取臣下的支持，又借南伐的名义实现了迁都计划。整个过程体现了孝文帝的聪明睿智。

帝王明智,然于国有益。如果帝王不那么明白,贤臣智者对他们进行开导劝谏自然又是保持国家安定的重要事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有效的策略。春秋时期,郑国的子孔掌握了国家大权。子孔制定盟书,要百官绝对服从自己。众人不愿服从,子孔便要将他们杀掉。这时子产站出来,向子孔讲明了这样做的危害,劝他把盟书烧掉,此为“理谏”。后来,子皮执掌国政,想把封邑交给不懂得治理的家臣掌管。子产又用“漂亮的绸缎不能交给不会做衣服的人去练手”的比喻,使子皮懂得了封邑比绸缎珍贵得多,不能轻易付人的道理,此为“喻谏”。战国时,庄子与赵惠文王论剑,其中却蕴含着极具说服力的道理,此为“寓谏”。西汉时,吕后欲诛杀功臣,酈商巧妙地将参与其谋的审食其说服,使他劝说吕后改弦更张,此为“借人谏”。此外,还有“归谬谏”、“智谏”、“反谏”、“讽谏”等等。每一种劝谏方式,都反映了谏者的智慧及语言艺术。

如何处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也是治国的大事。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当政的君王臣子们也用了不少心计。春秋时,卫国大夫石蜡为了国家的安宁,利用陈国的力量诛除了自己的儿子和祸国殃民的州吁。东晋时,谢安采用拖延的办法,巧妙地阻止了桓温篡位。南朝陈时,毛喜利用“欲擒故纵”的手段粉碎了武人韩子高的图谋不轨。北宋初,赵匡胤通过一顿宴席成功地将兵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即人们熟知的“杯酒释兵权”。元朝时,王著设计诛除奸相阿合马。明武宗时,杨一清巧妙地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诛杀了惑乱朝政的刘瑾。凡此种种,体现了谋略在处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作用。

如果说中央政权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地方政权就是国家政治肌体的肢干。对地方的治理谋略同样是治国谋略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例如西汉时,赵广汉治理颍川,对地方豪强采用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将其分而化之、化而治之的策略,确保了一方

的安定。东汉时鲍永在鲁郡利用祭祀孔子的机会，解除危害地方平安的地方武装。羊续任庐江太守，身穿便服，到民间做调查研究，掌握治理地方的第一手资料。南朝宋明帝时，王敬则利用人们对鬼神的迷信将暨阳县的劫匪一网打尽。

我国自古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正确的政策、适当的策略，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定的大事。在这方面同样有很多事例。最著名的是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之事。五代时，马希范在溪州立铜柱，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习俗取信于民。明朝弘治年间，郭绪受命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调解民族纠纷。郭绪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取信于民的诚、不畏艰险的勇、随机应变的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治国谋略的内容如此丰富，决定了其所牵涉的人才面的广泛。那些为治国出谋划策的人，不仅有明智的君王，还有大臣、武将、士人、地方长官等。

从本质上讲，封建时代的治国谋略，是为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服务的。有两个例子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本质属性。战国时期，有一次秦襄王患病，百姓为他恢复健康而祀祷神灵。

秦襄王不但不感谢，反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秦襄王在解释为什么如此时说：“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对他们有仁爱之心，而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为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以收其心。如果真是这样，——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这充分反映了统治者不欲使民爱而敬之，而是想让民畏而从之。这反映了统治者治国谋略的治民本质。西汉武帝时，欲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为太子。当时弗陵年幼，其母正当年。汉武帝怕自己死后出现子幼母壮、母后于政的

局面，便设谋将钩弋夫人杀害。汉武帝基于历史教训，立子而杀其母，完全是为了确保刘氏政权的安稳。

我们在揭露了统治者治国谋略的阶级实质后。并不是说这些谋略丝毫没有可肯定之处。相反，我们认为其中的许多谋略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治国讲究谋略，可使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如十六国前秦时，王猛辅佐苻坚治国，采用擒贼擒王的策略，整顿吏治，打掉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豪强贵戚。苻坚高兴地说：“我今天才体会到作帝王的尊严。”正是由于中央集权加强了，出现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的局面，自国都长安至于诸州，“夹道树槐柳，二十里——亭。四十里一骑，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苻坚载记》)。百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活，自然要比动荡战乱下好得多。

治国讲究谋略，在某种情况下也使百姓得到实惠。例如东汉时的廉范治蜀。在廉范任蜀郡太守前，前任太守历来禁止百姓在夜间劳作，怕照明之火引起火灾。百姓为了生计，夜间偷着干活，结果火灾更多，廉范取消了禁令，但要求百姓干活同时储备灭火之水。结果既减少了火灾，又便利了人民生计。

治国讲究谋略，谋略需要智慧，这是我们历览古代治国谟略得出的一个启示。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谋略与智慧下可能完全适用于观在。但今天要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使人民更加富裕，我们仍需要谋略与智慧，而且是全民族的谋略与智慧。

## 第一章 谏官谏用谏官（上）

谏官是皇帝制度的产物，是专为劝谏皇帝而设置的。

谏官是朝廷政治的一角镜子，谏官所谏之内容，必是朝廷有缺陷的地方。

比如，谏官要求减轻赋税，则说明国家赋税很重；谏官劝皇帝远离女色，则说明皇帝终日混于后宫脂粉，荒废朝政。以此类推，谏官要求重用谏官，则说明谏官已被皇帝视为可有可无了。

唐朝中后期，谏官不再受重视。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元稹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元稹就谏官的职任问题上书皇帝，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邦与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玩，还是寢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现在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究当前的政治措施，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谏官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时，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唐宣宗听后，似有愧意。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继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通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的到吗？

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

元稹还举出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例子，“太宗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大臣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太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们唯恐自己讲的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这是太宗认为顺心适意的事时候，侍卫们只好互传食物充饥，不仅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遭后人讥笑，费力不讨好。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情理啊！”

杜黄裳最后总结说：“一般来说，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诳骗他们的君主，上下不能同心，要以这样的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 【简评】

中国有句古话：“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意思是：厨子虽然没有完成厨房里的工作，但掌管祭祀的人也不会放下自己的事，而去代替厨师的工作。

国家之事，就要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使各种人才执掌各执能部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作为一国之君，对国家政务，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事必躬亲，也是一种越俎代庖。其结果一是使他自己忙不过来，二也会使大臣们由于皇帝的过分干涉而产生不被信

任的心理。

杜黄裳的分析及主张，对我们今天恐怕也有借鉴作用吧！

## 裴咱巧计捕从史

趋甘避苦，是一般人的正常选择。人都愿意尝甜头，而不愿意吃苦头。

了解到这一点，有的人算计他人时，便先以甜头为饵，引诱之，麻痹之，最后惩罚之。

唐朝裴垪诱捕卢从史便是如此。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遇到父亲去世而退官守丧，朝廷很长时间没有再起用他。卢从史心中很害怕，便通过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劝说宪宗，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并请求让自己调发昭义的军队前去攻讨叛贼王承宗。

宪宗依从了卢从史的请求，起用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命他率领昭义本部军队前去进攻王承宗。

卢从史虽然第一个提出讨伐王承宗，但他对朝廷长期没有起用他，心存不满，所以，及至朝廷发兵以后，卢从史却停留不前，不肯进兵，暗中却与王承宗互通计谋，让自己的将士暗地里在怀中揣着王承宗的行军标记，以便双方互相照应，避免相互交战；卢从史让粮草官抬高粮食和草料的价格，以便破坏度支的军需供应，并上奏诬告各道兵马与王承宗勾结，不赞成进兵；又派人到处散布说：王承宗防守严密，易守难攻。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并暗示朝廷任命自己为平章事。

前方战事不利，宪宗和宰相裴垪十分忧虑。这时，正巧卢从史

派遣牙将王翊元入朝奏事。裴珀很想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于是就王翊元引至一旁，与他密谈。裴均首先对王讲述了作为人臣应有的义理，不能认贼作父，作有害于国家的事。王翊元被打动，并表达了对朝廷的诚意，将卢从史暗中的所作所为一一讲了出来。裴珀命令王翊元马上回到营中，不要露任何声色，暗中联络故旧，以孤立卢从史。

裴珀在掌握了全部情况以后，向宪宗上奏献计，择时捉拿卢从史。裴珀说：“卢从史诡计多端，骄横凶暴，肯定要发动变乱。现在听说他在吐突承璀的对面扎营，将吐突承璀当作婴儿一般，十分轻视，在两营之间往来，全然不设置防备。如果失去现在的机会，不将他拘捕起来，以后即使征集大批兵马前去讨伐，也不可能轻易的在短时间内将他平定。”

宪宗起初感到很惊讶，心想：下命令拘捕自己刚刚任命的左金吾大将军是否合适？因此，犹豫不决，迟迟没有下诏。

裴珀据理力争，并把王翊元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宪宗，宪宗这才下定了决心。

裴珀在得到了皇帝的允诺以后，立即派人到吐突承璀营中，授计诱捕卢从史。

卢从史生性贪婪，吐突承璀按照裴珀所授之计，将许多珍奇的玩赏器物陈列出来，经常邀卢从史来观赏，看他喜欢什么，便逐渐拿来送给他，以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卢从史果然中计，对吐突承璀所赠玩物十分喜欢，对吐突承璀也愈发亲近，丝毫不再存有戒心。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吐突承璀认为条件已经成熟。

一天，吐突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经过商议之后，邀卢从史前来营中听戏，暗中在帐幕后设下了伏兵。

卢从史来到后，由于有了以前的交往，对此次邀请丝毫没有戒意，也没有带几个随从。待卢从史坐定以后，伏兵突然冲了出来，擒获了卢从史，卢从史这才大梦初醒，但为时已晚，被兵士们拉到幕后捆绑起来，押送京城。

裴珀诱捕卢从史一事，首先通过对卢从史牙将王翊元晓之以作为人臣的义理，使王翊元讲出了卢从史的阴谋。裴均又上书奏请宪宗认可。这样拘捕卢从史有理有据，而且名正言顺。

裴珀也了解到卢从史诡诈多端，但有生性贪婪的弱点，于是先让人给他送去很多珍宝，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使其丧失警惕，结果，卢从史终于被他信任的人所生擒。

### 【简评】

致鱼死命者，钓饵也。

致鸟入罗者，诱食也。

致人身亡者，财宝也。

古往今来，以财宝为饵之事不计其数，甘愿上钩之人也数不胜数。设计者以极小的付出钓得大鱼，可谓吃小亏占大便宜。中计者为区区小利而失去性命，岂不亏到家了吗？

## 宣宗树威立制

先秦法家商鞅说过：“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在他看来，力、强、威、德是循环往复的。

唐宣宗是个有威严的皇帝，其威竟令下臣在冬季里汗流浹背。

他的威严来源于何处呢？

唐宣宗晚年颁布诏令，命令各州刺史不得调到其他州做官，凡调动者，必须先到京师长安朝见皇帝，由皇帝当面考察其是否胜任政务，然后再委任官职，这一项规定遂成定制。

宣宗新委任官员，都要叮嘱其要忠于职守，慈善为官。

新任建州刺史予延陵临上任前入朝向唐宣宗谢恩辞行，宣宗说：“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于延陵回答说：“八千里。”唐宣宗说：“你到建州后为政的善恶，朕都知道，不要以为距离朝廷太远就胡做非为！万里之遥就象在台阶之前一样，你知道吗？”予延陵吓得惊恐失措，应对错乱，唐宣宗抚慰他并让他出宫。

定下此制度后，宣宗希望大臣严格执行。宰相令狐绹曾经将其故旧迁任邻州刺史，未到京师就顺路赶到任所上任。唐宣宗见到这位刺史所上的谢恩表文，就其不到京师朝见皇帝一事询问令狐绹，令狐绹回答说：“因为所迁州治任所较近，所以没来长安，以省去迎送的礼节。”唐宣宗说：“朕以天下各州刺史大多用非其人，成为百姓的蠹害，所以想一朝见，当面询问他们上任后的施政方略，以知道他们的优劣，便于对他们进行升降黜陟。然而，我的诏令既然已经颁布，你却废弃搁置不用，看来宰相有权也真是可畏！”

令狐绹怕皇帝以无视圣旨而怪罪自己，吓得浑身发抖。当时天气很寒冷，令狐绹竟至汗流浹背，连几层衣服都湿透了。

唐宣宗临朝听政，从来无倦意。每次宰相奏对政事，近旁设有

一个人站立，其威严的神态令人不敢仰视。令狐绹曾对人说：“我当了十年宰相，操掌政柄，最得皇上的恩遇，但每次与皇上奏对政事，没有不汗流沾衣的！”

每次在宰相奏事完毕后，宣宗忽然会怡然放松地说：“我们可以谈些闲话了！”接下来就问宰相们街道闾巷的细微事，有时谈论宫禁中游宴的事，凡琐絮之事无所不谈。

唐宣宗聪明细致，沉着果断，用法不徇私情，能虚心纳谏，从谏如流，不轻易将官位赏人，谦恭谨慎，生活节俭，爱护百姓的财物，所以，在唐宣宗统治时间，政治比较清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有人对他思念歌咏，称唐宣宗为小太宗。

唐宣宗因各州刺史大多“用非其人”，有的甚至成为百姓的祸害，因而立下了刺史调任，须首先进宫，由皇帝亲自考察，看其能否胜任政务这样一种制度。希望部下严格执行。宰相令狐绹故旧迁临州任刺史未进京朝见皇帝事，宣宗认为这是对皇帝颁布诏令的轻视。“宰相有权也真可畏！”一句话，示意令狐绹，这种作法是无视皇帝权威的行为。

此后，宰相们对国家大事，再不敢私作主张。

### 【简评】

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

同是权威，立威之途各异。

商纣王暴虐，对臣下动辄截肢、剖腹、炮烙，此为以酷立威。

三国吴皓，滥杀大臣，生杀任性，此为以杀立威。

唐宣宗严格执行刺史能力考察制，对他们亲自考察，根据他们的优劣决定升降，此为以严明立威。

凡是权威都可畏，但有的权威令人畏而不服。

只有令人畏而心服的权威才可长久维持。

## 巧用间计除盗贼

《利、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这是指在军事战争中能够做好对敌方的宣传、瓦解工作，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是如此，缉盗也是如此，唐代的崔安潜在蜀地缉捕盗贼中，就是用了《孙子兵法》中的攻心战术。

西川地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地方治安很乱，盗贼很多，居民家中的粮食、财物、牲畜经常不翼而飞，人们怨声载道，希望官府有人出面治理一下。

西川的前几任官吏不是因为没能力治理盗贼问题就是官匪相通，因而使困扰当地居民的盗贼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也因此都被罢了官。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崔安潜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任一段时间，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以外，没有提及盗贼扰民问题，蜀中人感到很奇怪，私下议论说：“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是也没有看到咱们的新官对盗贼问题有什么处理的新方法，莫非又与以往的官吏一样，老百姓的生活真难啊！”有人把这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报告给了崔安潜。

崔安潜听后淡淡的一笑说：“这里的盗贼扰民问题的确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以往盗贼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捕盗官吏的通

容，以致使盗贼久禁不绝。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办法去捕盗，派很多人去搜捕，等于用拳头打跳蚤，我们在明处，盗贼在暗处，来无影，去无踪。况且，盗贼脑门上也没有写着自己是盗贼，因此，派人进行大规模搜捕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徒劳无益。这也是以往官吏禁盗贼而不见效的原因。”

崔安潜又说：“对待这里的盗贼必须有个万全之策。”他对下人耳语了一番，让下人按照自己的吩咐去准备。

初五这天，崔安潜拨出节度使府库钱一千五百缗，分别放置在成都蚕市、药市、宝市三处闹市，在市上张榜，称：“有能告发并逮捕一个盗贼者，赏钱五百缗。盗贼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行窃，必定有同伙，若同伙告发可以释免告发者罪，和平常人一样领赏，希望大家奋勇缉盗，绝此祸患。”

这一招果然奏效，告示贴出不久，就有人捕获盗贼来到官府，盗贼不服，说：“你与我同伙为盗已十七年，赃物都是平分，你怎么敢逮捕我，即使到官府，你与我一样，也要被处死。”盗贼抱着与以前的同伙同归于尽的想法来到蚕市。

告示贴出以后，为了验证自己的计策，崔安潜经常骑马到三市巡视。

崔安潜看到一个人押着另一个人来到蚕市，被押解的人还有些不服气。于是，对盗贼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何不将你的同伙逮捕送官府，如果你这样做，他就该处死，你就该受到奖赏了。现在你既然被他先告发，还有什么话好说！”捕贼的人立即得到了赏钱。赏金当着盗贼和围观群众的面当场兑现，盗贼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围观的群众拍手称快，赞叹节度使除盗贼的新方法。

盗贼被押到市上刷死，并诛灭其一家。此事传出以后，诸盗贼

与他们的同伙互相猜疑，惶惶不可终日，在成都无容身之地，纷纷逃离西川，有的洗心革面，不再操旧业。从此，西川境内盗患大减。

### 【简评】

盗贼之为惯贼，是为利所驱；以利诱之，张榜悬赏，使其同伙互相告发，则又是巧用反间之计。崔安潜吸取以往大队人马缉捕而又劳而无功的教训，几乎不用一将一卒就使蜀地消除盗贼祸患，确是令人拍案称道。崔氏计谋的缜密、精妙之处，还在于他公开在街市上颁赏，使告发者与被告发者分别得到了不同的发落，从而让广大的群众知道官府的公平与言而有信，使捕盗的工作更能够广泛开展，这也是善于用计者之所为。

## 张承业果断定大计

现如今，有谁再说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只能给他得50分。因为吃饭除了填饱肚子之外，的确还有许多其它功能。

大腹便便的老板们，坐在饭桌前大谈生意经，很多买卖在杯盏交错间成交。饭桌已成生意场。

一对新婚伉俪，摆下丰盛宴席，请来所有宾朋亲友。此时宴席已成为主人的新婚发布会。

此外，吃饭可交友，可行贿，可斗富……

五代时的张承业，利用吃饭解决政治问题。

公元908年，晋王李克用头上生出毒疮，病势沉重。他知道自己的病已无法治了，就把担任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的

李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玠，掌书记卢质等亲信招到病榻前，吩咐他们同心合力，辅佐他的儿子、晋州刺史李存勖继承王位。李克用说：“这孩子眼光远大、心胸宽阔，一定可以完成我的事业，你们要好好协助教导。”临终前，他对李克宁和张承业说：“我把亚子托付给你们了！”亚子，是李存勖的乳名。话刚说完，李克用就逝世了。李克宁是李克用的弟弟，他接管了王府军政，无论内外，没有人敢乘机闹事。

李克宁长期手握兵权，位高权重，有兄终弟及、接替李克用官爵的可能性。当时，晋军与后梁对峙，军事形势严重。将领们认为李存勖年纪还轻，威望不足以服众，很多人交头接耳，私下议论，军心震荡不安。李存勖见此情景，心中恐惧不安，便请求把官爵让给叔父李克宁。李克宁不接受，对他说：“你是嫡长子，理应继承，何况又有先王的命令，谁敢违抗！”文武官员打算参见李存勖，李存勖正在灵柩前悲哀哭泣，不能马上出来。张承业原为宦官，事奉李克用十分忠心，又受李克用托孤之命，感到情势严峻，便到灵堂对李存勖说：“最大的孝，是完成你父亲未竟的大业，光哭有什么用！”于是他扶李存勖出来，登上公堂，正式就任河东节度使和晋王的爵位。李克宁率各将领叩头祝贺，李存勖把军政大事，全都交给李克宁处理。

起初，晋王李克用收养了很多勇士健儿，当作义子，对他们的宠爱和待遇，跟对亲生儿子一样。现在，李存勖继承了官爵，其他义子的年龄都比李存勖大，而且都手握军权。他们据功自傲，并不把新王放在眼里。有的声称有病，在家疗养；有的不服统领，看见新王也不行礼。李克宁手握大权，地位尊贵，军心都盼望他能继承王位。义子李存勖，这时便暗中游说李克宁，说：“兄死弟及，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何况，叔父向侄儿叩头称臣，在道理上怎么说得过去！上天把机会交给你，你却拒绝，后悔时恐怕就来不及了。

”李克宁喝斥他说：“不许胡言！我们李家，世世代代以父慈子孝闻名于世。先王的功业只要能交给合适的人继承，我还要求什么！你不要挑拨离间，看我不砍下你的人头！”李存颢见此，也就再没吭声。李克宁的妻子孟氏，性情刚愎强悍，义子们就纷纷派妻子到李克宁家游说孟氏。孟氏贪图荣华富贵，见有这么多人拥护，就同意了。她害怕阴谋泄露会招来大祸，所以不断催逼李克宁早点下手。李克宁性情软弱，缺乏主见，被这些人日夜包围煽动，不能不有点动心。而李克宁又跟张承业、李存璋的意见不合，屡次对二人讥消斥责。他对李存昂的态度也变得不如以前那么恭顺了。不久，李克宁擅自诛杀了都虞侯李存质。李克宁又请求另行设立大同节度使，由自己统领，管辖蔚(今河北省蔚县)、朔(今山西省朔州市)、应(今山西省应县)三州。李存勖都听从他的决定，没有表示反对。

李存颢等人见时机渐渐成熟，便为李克宁设计政变的行动方案：利用李存勖到李克宁家的机会，发动政变，诛杀张承业、李存璋，拥护李克宁为河东节度使，献出河东的九个州府，投降后梁。生擒李存昂、连同太夫人曹氏解送大梁。这一计划确定后，李克宁就开始行动了。太原人史敬镕，从小追随李克用，一直在手下做事，很受宠爱信任。李克用死后，他对李克宁也很恭敬。李克宁打算探知王府秘密，觉得史敬镕可以依赖，就把他召来，把秘密计划告诉他，许诺事成后将有重赏。史敬镕表面上承诺合作，但一进王府，便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太夫人曹氏。曹氏大惊失色，立刻召见张承业，指着李存勖对他说：“先王握着这孩子的双臂交给你们，让你们尽力辅佐。如果听到外面政变的阴谋，打算改变立场，那我只求你把我们母子安置一个地方就心满意足了，不要把我们送到大梁，其他不敢多求！”张承业惶恐，急忙说：“老奴即令一死，也会奉行先王命令的，太夫人怎么说这种话？”李存勖这才把李克宁的阴谋告诉他，并且说：“骨肉至亲，不可以互相残杀，我如果辞位让爵，大乱就可以避免。”张承业说：“你想得太简单了。李克宁打算

把大王母子投入虎口，你以为把爵位让给他就没事了？你一旦失去兵权王位，那就等于缚住手脚让人杀戮。如果不把李克宁除掉，大祸是无法避免的。”李存局这才下定决心。他召李存璋、吴珙，及义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命令他们暗中作反政变准备。张承业对具体方案作了周密安排。

李存勖在王府大庭摆设筵席，大宴各军将领。待到酒过三巡，李存昂发出暗号，伏兵一跃而起，就在座位上逮捕李克宁、李存颢。众人一阵慌乱，但见戈甲森严，谁也不敢乱动。李存勖宣布了李克宁发动政变的罪行，并痛哭流涕地数落李克宁说：“侄儿一开始就把官爵让给叔父，是叔父自己拒绝的。而今，大事已定了，为什么要用这种阴谋，忍心把我们母子送交仇人之手？你为什么这样做呀！”李克宁到了此时，真是无言以对，只是说：“这都是野心小人煽风点火。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当天，李克宁及李存颢就被处死了。此事距李克用临终托孤，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李克宁最初接受晋王李克用嘱托时，对李存勖还是忠诚恭顺的。但后来却惑于权位、外受野心小人之煽动，内溺愚圃悍妻之骄横，阴谋政变，终至事泄被诛。张承业同受托孤之命，始终如一，在事情的关键时刻，识大局、明大体，果断处事，终于使新即位的晋王地位得到巩固。他的果断和明智，显示出一位老臣丰富的宫廷政治斗争经验。

### 【简评】

封建社会，权力就是一切。

追求权力的欲望，把人变成了杀人狂，变成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

兄弟争权，在这首诗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这首诗是南朝刘宋皇室父子兄弟残杀的生动写照。

权力，只有在不为一家一姓的私利而行使时，才能体现出纯洁和神圣。

## 冯道以诗谏主

语言文字，有雅俗之分，深浅之别。所以，取何种形式要看对象，实在是一条重要原则。适合对象，就会事半功倍，否则，将会曲高和寡。

后唐明宗李嗣源以武力夺取天下，即位时已六十岁。他鉴于庄宗的失败，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中原的农业生产有所恢复。明宗文化水平低，曾夜间焚香、仰天祷告说：“我本番人，哪里能够担当得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天下混战变乱已太久了，愿上天早生圣人。”话尽管这样说，明宗在用人谏谏方面，还是表现出相当的治国才能的。

冯道在明宗时作宰相，明宗常常向他询问民间的疾苦。在一次随意的谈话中，明宗提到几年以来，庄稼一连丰收，四方太平，没有动乱。冯道说：“我曾经记得、当年在先帝(李克用)手下充当幕僚时，奉派前往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穿越井陘，路面狭窄，险象横生，担心马失前蹄，所以小心翼翼拉住缰绳，上天保佑，没有闪失。可是出了井陘，走到平坦大道。为了偷懒，把缰绳放开，由马奔跑，不久就一下子栽倒。治理国家，跟这种情形一样。”明宗深深点头，又问道：“今年庄稼丰收，人们是不是富足？”冯道说：“农民遇到歉收，就饿死荒野；遇到丰收，粮价却又猛跌。不管歉收丰

收，都要受苦受难的，只有农家。我还记得进士聂夷中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诗虽然通俗，但道尽农民困境。士、农、工、商中，农家最勤劳辛苦。陛下宜时时记之。”明宗十分高兴，说：“这首诗非常好。”他马上命令侍臣把聂夷中的这首诗写下来，常常背诵。

冯道为饱学之士，熟知古代典籍，长于篇咏，为文于典丽之外，亦含古道。但他深知明宗出身行伍，文化水平又低，所以他对明宗进谏，总是采用非常通俗和明白的语言、事例，以便君王理解接受。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表达方式，这既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也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 【简评】

雅与俗、深与浅之间，常存在一条鸿沟，对于有些人来说很难逾越。他们满腹经纶，理论高深，但不能用浅显通俗的方式表达，以使更多的人接受。

跨越这条鸿沟，举重若轻，谈雅似俗，论深如浅才是更高的层次。

## 明宗忍痛诛太子

世界上有很多事的发展及结果是令人无可奈何的。

马谡是诸葛亮手下的爱将，诸葛亮曾把把守街亭的重任交给他。然而他却志大才疏，言过其实，不能完成重任。最后，诸葛亮只能挥泪将其斩掉。为严肃军纪，迫不得已，不如此，又怎么办呢？

杨贵妃是唐玄宗的心爱之人，唐玄宗曾为她“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难，马嵬坡前，众军一致要求杀死杨贵妃，否则不予保驾。唐玄宗无奈，只得将爱妃缢死。为了安定军心，保驾活命，不如此，又怎么办呢？

五代时，后唐明宗李嗣源诛杀皇子李从荣，也是出于无可奈何。

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五代时不多见的贤明之主，“不迹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景屡丰，生民实赖以休息。”但他在立太子的事上，却没能虑患为防，终至父子交恶，刀兵相见。

明宗有四个儿子，长子从璟跟从庄宗征战，屡建功绩，被庄宗收为己子。明宗军变，从璟因故被杀。从璟死后，诸皇子中年最长的就是次子从荣了。他天成元年(926年)以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长兴元年(930年)，拜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从荣年长，又握有兵权，位高权重，明宗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但从荣为人轻浮而傲慢，喜欢浮文藻饰，附庸风雅。他招纳了许多文学之士，常常歌舞欢宴，饮酒赋诗。所以那些浅薄轻躁之徒，成天恭维奉承来满足他的骄矜之心。将相大臣们对此都深感忧虑，明宗也察知此中弊害却无法加以裁制。从荣曾在明宗身边侍问，明宗问他说：“你军政余暇，都做些什么呢？”从荣回答说：“有空我就读书，同儒士们讲论经义。”明宗说：“经义中有君臣父子之道，但须有硕儒端士，才可以亲近。我见先帝喜欢作歌诗，很没有意义。你是将门之子。文章不是你所平素擅长熟习的，肯定做不好，传到外面去，只能被人讪笑。我老了，对经义虽然不能通晓，但还是很喜欢听到的，其余的就不值得学了。”

长兴元年秋，明宗封从荣为秦王。按照惯例，诸王受封不朝拜

太庙。而主管大臣迎合明宗的意旨，想使受封的礼仪隆重，就建议说：“古今情况不一，现在秦王受大封而不告太庙，不是敬顺之道。”于是从荣朝服华贵，乘辂车，仪仗隆重，到朝堂受册命。出朝后，把册命载于车中，去太庙朝拜。京师的人都认为这样的仪式太荣耀了。长兴三年(932年)，明宗又加封从荣兼中书令。主管大臣又进谏说：“按惯例，亲王列在宰相之下。现在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相称。”于是秦王与宰相分班而居于右。

长兴四年(933年)，秦王李从荣又被加封尚书令，食邑万户。太仆少卿何泽上书，请立从荣为皇太子。这时，明宗已经病了，看到何泽的奏书，十分不高兴，对左右的人说：“大家想立太子，我就该回河东养老了。”他便召集大臣商议立太子的事，大臣们都不敢说话。从荣进去说：“我听有奸人妄言，想立我做太子，我其实并不愿意。”明宗说：“这是群臣的愿望罢了。”从荣出来后，去见宰相范延光、赵延寿等人说：“你们商议想立我做太子，是想夺我的兵权，把我幽禁到东宫里吧。”范延光等听到这样的话，惶惶不安，就又表奏加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主管官员又进奏说：“元帅或者统帅诸道的军队，或者专治一面，从前世看没有大元帅的名称，礼仪无法考按执行。请求自节度使以下，凡率领军队的将领，全都以军礼在庭中参见；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将领，初见时也同样，以后准许用客礼。凡元帅府文书符命行于天下，都用帖。大元帅班列应在宰相之上。”李从荣的权欲得到满足，更加骄横，在元帅府大摆宴席庆贺，诸将都得到赏赐。从荣又请求拨严卫、捧圣两营中千人作自己的卫队，每次进宫晋见，仅随从就有骑兵数百名，弓上弦、刀出鞘，奔走驰骋在官道上，路人见到，都惶惧躲避。从荣还命僚属作《征淮赋》，陈述他平定天下的志向。

朝廷有关官员呈请替亲王们择师傅，来加以训导。各宰相畏惧秦王从荣，不敢迳行任命，而请他自己选择。从荣请求让翰林学士

崔税、刑部侍郎任赞做元帅判官。明宗说：“翰林学士要代我说话，这不可以。”从荣出来后恼怒地说：“让我做元帅又不让我挑选僚属，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将相大臣们看到从荣权位越来越高，却这样轻率放肆，都知道会招来祸患，却不敢直言。只有范延光、赵延寿心中惶惧，屡次晋见明宗，涕泣请求解除枢密使的职务，调往外地，用来躲避从荣。两人好不容易才得到批准外调，而从荣的祸难也就发作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明宗旧病复发。第二天病势沉重。秦王李从荣与枢密使朱弘昭、冯贇进宫问候，明宗已不能知人。王淑妃告诉说：“从荣在这里。”明宗没有反应。李从荣退出，听到宫中一片哭声，认为明宗已死，就声称有病，第二天没有入宫，却不知夜晚明宗病情已稍稍好转。从荣知道自己的恶劣行径，不会被人接受，恐怕不能继承帝位，于是跟他的党徒商议，打算带兵入宫，先控制内宫以篡权。十一月十九日，李从荣派都押牙马处钧询问朱弘昭、冯贇说：“我准备率领警备部队入宫宿卫，请问应该驻扎在什么地方？”两人回答说：“官中您都可以驻扎，请您自己决定。”然后，以私人友谊告诉马处钧说：“皇上龙体平安，大王应该尽忠尽孝，不可草率从事。”李从荣大怒，再派马处钧对二人说：“你们就真的不爱惜家人性命了吗？怎么敢拒绝我的要求？”两人深为忧惧，进宫禀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到侍卫兵支持才能成功。”于是召来侍卫指挥使康义诚共同商议对策。康义诚的儿子是李从荣的部下，所以康义诚不肯参与决策，只说：“我是一个军人，不敢参与国家大事，完全听各位宰相吩咐。”朱弘昭听他这样说，大为恐惧。

十一月二十日，李从荣采取行动了。他派马处钧告诉冯贇说：“我今天决定率军入居兴圣宫。”又告诉康义诚，康义诚许诺迎接。冯贇骑马飞奔入宫，看到朱弘昭，康义诚、孟汉琼等正坐在中

兴殿门外讨论如何应付。冯贲责备康义诚说：“皇上所以提拔栽培我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事。现在是危机时刻，间不容发，你不应该因儿子在秦王府供职，就左右观望。如果秦王的军队一旦进入宫门，将把皇上置于何地？我们的家族难道还会有一个人活命吗？”康义诚还没有回答，宫门守卫报告说：“秦王率军已抵达端门了。”孟汉琼拂袖而起说：“我的性命微贱不足惜，我自当率军抵抗。”立即进入殿门，朱弘昭、冯贲尾随，康义诚不得已，也只好进殿。

孟汉琼晋见明宗说：“从荣兵变，军队已攻到端门。”宫女宦官们面面相觑，放声大哭，明宗问朱弘昭等说：“有没有这回事？”回答说，有这回事，已传令守卫关闭宫门。明宗举手指天，泪流满面，对康义诚说：“你自己斟酌处理，不要让京城受到惊扰。”控鹤指挥使李重吉是潞王李从珂的儿子，当时侍候在明宗身旁，明宗说：“我和你父亲从微贱中起事，冒着飞石流箭，平定天下，你父亲很多次把我从危险中救出来。从荣这等人，出了什么力，居然做出这种叛逆的事。你赶快派兵守住宫门。”李重吉马上率控鹤士卒守卫宫门。

这天，李从荣从河南府率领步骑兵一千多人出发，陈兵在天津桥上。他坐在胡床上，派左右侍从召唤康义诚。可是端门已经关闭，侍从敲叩左掖门，从门缝往宫里窥视，只见捧圣指挥使朱弘实率骑兵从北而来，急忙回来报告李从荣。李从荣大吃一惊，命取防箭铁背心穿到身上，自己调好弓弦。皇城使安从益率三百骑兵冲上来，李从荣的军队射箭抵抗，从益军稍稍退却。朱弘实率骑兵五百人已从左掖门冲出，很快骑兵大量集结，李从荣一看情势不好，急忙逃回河南府，幕僚及左右侍从一哄而散，警备部队趁势大掠所在的嘉善坊，全军瓦解。李从荣跟妻子躲到床底下，被皇城使安从益拖出来，当场斩首。

明宗听说李从荣已死，悲苦惊骇，几乎从御床上掉下，昏死又

复苏好几次。宰相冯道率文武百官进宫晋见，明宗说：“我家的事情竟到这种地步，无脸跟你们相见。”君臣相顾，泣下沾襟。明宗决定召次子宋王李从厚进宫承嗣大统。过了六天，明宗的病情加重，不治而亡。

明宗李嗣源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意于治世的出现，在五代的君王中，多有可称道之处。但他出身行伍，轻视文治，仁而不明，处理政事常有粗率简单之处，多次以偏听偏信而诛杀臣下。对秦王李从荣，李嗣源寄托了很大希望，所以屡次加封。李从荣权重位高，颇少检束，而明宗不能事先有所防范，加以制约，终于酿成了秦王叛乱、身首异处的悲剧。明宗最后不得已采取了平定叛乱的措施，实为无可奈何的下策。

### 【简评】

俗话说：教是爱，溺是害。

明宗对儿子从荣寄予厚望，屡次加封，不可谓不爱。当他迫不得已，将李从荣诛杀后，悲痛得死去活来，可见仍未失去爱子之情。

如果他对儿子及早严加管教，制止他的骄纵，结果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种瓜得瓜，种豆种豆。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终究要承担责任。

## 孟昶立威悯民

人们都喜欢立志：

学子好立成才之志。

商人喜立致富之志。

官员爱立廉政之志。

帝王呢？都说要励精图治……

然而，立志容易，守志则难矣！

后蜀后主孟昶于934年继位，做了30多年的“偏霸之主”。他在位期间，既有奢华荒淫的一面，也有精明干练、有智有谋的一面，有些善政还是颇值得称道的。

孟昶即位时才16岁，将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老部下，不把这个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这批勋臣旧人骄恣不法，为所欲为，公然超越法度，建造豪华第宅，规模巨大，以致夺人良田，发其坟墓。其中尤以李仁罕、李肇、张业、赵廷隐最为骄纵嚣张。孟昶刚即帝位，大将李仁罕便提出主管六军的要求。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出要求，还到学士院看是不是照他的要求起革命令。这一目无幼主、咄咄逼人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孟昶，他知道这样下去意味着什么。但他隐忍不发，先接受条件，任命李仁罕为中书令，判六军事。然后，等李仁罕进宫朝见时，孟昶命令武士将他捉住，当场杀死。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到成都来朝见新君，他假称脚上有病，拄着拐杖上朝，见了孟昶，不肯跪拜。李仁罕一死，他吓得魂不附体，顿时丢掉拐杖跪了下去。孟昶以其倨慢，勒令他退休，徙居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县)。

张业是李仁罕的外甥。李仁罕被杀时，他正执掌禁军，孟昶怕他反叛，当时不敢动手，遂千方百计加以笼络。甚至用他做宰相，又兼判度支(财政)。张业在家里私设监狱，关押欠债的人。他制定了一种“盗税法”，规定税官吞没赋税的，照吞没的数目十倍罚款。税官受了罚，按照“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法则，自然如数从百姓身上

勒索。这种酷苛的税法使得百姓难以承受，怨声鼎沸。孟昶闻知，废除了十倍罚款的办法。到了后蜀广政十一年(948年)，孟昶觉时机已到，遂与禁军将领安思谦密谋，用诛灭李仁罕的老办法，把张业在都堂上捉住杀死。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见事不妙，自请退休。至此，故将旧臣基本上被除尽了，孟昶

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国政。

孟昶在朝堂上设了匭(小箱子)，鼓励臣下投书进谏。孟昶喜欢打球骑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枢密副使韩保贞劝谏，孟昶大悟，当时便命令放还，还赏赐给韩保贞金数斤。有人上书论事，孟昶认为说得不对，左右近侍请求把上书的人喊来诘责。孟昶说：“我看到唐太宗刚即位时，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虽忤上意，却都受到嘉许，为什么你们却劝我拒谏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昶曾亲笔撰写了《官箴》，颁行各郡县。其辞曰：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孟昶亲政之初，还是颇知节俭的，表示要吸取前蜀王衍因骄奢淫佚亡国的教训。他撰写的这篇《官箴》，晓谕地方官不要过分剥削人民，具体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其中的鉴戒意义却是为后世有见识的统治者所肯定和吸取的。北宋太宗就采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等八句，亲书颁赐州县，立于厅事之南，称《戒石铭》。由此看来，孟昶的诏书在当时还是起过一定

作用的，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 【简评】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用在后蜀后主孟昶身上恰如其分。他在台之初，抑制权臣，加强集权，立官箴，鼓励臣下投书进谏；其亲笔所书的《官箴》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等句，深念民瘼，体恤下情，成为后代君主的箴诫、座右铭，确颇有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模样。可惜执政后期，骄奢淫逸，任用佞臣，夺人妻女，国政日衰，以至宋兵压境之际，城上树降旗，身为阶下囚，几死人手，为后世所不齿！人能立志本不难，难在守志不移，孟昶亡国之鉴戒，确乎深刻。

## 第一章 谏官谏用谏官（下）

### 李从珂鼓励进谏

有一种人总爱为自己的无能或过失寻找种种理由。

字写得不好怨笔歪，箭射得不准怨弓硬。这种人说得雅一点是“文过饰非”，说句大白话就是拉不出屎赖茅房。

后唐的宰相卢文纪就是这等人。

后唐末帝李从珂靠变兵拥立即位后，面临非常严重的局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积重难返。李从珂对时局发展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他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裨益的建议。卢文纪等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晋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令有一点浅见，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性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则任何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自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延英殿奏事的名义。”

李从珂的不满，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卢文纪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鲠直，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

一抨击，请求普遍举行考试，根据成绩升迁或罢黜。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会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意见时，则口呆目瞪，说不出话；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一个一个检查他们的武艺，考试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擢升他为大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的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这封奏章，可是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严于是下诏说：“过去，魏征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两件事情相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

### 【简评】

对于一个君临天下的封建皇帝来说，百姓不言和臣下不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百姓不言，说明他们在默默地积怨，总有一天会在沉默中暴发。

臣下不言，说明他们对朝廷早已失去信心，对其生死存亡漠然置之。

李从珂是五代后唐的末代皇帝，然而他不信谗言，不堵塞臣下言路，这是他的开明之处。后唐亡于季从珂，然而史书上对他的记载极取同情态度。

人们不会因一个人的成功而把他写得处处皆是，同样，也不会因一个人的失败而把他看得事事皆非。

## 铜柱勒铭定溪州

俗话说：“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中国少数民族众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习俗，特定习俗，反映了特定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认同。

利用习俗的力量，往往会收到巨大的效果。

五代时期，据于湘西、统领土家诸部的是彭氏兄弟父子。彭氏兄弟原本是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赤石洞的酋豪，后入湖南，投靠楚王马殷，得其扶植，于是据有溪州(今湖南省西部)。彭氏兄弟强力而有谋略，善结人心，广聚财力军士，诱胁诸蛮而归之，虽说属楚统辖，却恃仗山势险要、地形复杂，自行其事，不受节制。他们春夏营种粮食，到了秋冬，便四出掳掠抢夺，长沙四境受其患最多。马殷在时，对他们多加容忍，而他们慑于马殷的恩威并举，也还不至于超分作乱。到马殷死后，次子希声、四子希范踵继为楚王，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侵扰不断升级。

南楚文昭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刺史彭士愁，引导奖(今湖南省新晃县东北)、锦(今湖南省凤凰县)二州土家诸部一万余人，进

攻南楚所属的原(今湖南省沅陵县)、澧(今湖南省澧县)二州，烧杀掳掠南楚边防部队，并派使节前往成都向后蜀帝孟昶请求支援。孟昶认为道路太远，没有答应。

南楚文昭王马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勅、决胜挥舞使廖匡齐，率衡山兵五千人讨伐彭士愁。刘勅率军进攻溪州，(今湖南省永顺县)，彭士愁战败，放弃城池，逃往山寨继续抵抗。山寨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刘勅建造高梯，开凿栈道，爬到上面，把山寨团团围住。可山寨地形险要，难以攻破。刘勅仔细观察了地形，确定了进攻方案。这天，刮起了大风。刘勅派人从上风发射火箭，彭士愁的大寨中到处起火，楚军趁势进攻，彭士愁无法抵挡，率部众逃入奖(湖南新晃县东北)、锦(湖南凤凰县)二州的深山。楚军继续追击，彭士愁穷蹙无计，派其子彭师嵩率各酋长缴出溪(湖南永顺县)、奖、锦三州印信，向楚军投降。

刘勅班师，将彭师嵩带回长沙为质。南楚王马希范见大军凯旋，非常高兴。马希范自称东汉名将马援后裔，仿效马援于交州立铜柱的故事，在溪州铸立铜柱，这就是保存至今的“溪州铜，柱”。铜柱用铜五千斤铸成，柱呈六棱形，内空，柱面铸有2118字，楚天第府学士李宏皋撰写铭文。这篇铭文反映了马希范平湘西的策略和措施，对西南地区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铭文可知，马希范平溪州后，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保持各部首领旧有官职，世代承袭。

二、二叛之后，赏赐诸州首领、将吏，发粟赈贫。

三、赋税仍依旧制，且留本州自用，楚廷不向溪州征赋抽兵。楚廷需用的“溪货”，土产，仍按旧章办理。

四、禁止诸部头人等越界劫掠，诱纳逃人。

## 五、移溪州治所于平岸，以便控制。

铭文最后立誓曰：“王者之师，贵谋贱战，兵不染锷，士无告劳。肃清五溪，震譬百越，后平疆理，保卫邦家。尔宜无扰耕桑，无焚庐舍，无害樵牧，无阻川涂，勿矜激濂流湍，勿恃悬崖绝壁。荷君亲之厚德，我不征求；感天地之至仁，尔怀宁抚。苟违诚誓，是昧神祇。垂予子孙，庇尔族类。铁碑可立，可忘贤哲之踪；铜柱堪铭，愿奉祖宗之德。”

南楚的马希范，是个骄奢无度的昏君，但他在处理溪州土家诸部的问题上，还不失为开明的君主。他注意收揽人心，不但以誓约的形式订出法规，而且开仓赈济，使贫苦百姓得到好处。铜柱勒铭，利用了符合当地文化与心理的形式，表明违背誓言便会失去法定的统治地位。这样，后世视铜柱为“神物”，影响深远。当时，铜柱立后，便有许多部落酋豪率众先后归附，南楚声威，达于今川黔境内。

### 【简评】

诸葛亮南征后，任用了大批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官，从而使南方地区长期得以稳定。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取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

马希范在溪州立铜柱，也是根据当地习俗，取信于当地之民。在人格、品质、影响、智慧等方面，马希范均无法同诸葛亮比，唯独在处理溪州问题上，与诸葛亮征南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 明判帝位化干戈

“化千戈为玉帛”有种种情况。在兄弟之间为统治大权而兵革相

见之际，从中斡旋的人如果不是谋略出众，恐怕还是千戈未息，玉帛难酬。

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年)，辽朝南下中原，直取汴京(今开封市)，灭亡了后晋。次年，太宗耶律德光病死在回师途中。军中的将领推戴永康王耶律阮即位，这就是辽世宗。世宗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太子人皇王耶律倍之子。太祖死后，皇后述律平立次子德光为帝，耶律倍被迫南走中原。

世宗麾师北上。时太后的小儿子耶律李胡留守都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她想立李胡为帝，派李胡率军拦截世宗。两军交战，李胡战败，退守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横渡，双方相持不下。李胡把世宗和南征将士的家属扣押起来，眼看一场你死我活的皇位争夺战就要打响，上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大家都惊恐地说：“真要打起来，可就是父子兄弟互相残杀了。”

宗室耶律屋质是个博学多才、胸怀韬略的人，担任主管宗室事务的惕隐，也留在上京。世宗害怕他为太后出谋献策，对自己不利，便决定及早离间他和太后的关系。世宗让人模拟了一封屋质写给自己的信，悄悄丢在上京城内。有人把拾到的信交给了太后。太后怀疑其中有诈，她便把信交给屋质看。

屋质接过信来，愣了半晌才对太后说：“太后辅佐太祖统一了天下，我愿意竭尽死力为太后效劳。如果太后怀疑我，我想尽忠也无能为力了！”太后安慰他道：“如果我真是怀疑你，哪会把信交给你呢？”屋质这才舒一口气，接着说：“如今两军对阵，相持不下，最好讲和。不然，就请速战速决。然而，战争一起，人心动摇，恐怕要国难临头。希望太后三思。”

太后正在气头上，哪甘心骤然讲和呢？她半天不说话。屋质进

一步劝导她说：“李胡和耶律阮都是太祖的子孙，不论谁即帝位，神器都不会旁落；太后要以社稷为重，从长计议，不可意气用事。还是与耶律阮和解吧。”太后这才开口问派谁去讲和？屋质主动请求出使，说：“太后信得过我，就请派我去吧。万一耶律阮答应讲和，那真是宗庙的福分。”

屋质带着太后的信来见世宗。世宗草拟了一封回信，语多不逊。屋质劝谏世宗说：“您用这样的措辞，恐怕于事无济。要想尽释前嫌，实现国家的安定，除了讲和外别无他途。”世宗不服气地说：“他们的军队尽是一些乌合之众，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屋质反问道：“即便不是您的对手，骨肉相残有什么好处呢？况且还不一定孰胜孰败。就算你取胜了，李胡扣押的您和将士们的家属，也要命归黄泉了。所以说，最好是讲和。”

世宗左右的人听罢，都很震惊。世宗想了半天，问他：“依你之见，怎么讲和呢？”屋质答道：“您可以先与太后见个面，双方都消消气，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商谈。商谈不成，再决战也不晚嘛。”

世宗随屋质来见太后。双方见面后，互相埋怨和争执，都没有和解的姿态。屋质插话说：“你们必须先抛弃过去的恩怨。过去的事，你们都有责任。”他先问太后：“太祖去世时，有太子在，你为什么立次子呢？”太后答道：“立次子，那是太祖的遗言。”他又问世宗：“大王您为什么不禀报尊亲大人，就擅自称帝呢？”世宗答道：“因为我父亲本该立而不能即位，我不过继承先父的位置而已。”

听了两人的回答，屋质神色严肃地说：“太子人皇王抛弃祖国，南奔中原，大王您见了太后如此傲慢，满口怨言，这都有失孝道。太后呢，您溺爱次子，假托太祖遗言，妄授神器。你们至今仍执迷不悟，不思和解，那就赶快交战吧！”说完，拂袖而去。

太后伤心泪下，抽泣着说：“太祖的时候，诸弟曾一再叛乱，结果天下荼毒，满目疮痍，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怎么能再交战呢？”世宗也面有愧色。在场的人，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一会儿后，屋质又回到座席上。太后擦擦眼泪，问屋质：“讲和以后，神器到底传给谁呢？”屋质答：“当然是传给耶律阮，顺乎天意合乎人心，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坐在太后身旁的李胡大声驳斥说：“有我在，怎么能传给他呢？”屋质毫不畏惧，也厉声说：“根据礼的规定，传位应传嫡子，不传兄弟。先帝德光以次子即位，已经备遭非议，何况你是弟弟呢？而且，你为人残忍，结了许多仇人。大家众口一辞，共同推戴永康王为帝！”太后无可奈何地劝李胡说：“不是母亲不愿意立你，这完全是形势所迫啊！”

双方终于达成和议，罢兵息战。

### 【简评】

为争夺王位，兄弟骨肉可以大动干戈，互相残杀，这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是屡见不鲜的。唐初玄武门事变等一幕幕血淋淋事实在历代皇宫中是反复出现的。辽代耶律阮与耶律李胡之间的厮杀，仅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在谋臣耶律屋质的化解下，双方握手言和，罢兵息革，化干戈为玉帛。耶律屋质抓住双方的弱点，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是一位擅于游说的说客。

## 郭威起兵代后汉

五代时期政局动荡，改朝换代十分频繁。后汉是最短的一个朝代，先后两任皇帝在位只有4年。后汉被周所代，直接原因是从后汉帝杀戮大臣开始的。

后汉隐帝刘承佑登基做了皇帝后，枢密使、左仆射、同平章事杨邠，一直总揽中央大政。枢密使兼侍中郭威负责军事，当时任邺都(今河北省大名县)留守兼天雄节度使，统领黄河以北各州军务防守之事。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负责宫廷与京城治安保卫。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负责财：政。除郭威外，其余三人都在朝廷任事。杨邠很能秉公尽忠，退朝之后，在家里不接受任何人游说请托，虽然不拒绝四方的馈送，但多余的一律缴归国库。史弘肇、王章也都忠于职守。靠了这几人的力量，后汉国势得以粗略安定。但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

刘承佑即位时，只有18岁。他的母亲李太后的弟弟们都想借此谋取功名富贵。刘承佑左右一些受宠信的人，也渐渐掌权。李太后有一位老友的儿子，请求谋一个军官位置，史弘肇大怒，把他斩首了。杨邠对太后家人干涉政治，也一再压制。武德使李业，是李太后的幼弟，后汉高祖刘知远命他管理宫廷财务，刘承佑登极后，李业尤其受到宠爱。正好，宣徽使出缺，李业想得到这个位置，刘承佑、李太后也暗示宰相保荐。但杨邠、史弘肇认为宫中官员的升迁，有一定程度，皇亲国戚不可以越级出任，这件事只好罢休。内客省使阎晋卿、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都受刘承佑宠爱，因很久没有升官，众口一声，怨恨宰相。平卢节度使刘铢凶残暴躁，从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任上离职，也常指着宰相府垢骂。

刘承佑刚服完三年丧，便欢宴歌舞，听伶人奏乐，赏给伶人锦袍玉带。伶人们晋见史弘肇叩谢。史弘肇大怒说：“战士们在边疆苦战，没有一丝赏赐，你们有什么功劳，却得到这些财物！”全都夺回，送还国库。刘承佑打算封他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杨邠认为刘承佑刚除下丧服，似嫌太快；耿夫人不久去世，刘承佑又想用皇后的仪式安葬，杨邠也不同意。刘承佑这时已20岁了，对高官重权

的压制十分不满，时间长了，心中尤其愤愤不平。刘承佑左右侍从于是抓住机会，进谗言说：“杨邠那些人专权横行，总有一天会发生事情。”刘承佑相信这些话，疑心要发生紧急情况。听到作坊锻造兵器的声音，竟然有的夜晚不寐到天明。司空、平同章事苏逢吉与史弘肇之间，结怨很深，知道李业等憎恨史弘肇，多次用话刺激李业。刘承佑于是与李业、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秘密谋划，要诛杀杨邠等人。李太后反对，未果。李业把诛杀杨邠和史弘肇等人的计划告诉了阎晋卿。阎晋卿闻言大惊，恐怕政变失败，急忙去向史弘肇告密，谁知史弘肇借口有事，不愿出来接见。

第二天一大早，杨邠、史弘肇、王章等进宫参加朝会，武装士卒几十人突然从广政殿杀出，把杨邠等三人砍死在东厢之下。聂文进紧急召集宰相及文武百官到崇元殿列班朝见，宣读诏书说：“杨邠等阴谋造反，已经伏诛，当跟你们共同庆贺。”又召集各军将领到万岁殿大庭，进行安抚。同时，刘承佑又分别派使节率领骑兵逮捕杨邠等的亲戚、朋友、侍从等，全部诛杀。史弘肇与侍卫步都指挥使王殷交情笃厚，杨邠、史弘肇被杀后，刘承佑派供奉官孟业携带密诏前往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和邺都(今河北省大名县)，命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李太后弟)诛杀王殷，命邺都行营马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曹威，诛杀郭威和宣徽使王峻。同时，刘承佑又紧急调兵遣将，护卫京师。李业等命令权知开封府刘铎屠杀郭威、王峻的家眷亲属，满门抄斩，无人幸免。

这时，京城已被控制在刘承佑的手中，但派去诛杀郭威等人的计划却出了问题。孟业带着朝廷的密诏抵达澶州，李洪义担心王殷已得到京城的消息而早有准备，不敢动手，反而带着孟业晋见王殷。王殷立刻把孟业囚禁起来，急忙派副使陈光穗把密诏送给郭威。郭威请来枢密使魏仁浦，请他阅读，问：“该怎么办？”魏仁浦说：“你是帝国的栋梁，功劳名望，一向显赫，而又手握重兵，镇守

重镇，一旦被小人陷害，绝对不是几句话就可化解的。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不应该坐在这里等死！”郭威思忖良久，于是召集郭崇威、曹威及其他部将，告诉他们杨邠等被冤杀，以及密诏的内容，说：“我与杨、史诸公，披荆斩棘，追随先帝，夺取天下。又受托孤重任，竭尽能力，保护国家。而今，杨、史诸公已死，我怎么忍心独自偷生！你们应接受诏书，砍下我的人头，回奏天子，或许可以不连累大家。”郭崇威等都哭泣说：“天子年纪太轻，这一定是左右邪恶小人的阴谋诡计。假如他们当权，国家怎么能够太平。我们愿追随大帅前往朝廷投案，扫荡鼠狼之辈，肃清朝廷，不可死在一个单枪匹马的使节之手，蒙受千年恶名！”皇家翰林天文赵修己对郭威说：“白白送死有什么意义，不如顺从大家的愿望，率军南下，这是上天替你开路！”郭威于是留下他的义子郭荣(柴荣)镇守邺都，命郭崇威为先锋出发。

刘承佑听到郭威起兵南下的消息，十分惊慌，忙召集大臣们商议防御之事。前开封尹侯益说：“邺都官兵们的家属，都留在京师。我们不可以轻率地出城作战，最好是紧闭城门，先摧挫他们的勇气，然后让他们的母亲妻子登上城墙呼唤她们的儿子、丈夫。用不着打仗，就可把他们生擒活捉。”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不以为然，说：“侯益衰朽老迈，满脑子都是懦夫的想法。”刘承佑赞同慕容彦超的意见，派阎晋卿、侯益等率禁军直趋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可是，就在当天，郭威抢先一步进入澶州，李洪义开城迎接。王殷晋见郭威，悲伤恸哭，率自己的部队加入了郭威军队，渡黄河南下。刘承佑派宦官鬻脱去侦察郭威大军的动向，被巡逻的士卒擒获。郭威审讯清楚后，把奏章放到鬻脱衣领中，命他回去向刘承佑禀报。奏章中说：“我前些天接到诏书，伸长脖子等候诛杀。可是郭崇威等不忍下手，一致认为是陛下左右那些贪权小人谗言陷害，逼迫我南下前往宫门听候审判。我求死不得，而力量又不能控制部属，大概几天之后，就会抵达宫前。陛下如果认为我真的有罪，我

怎么敢逃避处罚！如果真有人暗中陷害，也希望能把他们交到军营，使三军快心称意。届时，我虽死无恨。”

郭威大军来到滑州(河南省滑县)，义成节度使宋延渥迎接郭威进城。郭威于是得以用滑州库存的钱财犒军，他向部众解释说：“天子被谗邪小人迷惑，诛杀有功的大臣。我率军南下，实为不得已之举。现在快要与朝廷派出的军队相遇了。如果战场相遇交战，那与我进京朝见的本意完全相反。如果放弃抵抗，一定会遭他们屠杀。你们的家都在京师，不如仍依照密诏行事，我虽死也没有遗恨。”将士们都说：“国家辜负您，您不辜负国家。请大帅火速发令前进，不要耽误。安邦定国，报仇雪恨，正在此时！”王峻接着向大家宣布说：“我接到大帅指令，攻克京师的时候，允许你们抢劫十天！”众士卒都欢呼跳跃。

刘承佑本打算亲去澶州督战，听鬻脱回来禀报，知道郭威已到澶州，才打消念头。他见到鬻脱衣领中的奏章，脸上掩不住懊悔恐惧，私下对宰相窦贞固说：“先前那件事，确实太草率！”但事已至此，刘承佑也只好硬着头皮对付。郭威主力抵达封丘(今河南省封丘县)，逼近京城，民心惶恐。刘承佑派左神武统军袁襄、前邓州节度使刘重进等，率禁军与侯益等会师，进驻赤冈(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慕容彦超率大军进驻距开封约10公里的七里店。

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廷军队和郭威大军在刘子陂(七里店东北)列阵相持。慕容彦超率轻骑发动攻击，郭威命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率骑兵迎战。慕容彦超败退，部下一百余人战死，各路人马士气崩溃。到天黑时，朝廷大军大多数都投降了郭威。刘承佑单人匹马与宰相及随从官员数十人逃奔郊野，被乱兵诛杀。郭威大军于是进入京城。郭威与王峻率文武百官，前往明德门，向李太后请安，请求指立新君。最后决定拥戴高祖的侄子、徐州节度使刘贇继承大统。因刘贇尚未来到，郭威等请李太后临朝执政。

十二月，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郭威北征。郭威率军到澶州驻留。十二月二十日，大军将要开拔，将士数千人突然大声喧哗呐喊，登墙越屋而入，请求郭威做皇帝。有人撕裂黄旗当作龙袍，披到郭威身上，拥上来扶到上座，山呼“万岁”。大军于是簇拥郭威南下，进入京城。后汉乾佑四年(951年)春正月，郭威登极称帝，国号定名为“周”，改年号为广顺，大赦。对已死的杨邠、史弘肇、王章等，分别追赠官职，遗骸由朝廷收葬，并慰抚寻访其子孙，分别录用。

### 【简评】

观郭威代汉立周的过程，处处显示出一位富有政治、军事经验的将帅的韬略。他得知朝中改变的消息，闻乱不惊，召集诸将校哭诉杨、史之死和自己的遭遇，激怒将士，赢得了军心。不失时机地果断南下，给刘承佑的奏章措辞沉稳而威势逼人，后来率军北征，澶州兵变，黄袍加身，被拥为皇帝，转回汴京，遂受后汉禅让即皇帝位，无不经过精心策划安排。只是这一幕10年后被赵匡胤几乎原封不动地效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代周建宋，恐怕是郭威所始料不及的吧？

## 吉頊复唐

唐时的“武周革命”及后来的“中宗复位”，其间经历了纷纭复杂的政治变化。下面的这则故事，可以从另一侧面看出其发展变化的一点因由。

吉頊是武则天时人，家在洛州河南(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此人身長七尺，阴毒敢言事，万岁通天二年(697年)，被提为右肃政台中丞，深得武则天信任。

公元698年，北方突厥南侵，攻陷武周赵州(今河北赵县)、定州(今河北定县)等地。武则天任吉顼为相州刺史，征发诸州兵以讨之。吉顼以武周名义征兵，几乎无人应募。后来，武则天以李氏之后李显为元帅，亲征，吏人应募者日以数千。打退突厥后，吉顼回朝便对武则天说明当今人心向背，认为民心向着唐朝，不喜武周，劝武则天取消武周之号，归政于唐。武则天的亲戚们害怕归政于唐后自己的地位丧失，对吉顼非常不满。他们便将吉顼弟兄的丑事抖落出来，将吉顼贬为安固尉。

吉顼临行前，到宫中向武则天辞行，他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一次恢复唐朝的努力。他流着眼泪对武则天说：“臣此次辞别圣驾，再也没有机会请见言事，请让我坐下与您长谈一次。”

武则天说：“可以。”

吉顼坐下后，没有直接提起归政于唐之事，而是提出一个问题：“一盆水和一盆土，它们之间有竞争吗？”

武则天说：“当然没有。”

吉顼又问：“把它们放在一起，和成泥，它们有争竞吗？”

武则天说：“也没有。”

吉顼接着问：“那么，再把这盆泥塑成尊像，一尊为佛祖释迦牟尼，一尊为道教元始天尊。他们之间有争竞吗？”

武则天说：“这回可有争竞了。”

吉顼这才将话题点破，说：“如今朝中之事也如此。我认为皇族、外戚应各有区分，这样，李氏皇族与武氏外戚才能两保安全。

如今陛下称帝，皇族、外戚无所区分，其贵贱是非全由陛下裁决，则他们必然要发生争竞。陛下怎样去调和他们呢？因此，我认为皇族、外戚两不安全。”

武则天点头称是，说：“此意朕深知之，然事已至此，应从长计议。”

吉项见武则天被说动了，便再找机会继续劝说。武则天还有个宠臣名叫张昌宗，与吉项同在控鹤府奉事。张昌宗也看出人心皆向李唐，害怕自己因受武氏宠爱将来不得保全，便向吉项求全身之计。吉项说：“您兄弟受武氏恩泽极深，位极贵，如果不对唐朝立有大功，必无全身之理。若想全身，只有一策，您若听从，不但全家相安无事，还能享受土地爵位之封。”

张昌宗说：“我愿言听计从。”

吉项说：“如今天下之人，思唐德久矣！主上年事已高，武氏诸王又不堪帝王之位。您深被主上恩宠，何不劝主上归政于唐，以慰天下之望？果能成功，将有功于天下矣。”

张昌宗认为很对，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一有机会，便对武则天进行劝说。武则天果被说动，立了自己儿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

### 【简评】

武则天取消武周国号，归政于唐，这是历史上的大事件，决非简单的劝谏所能解决，但吉项、张昌宗的功谏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吉项劝谏武则天，举例生动，借题发挥，不愧是智者之言，他利用张昌宗求安心理，利用他向武则天曲线进言，更与直谏有异曲同工之妙。

## 智取商密

在战争中，强攻不如智取。智取的战术十分灵活，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制造假象，摧毁人的心理防线，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就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这种方法的运用，有二个基本原则：一要出奇不意，二要充分利用敌人的畏惧心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克敌制胜的效果。春秋时期秦军攻取商密，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的成功战例。

公元前635年，秦国和晋国联合攻打都国。

都国是当时秦、楚边界间的小国，与楚国唇齿相依。如果都国被秦攻下，楚国就直接暴露在秦军的攻击之下。因此，楚国派申公斗克、息公屈御寇率军戍守都国国都商密(今河南淅川县西南)。

楚国对抵御秦军做了严密部署，若强攻，秦军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减少伤亡，秦军采取了智取的方针。秦军经过析地(今河南淅川县西北)没有攻打，而是绕过去，从丹江水湾过河。

在黄昏的时候，秦军来到商密城下，包围了城池。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士兵换上都国士兵的衣服，并且绳子绑起来，在商密城下出现，以此给城中一个错觉，好像秦军已经攻克析地，并抓到了许多俘虏。

夜渐渐深了，城外一片漆黑。突然，城里人看见秦军已经用土搭起一个土台子，并杀了几头牲畜，将牲畜血摆在台子上，好像在举行盟誓仪式。不一会，土台前除了秦军主将外，还有两个楚将，模模糊糊好像是斗克和屈御寇。这下，商密城中的人全慌了，他们纷纷传言：“秦国军队已经占领析地了！戍守城池的人向秦军投降

了！”于是，便打开城门，向秦军投降。

### 【简评】

在战场上，两军实力相当，为何一胜一败？因为军事斗争不仅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较量，更重要的是智慧的较量。这主要表现在对战术的运用上，如果战术运用得成功，就可击败与自己实力相当的敌人，甚至是以少胜多。

秦楚商密之战，楚军面对秦军的进攻，虽然做了严密的部署，但秦军没有强攻，而是抓住敌军畏秦心理，以奇兵突然出现在商密城下，并制造了楚军外国防线已被秦军攻破的假象，给商密城内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从而获得了不战而胜的战绩。

### 【简评】

“桂陵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战役。所以“著名”，是因孙臆首创了“围魏救赵”的战术，且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齐国出兵目的是为了救赵，但不直入赵境攻打魏军，而是避其主力，去攻打防务空虚的魏都大梁，使魏军回援，然后在魏军退军的路上，乘其疲惫之时，设伏将魏军击败。这就是孙臆所说“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谋略。此谋略确为神机妙算，高出庞涓一筹，庞涓又怎能不败？

自“桂陵之战”后，“围魏救赵”战术在历史屡屡运用，后来被毛泽东主席概述为“围点打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策略，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创下了不少光辉的战例。

## 第二章 赛马谈兵，齐威王拜师（上）

孙臧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助田忌赛马取胜的故事被人们广为传颂，成了孙臧智慧的象征。

魏惠王时(前369~前319年)，孙臧遭庞涓陷害，被魏惠王处以刖足的酷刑，当齐国使者出使魏国，来到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时，孙臧以受过刑罚的罪犯身份，秘密地会见齐使，游说齐使，谈论治国兴邦、兵法军旅之策，齐使见孙臧谈吐非凡，知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偷偷地将孙臧载于车上带回齐国。

齐国的将军田忌听说孙臧入齐，便亲自出迎孙臧，将孙臧请进自己的官邸，用上宾的礼节款待他。一经谈论，田忌更是庆幸自己喜遇良才，对孙臧越发肃然起敬。

田忌暇时，常跟齐国的王族们赛马打赌，田忌马力不足，屡次失金。孙臧见田忌的马力与王族们的马力相距不远，便对田忌说：“来日比赛，您尽管下最大的赌注，我定会设谋使您取胜。”田忌甚信服孙臧，便回答说：“闻先生言，我当请于齐王，以千金为赌。”临近比赛，孙臧对田忌说：“齐之良马，聚于王廷，您若按马的等级，依次与王族们决赌，恐难取胜。现在请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用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用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赛毕，齐威王及王族们只胜了一场，田忌却胜了两场，赢了齐威王千金。齐威王大为惊奇，询问田忌取胜的原因，田忌便以实相告，齐王对孙臧敬佩不已，田忌乘机将孙臧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见孙臧才智出众，愉快地接见了孙臧，并向孙臧询问兵法军旅之事，孙臧侃侃而谈，对答如流，主张于列国纷争之际，国家安危存亡之秋，必须“战胜而强立”。孙臧对战争的深刻分析及关于指挥作战的一系列独到主张，深深地打动了齐威王，使齐威王

心悦诚服，齐威王发现孙臆乃是争霸天下，兴邦定国的栋梁之材，便越发敬重和信赖孙臆，毕恭毕敬地拜孙臆为老师，不久，又拜孙臆为齐国的军师，将军国大事委以孙臆。后来，孙臆果然两败魏军，使韩、赵、魏三晋君主臣服于齐，齐国国势也由此日见强大，威震四方，成为当时称霸一方的强国。

### 【简评】

孙臆助田忌赛马的事何以引起齐王的震惊？何以二千多年以来被人们传为佳话？只因为这件事深刻地反映了孙臆高超的军事策略思想。赛马场上马的角逐，与战场上军队的角逐，表面上看各不相干，但究其内涵，却是同出一理，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何以见得？其理由如下：首先，孙臆指出：国之良马皆集于王侯之家，臣下之马远远不及。这就是说赛马之前，对双方马的实力应该清楚地了解，同样的道理，交战时对双方军事实力不是也应该有清楚的了解吗？这不正体现了孙臆“知彼知己”的策略思想吗？

其次，利、臆否定了田忌按照常规分等比赛的赛马方法，这实际就是主张：在强大的对手面前，避免硬拼，而要以智取胜。

再其次，孙臆在承认得与失、胜与败是相伴随而存在于一个统一之中的两个方面的前提下，放弃只得不失，只胜不败的幻想，而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主张得大于失就是胜利。这是确定策略的指导思想。孙臆让田忌以下等的马与齐王上等的马比赛，就是要以小的失败换取大的胜利。第四，在总体上我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利、臆主张我方在局部上必须力争占有绝对优势，以便在一个个局部上战胜对方。孙臆让田忌以上等的马与齐王中等的比赛，以中等的马与齐王下等的马比赛，正是使自己一方在局部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保证战胜对方。这正是扬我之长、避我之短；避敌之长、攻敌之短的策略思想的生动体现。

赛马之事虽小，但却闪耀着孙臧军事策略思想的光辉，焉能不使齐王震惊？

## 纵论削藩之策

实行中央集权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是关系到封建皇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汉高祖刘邦曾准备采纳谋臣酈食其的建议，分封六国的后代为王。张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汉王也就不能够统一天下了。刘邦恍然大悟，辍食吐哺，气愤地骂道：“竖儒，几败而公事！”

汉高祖刘邦虽然最终实行了中央集权制，但时隔不久，得到封地的刘氏诸王，势力逐渐扩大，影响了中央集权，汉景帝时，号称“智囊”的谋臣晁错便主张“削藩”，建议景帝削夺王国封地，这无疑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明智之举。

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已形成了同中央集权的对抗势力，如不加以解决，势必会影响国家的统一与安定，谋臣杜黄裳正是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同晁错一样，力排众异，力主“削藩”。

藩镇割据是唐中后期的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多加以节度使的称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节度使都拥有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藩镇势力之大，可见一斑。

藩镇和唐中央及藩镇之间，都存在着矛盾。所以，它们经常“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使当时的政局动荡不安。

唐宪宗时，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故，节度使一职出现空缺，节度

副使刘辟竟自命为西川留后，亦即节度使的继承人，并指使诸将领上表请求任命自己为节度使。虽然朝廷最初没有认可，并准备召刘辟回朝任职，以调虎离山。刘辟自认为天高皇帝远，朝廷奈何不了他，拥兵自守，不肯应召。在封建社会，违抗君命应治以死罪，但毕竟是鞭长莫及，最后宪宗还是任命刘辟为西川节度使。

尔后，在讨论这个任命时，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主张，“如今开释了刘辟的死罪，朝廷可以挥臂指使的地区，便只有东西两京了。除在两京以外，有谁不想背叛朝廷呢！”宪宗对刘辟的任命，大大助长了地方官吏拥兵自重之风，各地节度使争相效仿刘辟，蔑视朝廷，皇帝的权威大大降低。再加上刘辟在得到节度使任命以后，贪心越来越大，又要求兼管整个三川，并擅自出兵兼并周围地区，宪宗随起讨伐刘辟之念。但因刚刚继位不久，担心没有足够的兵力去讨伐，所以犹豫不决，不愿轻易开启战端。

就在宪宗左右为难之际，杜黄裳就藩镇问题上书皇上：“德宗自从经过朱泚(卢龙节度使，曾搞兵乱，自立为帝)作乱的忧患以后，总是无原则地宽容藩镇的行为，不肯在节度使生前免除他们的职务，有节度使故去，他就先派遣中使探察军中人心归向的人物，而将节度使授给其人。有时中使私自收受大将的贿赂，回朝后称誉其人，德宗便立即将该人任命为节度使，对节度使的任命从来都不是出于朝廷的本意。如果陛下准备振兴法纪，应该按照法令制度削弱和约束藩镇，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杜黄裳认为：为了巩固国家的政权，应该而且必须削弱藩镇势力，而且首先应拿刘辟开刀，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宪宗虽然认为杜黄裳的话有理，但仍信心不足。

为了坚定宪宗的信心，杜黄裳上书说：“刘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心气狂傲但又蠢直无谋的书生，征服他就如同拾取

芥子一般容易。”为进一步促成宪宗下令征讨刘辟。杜黄裳又举荐了有勇有谋的神策军使高崇文为将。这样宪宗才采纳了杜黄裳的建议，调兵遣将，征讨蜀中。

高崇文果真不负重望，一路上几次重创刘辟，最后攻克成都，刘辟向西逃往土蕃，最后落水后被生擒。至此西川全境便完全平定了。

四川平定以后，百官入朝祝贺，宪宗望着杜黄裳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宪宗十分感激杜黄裳力排众议，力主削藩，给国家带来了安定。

刘辟被平定以后，藩镇极为恐惧，多数请求入京朝见，自此不再敢于违抗君命。

藩镇势力的扩大，是国家不得安定的主要原因；藩镇的相对独立，使皇权受到削弱。藩镇问题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杜黄裳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力主削藩，从而大灭了藩镇威风，巩固了中央政权。另外，杜黄裳敢执意削藩是因为他对削藩成功与否早已心有定数。藩镇首领，本属朝廷官吏，拥兵割据一方，还敢违抗君命，实属大逆不道，而且在其辖区内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兴师征讨，实属正义之举，必将旗开得胜。灭刘辟之举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简评】

人体是一个整体，其各部的大小粗细都有一定的比例。试想，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和胳膊一样粗，小腿和腰一样粗，这个人会成什么样子呢？

国家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各部也有一定的比例。

封建社会，中央和地方有过多比例失调，最严重的是汉代的诸侯强盛和唐代的藩镇割据以及清亡以后的军阀割据与混战。他们曾给中国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如今，封建统治早已结束，时代不同了。但历史的经验及教训我们能忘记吗？

## 瘫子皇帝治国有方

老子曾经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福祸常常转化。

历史上的很多事，也常常是这样福祸交叉着。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李适病死在皇宫中的会宁殿。这个消息一传出，文武百官极为震惊，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紧张的神色。大臣们倒不是对德宗的死感到意外，因为德宗在正月初已是病魔缠身，并且日益加重。大臣们担心的是由谁来继承皇位，害怕一旦皇位空虚，发生其他变故，比如藩镇兵变，宦官专权等，国家就会陷于混乱之中，百姓将会遭受流离之苦。按照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惯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已成定制。那么群臣为何有此忧虑呢？是德宗无嗣吗？非也。

德宗长子李诵，建中元年(780年)正月被立为皇太子。李诵文武双全，年轻时已开始帮助父皇处理朝政。太子李诵的为人处事颇得群臣好感。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李诵当太子的二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德宗曾想另立太子。由于受父皇的冷落，长期心绪不宁，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感情易于冲动的太子李诵得了中风疾，行动不便，说话也很困难。靠这样的身体状况又怎样执掌权柄，为一国之君呢？群臣的担心也正是如此。

太子李诵虽病魔缠身，但他深知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自己身系重任，如果不及时站出来，国家有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些别有用心的宦官有可能出来生事。为避免国家出现不测，在德宗发丧的日子，太子李诵身着孝服，勉强支撑着有病的身体，走出九仙门，召见各路军使，安定民心。大臣们见太子如常人，惊喜交加。国家有了新君主，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

李诵正式继承皇位为唐顺宗，瘫痪的病体，使他深感无体力、精力理政，处理国政也只好采取特殊的方式。方法之一是，提拔位卑之人为重臣，以获取其对自己的忠心，并用他们来辅佐朝政。当时唐顺宗重用的大臣主要有宰相韦执谊，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等人，这三人都通过科举考试，由低微的寒士而当上朝中大臣的。唐顺宗在当政的短短八个月时间里，正是依靠王叔文等人，办了几件很有气势的事，一扫朝廷中的污浊，震动了朝廷内外。

太子李诵强撑病体召见群臣这一举动，大大出乎群臣的意料，使群臣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担心顿时消失，同时给别有用心的宦官以震慑。另外，唐顺宗在用人之上，深知自己病体给理政带来的不便，为防被架空，必须用忠臣，于是委低微寒士以高官，用其感恩之情，以忠心于己，可见用心良苦，也足见其深谋远虑。

### 【简评】

最能说明福祸转化的，是“塞翁失马”的故事。

边境上的一个老翁，买了一匹马，后来这匹马跑走了。然而，过了几天，这匹马又跑回来了，还带回一匹小马。老翁的儿子因为练骑马，又被摔断了腿，成为残疾。不久，边境上起了战争，老翁的儿子又因残疾而免于被征兵打仗。

李诵得了中风，固然是坏事，但这又使他当政后任用忠臣，信任有能力的寒士，从而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治国政绩。

塞翁失马，安之非福？

## 周世宗改革兵制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改革者总没有好下场。

此话颇有以偏概全的缺陷。

诚然，倒霉的改革者不止一个，比如商鞅，比如白起，比如王安石。然而，我们还可例出更多的下场并不坏的改革者，比如秦始皇，比如桑弘羊，比如北魏孝文帝，比如金世宗，比如忽必烈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改革者有些也有好下场。

五代周世宗也是一个下场并不坏的改革者。

唐末以来，藩镇将帅大多各自招募兵马，战斗力颇强，而朝廷禁军官兵，则累朝相承，因循守旧，几个政权沿袭下来，早已腐败不堪。历代帝王只求相安无事，得过且过，不但没有魄力整编精简，反而唯恐激起变乱。因此，堂堂中央禁军，大多都是老弱残兵，而且骄傲懒散，根本不能作战。每次遇到敌人，如果没有溃散逃走，就一定解甲投降。唐末五代国破家亡，大多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后周世宗郭荣经过高平战役，亲身经历了禁军将领樊爱能、何徽临阵溃逃的事件，才知道这种积弊的严重性。他决心革除这种弊端。

郭荣对待臣说：“大凡用兵之道，士兵贵在精锐，而不在人数众多。而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一百个农夫还供养不了一个士兵，为什么要搜刮尽民间的膏泽，去养那么多无用的东西呢？再说老幼

不分，强弱无别，勇敢的和怯懦的待遇没有两样，怎么能鼓励士兵勇敢作战呢？”于是，世宗下令各军精简缩编，健壮的升入上军，老弱的一律淘汰。这样一来，禁军的人数大大减少了。

周世宗改革兵制更重要的措施是调整地方军队，充实中央禁军。藩镇将帅多自辟兵源，所以骁勇之士都被各藩镇网罗帐下。郭荣下令招募天下勇士，由各州、县送到京师(开封)，命令赵匡胤挑选其中更为强壮的组成殿前各路亲军。而骑兵和步兵各军，也命令将帅分别挑选。自此以后，中央禁军兵强马壮，战斗力之强，近代从没有哪个政权可以比得上。四方征讨，纷传捷报，都是选将练兵的结果。

打仗要靠军队，而要打胜仗，就必须靠精锐的军队。周世宗郭荣看到了五代兵制的弊端，大胆地进行了改革，从根本上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势力，增强了中央禁军的战斗力，这对后周在较短的时间内平定北方起了重要的作用。代后周而起的宋太祖赵匡胤能够很快统一天下、结束战乱局面，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此。

### 【简评】

中国古代的改革者可谓多矣！有权臣，有宰相，有帝王，有贵戚，有文人，有武将……

中国古代改革的内容也多种多样：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军事的、习俗的……

中国古代各色人等实行的各种改革的程度也有深有浅。

改革者的社会地位、权力大小、改革内容、改革程度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改革者的结局发生影响。

英雄不能以成败而论。只要改革有利于社会发展，顺应历史潮流，成也可赞，败亦可赞。

## 景翠一举三得

中国有句成语说：“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意谓双方争战，第三者却得到益处。

秦武王恃强凌弱，不听大臣甘茂劝阻，执意攻韩。楚将景翠采纳东周赵累之计，乘秦攻韩之际，大举攻秦，一举三得。正如俗语所说：“兵无谋不胜。”

秦武三年(前308年)，秦武王想要打通往周室的道路，达到“车通三川(今河南西北部)，以窥周室”的目的，便派遣大臣甘茂出使魏国，联合魏国共同攻打韩国，并命令大臣向寿陪同甘茂一起出使魏国。

甘茂到了魏国以后不久，即令向寿返秦，对秦武王说：“魏国已同意与秦国联合，共同讨伐韩国，虽然如此，请大王还是不要伐韩。”

秦武王听后，亲自到息壤(秦邑)这个地方去迎接甘茂，并询问不能伐韩的原因。甘茂回答说：“韩国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是个大县，地域相当于一个郡。如今，秦国远行千里，涉险奔袭，攻取宜阳实在是太困难了。臣听说鲁国有一个人，与孔子的弟子曾参姓名相同，他杀了人，有人告诉了孔子弟子曾参的母亲，其母不相信，照样织她的布。后来又连续宋。了三个人，告诉曾参之母，其母终于信以为真，扔下织布用的机杼，翻过墙头逃走了。如今，臣的贤能比不上曾参，大王对臣的信任，比不上曾参的母亲对曾参的信任，怀疑臣下的又不仅仅是三个人，臣恐怕有一天大王也会向曾参

的母亲那样扔下机杼，抛弃臣下。所以臣下希望大王不要伐韩。”

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不听从你的意见，也不会听信谗言对你不相信，请你同寡人订下伐韩的盟约。”于是，秦武王便与甘茂盟于息壤而去。

秦将甘茂将要攻打韩国的宜阳城。东周惠王与大臣赵累商议说：“您认为现在的形势如何？”赵累回答说：“宜阳城必然会被秦军攻克。”惠王不同意赵累的看法，对赵累说：“韩国的宜阳城方圆八里，勇士十万，粮饷可以支持几年。韩国大将韩公促统军20万，楚国大将景翠也会率领大军援助宜阳。况且，楚、韩二国互相毗邻，也早有谋取韩国之心，所以，秦攻宜阳，楚必救援。如此，秦国必然不会得胜。”

赵累回答说：“秦将甘茂，本是楚国下蔡人(今安徽凤台县)现在寄居秦国，他攻取宜阳，如果得胜，功劳可以和西周时的周公旦相比，可以担任秦国的宰相；如果攻打宜阳失利，他在秦国也就呆不下去了，因此，他必然竭尽全力攻打宜阳。另外，对于攻打宜阳，秦国群臣持有异议，秦武王不听从他们的意见，决意攻打宜阳，如果失利，这也是秦武王的耻辱。正因为攻打宜阳，关系到秦国君臣荣辱的大事，秦国上下也必然竭尽全力，所以我说宜阳城一定会被秦军攻克。”

惠王对赵累说：“东周与韩国毗邻，宜阳失利，对东周不利，请您替我策划一下，该怎么办？”赵累回答说：“大王可以派人对楚将景翠建议说‘将军的爵位在楚国是最高的，可以执圭临朝议事，将军的官职为柱国，是楚国最高的武官，如果援韩您打胜了，您的爵位和官职都不会再增加了，如果您打败了，就会被处死。所以，您不如等待秦军攻下宜阳城军队疲劳时再出兵攻秦，这样可以稳操胜券。秦国恐怕您乘秦军疲劳之时攻击秦军，必然会拿出宝物侍奉

您；韩国的将军韩公仲感激您的援助，也必然会拿出珍宝进献给您。”

秦武王四年(前307年)，秦将攻取宜阳，到了五月还没有攻下，秦武王遂调动全国的精兵强将，增援甘茂，斩杀韩军6万，终于攻下了宜阳城；秦军乘胜又涉河攻下了韩地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并且筑城防备外患。

此时，楚将景翠乘机率领大军进攻秦国，秦国因攻韩军队疲惫不堪，不能抵挡景翠的进攻，所以，十分恐惧，连忙将煮枣(秦邑)这块土地奉献给楚国，向楚国求和；韩国见楚军助韩攻秦，果然也拿出重宝报答景翠。

于是，楚将景翠从秦国得到了土地，从韩国得到了宝物，东周惠公也非常感激景翠，景翠最终是一举三得。

### 【简评】

东周大臣赵累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首先对秦誓欲攻韩，夺取宜阳的决心了如指掌，鉴于秦强韩弱，赵累早已预料到宜阳必被攻破。又深知楚、韩毗邻，韩国遭到危险，于楚不利，楚国必出兵救韩；而楚将景翠身居高职，助韩攻秦成功，其官其爵不可能再有所提升，如果战败，反而会被处死。赵累针对景翠的处境，进奇计于惠王，使景翠稳操胜券。景翠采纳了赵累之计，以逸待劳，乘秦军攻下宜阳疲惫之时，大举攻秦，不仅使得秦国割地求和，又帮助了韩国和东周，一举三得，充分体现出了赵累的军事才能及军事谋略。

## 料敌如神，兵灭南燕

“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这是人们对于军事战争

经验的高度总结。刘裕破南燕，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一军事哲理。

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南燕王慕容德死，兄子慕容超即位。

义熙五年(409年)，二月，慕容超领兵攻入淮北，擒阳平(今河北大名东)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掠走人口千余家。

三月，辅政重臣车骑将军刘裕上表，请求领兵北伐。

四月，刘裕率军离开都城，从淮河逆流而上，入泗水，达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然后，兵进琅邪(东晋侨治，今江苏向容县北)。

慕容超听说晋军来攻，立即调集人马准备迎战。其大将公孙五楼劝超说：“应派兵坚守大岨，割尽粟苗，以坚壁清野之策对敌。这样，晋军无处寻粮，又不能战，不出月余，定会退兵，到那时我军再派兵掩杀，定获全胜。”慕容超听后，认为不可，说道：“远军必疲，待晋军越过大岨，我以铁骑迎战，不愁不能击败刘裕。岂有先割苗稼，自我削弱的道理！”不听五楼劝告。

慕容超所行，恰在刘裕预料之中。晋军未离京都之前，众将议论此次北伐，有人对刘裕说：“贼闻大军来讨，必不敢战，如若敌军扼守大岨，割粟清野，以绝大军之粮，不仅难以破敌，恐会全军覆没，再难返回。”刘裕听后，说道：“诸将放心，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对此，我已成竹在胸，燕人性贪，不善运谋，进在取利，退惜禾苗。他们一定认为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定会失守临朐(今山东东部)，后退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而我军一旦进入大岨，就只能前进，不能退后。这样，率必死之军，击畏死之敌，又何愁不胜？”

晋军进入大岨，见形势果如刘裕所料，都暗赞刘裕料事如神。而刘裕此时更加高兴，用手指天说：“天助王师，我事已成！”

晋军在刘裕指挥下，果然节节取胜，六月，攻下燕军重地临朐，慕容超率领败兵退守广固。义熙六年(410年)二月，晋军再拔广固。慕容超弃城逃走，被征虏贼曹乔胥擒获，押住建康，斩首示众。南燕遂灭。

### 【简评】

慕容超在晋军进攻面前，图小利，无大谋，又刚愎自用，拒不采纳公利、五楼之计，怎能不败？而刘裕对慕容超的弱点了如指掌，并驱敢死之兵，身先士卒，又怎能不胜？真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 檀祗智退盗寇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是形容一个人多谋略。但“计上心来”必须加上有临事不乱的好素质。檀祗智退盗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檀祗，字叔恭，高平(治在今巨野南)金乡(今山东西南部)人。东晋末，随刘裕共举义旗，义熙八年，官拜青州(东晋侨治，在今扬州西北)刺史、广陵(今扬州)相。

义熙十年(414年)，因犯罪亡命在外的司马国瑶兄弟，在北徐州(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聚集了数百人，渡过淮河，乘一个阴天的夜间，翻越城墙，潜入广陵(今扬州市)城内，包围了王府。一切准备就绪，司马国瑶兄弟高喊道：“现官府已被包围，里面的人快快出来投降！”喊声惊醒了檀祗，他急忙起身想出去看个究竟，刚一出门，便被盗寇一箭射中大腿。他赶忙退入房内，心知自己已被贼寇围住，一时无法出去调集人马，沉思了片刻，忽然心生一计，立即召来侍卫，小声吩咐道：“贼寇乘夜潜入城内，想杀我们个措手不及，你快去打五更鼓，贼闻鼓声，必认为天将放亮，他们隐身不住，定

会撤走。”侍卫奉命，转身行事。

不久，五更鼓响起。司马国瑶兄弟听到鼓声，误以为天要亮了，怕天亮后遭到官兵围杀，急忙率领众寇退出城去。

檀祗闻贼已散，立即调集人马出城追杀，但大部分贼寇已渡过淮河，逃得无影无踪了。

### 【简评】

诸葛孔明临危不惧，用“空城计”退了魏兵；檀祗在被贼兵围困，自己身负重伤之际，用乱点更鼓，解了险危。这都是应急就事的好事例。“情急”之下，并非都能“生智”，关键在于平时多学习、多训练，才能临事不慌，计从心生。否则，如何“情急”，也只能是束手待擒。

## 自断退路败姚泓

楚汉相争中，项羽破釜沉舟，誓与秦军决一死战；王镇恶伐后秦也是沉舟自断退路，何其相似乃尔。项、王指挥的战役都胜利了，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总结之处？

义熙十二年(416年)初，东晋内乱渐息。中外大都督刘裕原本有心北伐后秦，巧逢姚兴死，子姚泓立，兄弟相残，国内骚乱。刘裕见有机可乘，上奏安帝，准备领兵北伐。

八月，刘裕命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为先锋，兵发京都，挥师北上。

王镇恶领军一入敌境，攻关下城，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潼关(今陕西潼关县北)，才停军待命。不久，刘裕军到，召开会议商议进军谋略。镇恶首先请战，表示愿率军从水路进攻长安。刘裕当即

准其所请。

义熙十一年(417年)正月，王镇恶率水军，乘蒙冲小舰从黄河进入渭水，然后逆水而进，向长安进发。晋军所乘蒙冲小舰，将士都隐于仓篷之内。所以，从外面看去，只见船行，不见人影。后秦将士都是北方人，都没见过这种舰船，颇为惊奇，以为神助。王镇恶乘机率军急进，直达渭桥(在今西安城北)，这才命令将士离船上岸。渭水水流湍急，晋军刚一离舰，战船立即被水冲走。有主十卒欲下水截船，王镇恶当即喝住，向众将士说道：“我们的家乡在江南，此地处长安城北门外，距家已有万里之遥。今衣、粮都已随船流去，我们的生路在哪里呢？只有上前、死战、杀敌立功，否则必死无疑！”说完，身先士卒，领军前行。

时，后秦王姚泓见各路人马均已先败，亲率数万兵马屯于长安城北门外，准备与晋军决战。

王镇恶所领晋军，都知己无后退之路，只能拚死而前，还可能杀出一条生路。所以，一见后秦人马，不待王镇恶下令，便勇往直前，冲入敌军阵中，以一当十，拚命砍杀。姚泓军人数虽众，但连连败仗，早已军心不稳，今见晋军已打到长安城下，又各个如狼似虎，吓得如惊弓之鸟，一哄而散。姚泓看败局已定，也只好带了几名随从，打马逃去。王镇恶乘机挥军掩杀，占领了长安城。

第二天，姚泓带领妻子儿女投降了晋军。至此，后秦国灭。

刘裕听说王镇恶攻陷了长安城，心中大喜，赶来称赞道：“佐我成霸业者，真乃卿也！”

王镇恶是刘裕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在辅佐刘裕成就霸业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此人不仅有勇，且有谋。他使用蒙冲小

舰，目的在于惑敌；他登岸弃船，目的在于激励晋军决一死战，终于打败了姚泓，攻陷了长安。

### 【简评】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兵家所经常运用的战法。但韩信运用它，就取得了胜利；马谡运用了它，就丢失街亭，受到军法的处罚。可见其不是一副治百病的药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战例具体运用，这样运用战法才能够得胜利。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害人不少；战争中的教条主义更是危害无穷，这是带兵打仗之人最应该谨守的。王镇恶用的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老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好例子。

## 安颀一战挽狂澜

大兵压城城欲摧，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如何迎敌？退则败，守易亡，出路在哪里？

俗话说：两军相遇，勇者胜。如果有一位英勇善战的将军在此时出战，能把握时机挫败敌人锐气，或许还有转危为安的可能。

下列安颀一战擒夏主，就是这样的战例。

魏世祖内侍安颀，聪慧善辩多谋略，颇象他的父亲高阳王安同。太宗初登基，他任内侍长，受命监察朝中百官，在任上他大刀阔斧，不避亲疏，不计利害，纠举奸佞邪恶从不手软，连涉及到自己父亲的事情也不回避。太宗欣赏他的忠直，尤加信任。

安颀在军旅之中，有勇有谋。世祖时，宣城王奚斤奉命攻打夏主赫连昌，安颀随军任监军侍御使，军队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出发，连续鏖战，追击赫连昌直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此时，

士兵疲惫不堪，粮草不济，战马也因染病损失甚多。奚斤作战比较谨慎，遇敌后，因恐军力不敌，不敢交战，深沟壁垒，加强防备，想固守待援。他派出太仆丘堆等率人到周围地区的百姓中征集粮草，被赫连昌击败，自此，赫连昌愈发猖獗骄横，每日来到阵前挑衅，奚斤打定主意坚守不出，任其叫骂污辱，任其大肆抢掠。城中缺少粮草，又不能出外筹粮牧马，军中人心浮动。安颀眼见这般困境，思量固守决非长久之计，不能让敌军把自己困死在这里，于是他向奚斤提议：“我等本是受朝廷之命来此，讨伐逆贼，如今退守在这穷困简陋的小城之中，即使不被屠城诛杀，也会因作战失利依法论死。进退不得，出路何在，各王公将军对此都一筹莫展。不能战胜敌军，我等将来如何报答朝廷的恩泽，又怎能推卸罪责？”奚斤知道安颀意欲出战，心下不愿，推托道：“今日如若出战，马匹不足，以步军攻击敌骑军，决无取胜可能。故唯有死守城池，等待救援骑军赶到，那时再派步军以城中杀出，里应外合，两面夹击，可全歼赫连昌，这方是万无一失的上策。”安颀反驳说：“现在强敌在外，安逸自在，我们困守城中，士兵忍饥受饿，渐渐失去战斗力，再不出城决战，则危在旦夕。以目前困境，哪里能够坚持等待援军。我们宁可战死疆场，也不愿困在城中坐以待毙。”奚斤固执己见，又以缺少战马为由拒绝。安颀并不退让，针对奚斤的托辞，再次争辩道：“今日战马虽缺，但将帅骑乘，足有200匹之多，我请求挑选精壮勇士，率他们出城交战，即使不能击溃敌军，也可以挫折他们的锐气，灭敌威风，长我志气。再者，赫连昌性情狂躁暴烈，缺少谋略，每每喜欢亲自出阵挑战，我军上下都能认得，若设下圈套引诱伏击，定可生擒，群龙无首，敌军不战自败。”可惜不管安颀怎样据理力争，奚斤死活不肯答应。

经过一番争论，安颀知道奚斤主意已定，自有打算，与尉眷等人秘密商议后，私下挑选了一批精兵快马，等待时机。时间不长，赫连昌又来挑战，安颀早已等得不耐烦，立即率军杀出。士卒个个

认得赫连昌，早就憋足了劲头，一声令下，争先恐后冲去。双方登时混战一场。正好此时狂风大作，尘沙铺天盖地而来，倾刻间天色一片昏暗，战场登时大乱。赫连昌见状急令退兵，安颉哪里肯舍，催马督军死死追赶。慌乱中，赫连昌的坐骑跌倒在地，将他重重摔下马来，安颉的士兵一拥而上，死死捉定，敌人军无主帅，立刻如散兵游勇，不可收拾。安颉派人将赫连昌押送到京城报功，世祖闻捷报大喜，立刻加封安颉为建节将军赐爵为西平王，统摄全军。

虽说打败了赫连昌，但奚斤身为主帅，无功有过，自感惭愧，为挽回一点颜面，冒冒失失率兵追击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直追到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遭到伏击，一战就败下阵来。赫连定乘机再克安定，复取长安。世祖得知奚斤战败被俘，马上诏令安颉镇守薄坂(今山西平济西)，抗击敌军。

### 【简评】

安定一战，安颉在危急时刻果敢出击，奋勇力拚，转危为安，扭转了整个局势。他胜就胜在知己知彼，勇而多谋，及时捕捉战机，当机立断上。安颉力战赫连昌，并不是要逞一时之勇。他知道对手虽然强横，兵力上占有优势，但也有弱点可以利用；他知道自己的军队虽然暂时处于劣势，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必然为求生路不惜拚死一战。为此，他率死战之兵，冒险出战，借风沙之利，生擒了夏主赫连昌，将敌军击败，解了安定之围，也使自己转危为安。

## 王朴纵论《开边策》

《邵公谏厉王弭谤》、《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两篇文章，人们大多读过，讲的是“民言不可塞”、广开言路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帝王，都喜听官民的谏言，因为

这样不仅可修身，还可为定国安邦提供不少良策。

后周世宗柴荣，也是一任这样的帝王，他胸怀统一天下的大志，令近臣广献良策，这才引出王朴纵论《开边策》。

后周世宗皇帝柴荣英明毅武，面对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深为忧愤。自显德元年(954年)在山西高平大败北汉后，深知民心所向，慨然生出削平天下归于一统的雄心大志。显德二年(955年)，世宗遣将西征，击败后蜀军队，收复秦、成、阶、凤四州。与西征的同时，世宗命近臣二十余人各作《开边策》一篇，研究统一的战略、策略。柴荣对宰相们说：“我常常考虑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却不得要领，即令吃饭睡觉，也都念念不忘。自从后唐、后晋以来，东吴、巴蜀、幽州、并州等地，分别跟中原隔绝，不能统一。希望朝廷官员踊跃献策各抒己见，给我参考。”

比部郎中王朴献策，主张平定天下，应该“先易后难”。他先分析了致乱的原因，说：“中国所以四分五裂，先后失去吴、蜀、幽、并，都起因于不符合治国之道。现在必须探讨失去的原因，然后才能找到收复的策略。起初，不外乎君王昏庸、臣属邪恶、军队骄横、百姓困乏，奸党在朝廷内部作乱，武夫在外部恃势凶暴。因小成大，积微成著。要想收取失地，最有效的方法，是反其道而行之。擢升贤能，斥退庸小，就可以收揽人才；推恩施惠，诚信相待，就可以得到民心；赏功罚罪，就可以使人尽心尽力；戒除奢侈，厉行节约，就可以使国家财富增加；不误农时，轻敛薄赋，就可以藏福于民。等到人才聚集，政事走上轨道，财富充实，人心归附，然后统筹运用，任何功业都可完成。

针对各割据政权的不同情况，王朴提出了“先易后难”的统一策略。他说：“凡攻取之道，从容易攻取为好。南唐与我们疆土相接，边界几乎有二千里，最容易使对方疲于奔命。我们的攻击，当从他

他们没有准备的地方开始。他们防备西边，我们就攻击东边；他们防备东边，我们就攻击西面。他们势必东奔西走，到处援救。从他们军队调遣的情形，就可以探听出他们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而击虚，避强而击弱。不必出动大军只用轻兵骚扰即可。南人懦弱，接到边境小小警讯，一定会出最大兵力赴援。大军频频出动，必然民力疲困财用竭尽；如果不出大军，我们就可乘虚攻取。这样，长江以北的州郡都会为我们所有。待夺取江北，则利用他们的人力，由我们指挥；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江南，那长江以南也是容易攻取了。如果得到了江南，那岭南、巴蜀，只要传一道檄文就可平定。南方统一之后，燕云十六州之地，将会望风归附。如果不归附，便移兵北向，北方便可席卷而平。只有后汉是我们誓不两立的仇敌，恩情诚信，毫无用处，只有决战一途，应该用强大的兵力，把他们摧毁。然而，他们自从高平之役战败，力量衰竭，士气沮丧，一时还不足以为边患，可以留待往后再讨灭。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再找机会出击，可一举而擒。”

后周世宗柴荣对王朴的建议非常感兴趣。当时，文武百官大多数苟且偷安，所提意见，很少有可取之处。只有王朴神气俊爽干劲，有谋能断，所作的筹划设计，都合柴荣的心意，柴荣敬重他的器量胆识。不久，擢升他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 【简评】

王朴所献“先易后难”，先平定南方、再恢复北方的策略，受到后周世宗的赏识。但世宗并没有完全采用这一策略。而是把辽朝认定为主要对手，以收复燕蓟为首要任务。只可惜壮年早逝，不能实现其抱负。王朴之策实际上为北宋采用，影响很深。从王朴纵论天下大势看，他是深谙治国要领和用兵之道的。世宗皇帝善于知人，用人，这是他能较短的时间南征北战，为统一奠定基础的重要原因。



## 第二章 赛马谈兵，齐威王拜师（下）

### 周世宗改革官制

一个政权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其对官员的选举以及政策、制度。后周世宗的吏治政策，或许对后代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整饬朝政。重视文官，朝官外任，就是重要的一项。后汉时，三司使王章主管钱粮财政，他出身小吏，对文臣十分轻视。对儒士出身的官员，倍加刻削，发给月俸，都是取那些军中不能用的物资代替，称作“闲杂物”。又命有司把价格估得很高，估定后再给抬高，谓之“抬估”。这样，文臣的俸禄拿到手就更低了。后周世宗柴荣做了皇帝后，对这一弊政进行了改革，取消了王章所行的折价估物的代俸钱的做法。他说：“文武百官所发的俸钱，不但远远低于军中将领，而且还用折价估物的方式付给，这难道是均养的道理吗？如果他们有过失，我不能庇护他们。可朝中文臣责任重大而俸钱菲薄，这对朝政是很不利的；今后都应该用实钱支付他们的俸养。”世宗的这个决定，不仅是使文臣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排除对他们的歧视，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敢于进言、任事。

世宗重视文臣的措施果然激发了官员言事的积极性。中书舍人窦俨上疏，对选拔人才，任用官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他说：“治理国家，没有比选拔人才更重要；选拔人才，没有比物色宰相更重要。但是自唐朝末年以来，中央滥用国家的官位。一个地方官员刚刚当上宰相，就兼任三公、仆射。当他还没有得到时，钻营奔走，不遗余力；一旦得到了，就以沉默寡言取悦当世，反而一味盼望除机要重任，只剩下尊贵的官衔，逍遥在山林亭台之间，用来保护家族的安全。请求陛下现在就诏敕宰相，在尚书省六部尚书、中书、

门下两省给事中、中书舍人以上的官员中，推荐他们所赏识的人才。如果陛下平素知道他们确有才能，自然升迁。如果不是这样，则不妨让该员仍保留原来官职，而兼代新的职务。一年以后，考察他的成绩，假若称职，而原来的官位已经很高的话，则命他当宰相，原来的官位不很高的话，则逐渐擢升，仍然继续代理。假若不称职，则免除其代理，责罚保荐他的人。又，文武百官，只有官衔而没有实质的职务的，占一大半。请酌量他的才能，外放到地方政府当官，负责实际工作。调回朝廷后，仍用他原来的官职铨叙，考察他的成绩，有才干的擢升，没有才干的罢黜。”

世宗看到窦俨的奏章，非常赞赏，听从了他的建议，整顿相治，引范质、李谷、王溥、魏仁浦等为枢密、平章之类要职，开始扭转武人左右朝廷的局面，为宋朝开其先导。而调朝官任外职，减少冗官，培养人才，尤其是朝廷用人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此例一开，实行中颇见其效，宋代踵其法，尔后竟以朝官知州县事为实际的地方官员，而团练、防御诸使，反倒成了虚名。世宗的改革，为宋朝的统一和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简评】

重用文官或者重用武职，这并不重要；任人唯贤，考其政绩，才是主要的。后周世宗柴荣重视文臣，扭转武人左右朝廷局面，是有感于唐末藩镇割据、武人拥兵自重的现实。这一改革有利后周政权的稳定，中央集权力量的提高。北宋踵其法，重用文臣，抬高其地位、待遇，也是从巩固中央集权考虑。但物极必反，过份的重用文臣、轻视武将，使朝廷冗官滥职，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边防的力量。大兵压境，而宋人议论未定，直接的原因，就是太抬高了文臣的地位。此一教训，后人当引以为戒。

## 杨公则治军

兵法历来重视将领的表率的作用，《淮南子·兵略训》中就说“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正是将帅的身先士卒，才能激励起士气，造就一支无往而不胜的军队。

古之良将中，治军有方、激励有道的不乏其人，如战国时的吴起、三国时的诸葛亮等人，而南齐时的杨公则，也称得上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名将。

杨公则字君翼，是天水(治今甘肃天水)西县人。公元501年，南齐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讨东昏侯萧宝卷，在江陵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杨公则被授为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

当时，萧衍正屯军于汉口包围鲁山城、郢城，尚未攻下。杨公则受命率领湘府之众前来与萧衍会合。

鲁山、郢城被攻克后，萧衍命众军顺长江而下，杨公则被任命为先趋，一路上袭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定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杨公则所领之兵，战斗力并不强，然而所建军功居多，这主要得益于杨公则治军有方。

杨公则善治军，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杨公则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士兵作出榜样。当萧衍大军进至新林(今江苏南京西南)时，杨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他亲自登上城楼，观察战场形势。敌人在城中远远望见领军府北城楼上有一柄盖伞，知道是个主帅，便用神锋弩射之。这一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杨公则所坐的凳子腿。左右吓得脸都变了色，可杨公则只说了一句：“啊！差点射中我的脚。”仍就没有动身，谈笑如初。还有一天夜里，萧宝卷派人偷袭杨公则大营，军中顿时惊扰。杨公则躺在床上动也不动，镇静地布署反

击。主帅的镇静无畏，对士兵的作战勇气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第二，杨公则善于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他所领的士兵多为湘西的山民，他们大多没打过仗，没经过刀光剑影的厮杀阵势，所以心怀怯懦，战斗力不强。这点就连南京城内的敌军也体会出来了。他们认为杨公则的军队战斗力弱，好打，所以每次出城交战，都先冲着杨公则营垒而来。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杨公则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另一方面设奖励军，刺激士兵们立功。所以杨公则部打仗最多，克获也最多。

第三，杨公则治军，号令严明，秋毫不犯，纪律性极强。南齐的首都建康被围即久，大势已去，王珍国、张稷等人发动兵变，带兵进入宫中，杀死皇帝萧宝卷，并将其人头送给萧衍，献城投降。城内宣布投降，城外许多受降的军队，见到从城内出来的官员，便纷纷上前，将他们身上的衣物洗劫一空。只有杨公则，亲率麾下，列阵于东掖门，护送城内出降的公卿士庶，秋毫无所侵犯。城内百官闻此，纷纷出东掖门，到杨公则军中投降，所以杨公则军受降居多，建功也居多。

### 【简评】

为将之道，首先应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方可励士。诚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杨公则治军，重视表率，激励士气，纪律严明，他统率的部队才能屡建战功。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效仿吗？

## 冯道根守阜陵

古人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否能再加上一个“大勇若怯”呢？

勇和“怯”，往往是辩证的关系。一味斗勇，虽“力拔山兮”，也终不免落个“四面楚歌”的下场。而表面“怯”敌，实则谨慎从事，谋事于先，操胜算于帷幄中。此又何怯之有？

因此，大智方能大勇，而智又常是“怯”的结果。

冯道根字巨基，是广平郡郡县(今湖北均县东南)人。他16岁那年，乡人蔡道班率军攻蛮人锡城，被蛮人围困，冯道根前去救援，匹马转战，杀伤敌人甚多，终于把蔡道班救出。从此，冯道根的名声大震。南齐末年，萧衍起兵襄阳(今湖北襄樊)，冯道根率领能打仗的乡人子弟投奔萧衍，攻打南京时，冯道根勇猛无比，杀敌甚多。梁朝建立后，冯道根被任为骁骑将军，后迁为游击将军。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冯道根被任为宁朔将军、南梁太守，镇守阜陵。冯道根一到阜陵，便大修城墙，派出探马，探听北魏军队的消息。他的这些举措，就好像北魏军队马上就要前来似的。众人都笑他胆小，冯道根自嘲地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怯防勇战吧。”

冯道根不管众人的嘲笑，仍旧修城不止，整日如临大敌。就在冯道根积极备战时，北魏大将党法宗，傅竖眼率领2万多人杀到城下。此时，阜陵城还没完全修好，城里兵众又少，据城抵御很难取胜。那些嘲笑冯道根胆怯的人再也笑不出来了，而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倒是被笑为胆怯的冯道根显出了大将风度。他命令手下大开城门，自己穿着便装，不着铠甲，登上城楼观战，并派出200精兵出城力战，大败魏军。魏军看到城上主帅神意安闲，城下士兵勇猛，认为阜陵难攻，便退兵而去。

【简评】

这正应合了古人说的“为将须有怯时，不可专勇。”此中之“怯”，绝非胆怯，而是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出一些表面似乎是怯懦的举动，以争得喘息之机，智取强敌。

记得三国时，诸葛亮屯兵五丈原，急于要与魏兵交战，但见魏兵坚守不出，就心生一计。他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妇人的装束，并写信羞辱其与妇人何异。不想司马懿虽心中发怒，却当众展示此物，并笑着说：“孔明视我为妇人耶！”仍紧闭寨门不出，终使诸葛亮激将之计未能得逞。

这可能是文学家夸张的笔墨，但也说明能忍一时之忿，不逞匹夫之勇，知己知彼，此种“怯”难道不是智者之所为？

冯道根面对强敌的进攻，不是采取硬拼的方式，而是避实就虚，以静制动，终使敌兵退去，不愧是智勇双全的将军。

## 杨侃计出解城围

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是战争中常用的一种谋略。

孙子曾作过形象的比喻，他称用兵的法则象流水一样，水流动起来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那么用兵应是避开敌人防守坚实的地方而攻击其空虚薄弱的部位。

这也给指挥作战的人出了一道难题，就是怎样统观全局，找到敌军的薄弱之处进行攻击。下面的战例，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案的。

魏孝昌三年(527年)，雍州刺史萧宝夤占据关中(今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反叛，自称齐帝，尚书仆射长孙稚奉命前去征讨，华阴伯杨侃随军出征，被委任为镇远将军、谏议大夫、为长孙稚的行台左

丞，不久又传任通直骑散常侍。

长孙稚率军队行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安营扎寨，其后召集部属商讨作战事宜。杨侃知道叛军据险守关，强攻难以奏效，主张智取。他援引旧朝战例，并为长孙稚分析军事形势，他说：“当年魏武帝曹操与韩遂、马超对阵，各自据守关隘，长期相持不下，难分胜负，这并非是他们各自的才智、勇气、谋略以及算度相类似，而是因为山河险峻，地形复杂，形成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他们都无法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战胜对方。现在叛军固守潼关(今陕西省潼关县北，为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占尽了地形险要的优势，即使当年能征惯战的曹操再世，也难以施展才华。”杨侃建议：“我军必须向北攻取蒲坂(今山西永济县)，再飞舟渡河向西岸，这样兵士没有了退路，背水一战，只有拚死向前才能杀出生路，如此则士卒必然人人奋勇，争相搏杀，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叛军见此奋勇之师，必然恐惧而不敢接战，那么华州(今陕西华县)的围困就可以不战而解。潼关守敌一旦听说华州之围已解，必会惊恐万状而望风逃散，溃不成军。如此，则各州城相继平定，而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不日即可解围。如果我的计策可以采纳，请准我领兵为先驱，率先迎敌。”

长孙稚仔细地听过杨侃的建议，沉思了一阵，又犹豫起来，他说：“叛军薛隋义已围困了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薛风贤又保有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我军都督宗正珍孙前去平定叛军，受阻长期停驻在虞坂(今山西省平陆县)一带不能前进，你计策虽好，但我仍担心叛敌人多势众，相互呼应，你的计策难以奏效，故心存疑虑，难下决断。”杨侃听长孙稚分析敌情，知道情势严峻，长孙稚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杨侃自有破敌良策，他说：“宗正珍孙本是军伍中的一个武夫，因巧遇机缘而得以晋升发达，其实并无德能，他只可被人驱使，而不能指挥驾驭他人，一旦被授子主帅的重任，去指挥

三军作战，必然神迷意乱，不知所措。如此庸才，只知力拚，不善智取，哪能抵挡围城的贼军呢，不能克敌致胜，自在情理之中，不能以此推断敌军实力。另者，河东郡的治所在蒲坂，西面靠近黄河，郡中百姓多在东面。薛傥义驱赶青壮丁勇西行围困郡城，父老妻儿都留在原址，如果我军逼临此地，必使叛军方寸大乱，他们挂念家室，人人思归，则郡城的围军自然散去，不战就能克敌解围，这岂不是明明白白的东西吗？”

长孙稚听杨侃讲得头头是道，分析得在情在理，于是采纳了他的计策，命令自己的儿子长孙彦率领骑兵与杨侃一道从弘农渡河北进。因他们统领的都是骑兵，惯于野外作战，不宜攻打城池，便屯扎在石锥壁。杨侃又出一计，命令手下四处张贴告示，称说：“现在我军驻扎此地，等待步军到来后一起发动攻击，同时观察各村的人心向背，然后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若肯于归顺的，待我军中点燃烽火，也马上举烽火响应，表示已经归降；若不举烽火响应，即不肯归降，我军到后就要大开杀戒，荡平村庄，以犒赏三军。”各村百姓见到告示，互相转告，入夜，不管是真归顺还是假归顺，见军中点火，都纷纷点了起来，一夜之间，烽火绵延达几百里。围城的叛军见此壮观景象，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怕生出意外，恐惧中四散逃归，各奔东西，薛傥义弹压不住，见军队溃散，只好只身逃走。随后，长安之围顿解，杨侃的计策获得了成功。

### 【简评】

大家都知道“围魏救赵”的故事吧，它早已收入到“三十六计”中去了。其实，此计说的就是避实就虚。对付强大的敌人，不要硬碰硬地打，而是想法去调动和分散他们的兵力，然后乘其疲惫再加以消灭。

因此，谋略的恰当运用，确实是克敌制胜的法宝。魏军能迅速

连解数城之围，并未遭到太多兵马损失，难道不是得益于杨侃的计谋吗？

## 降仁杲秦王论战

正确运用战略战术，乃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古人云：“用兵之要，先谋为本。”欲取胜敌方，必须先胜算于心，谋划周全，尽可能做到“知己知彼”，再去战场工具体实施。这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道理。

义宁二年(618年)，李渊逼迫隋恭帝杨侑退位而称帝，改元武德，建国号曰唐。李渊称帝之后，拜李世民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

早在唐高祖李渊由太原起兵之前，河东(今山西省)汾阴(治所在今山西万荣西南宝鼎)人薛举已在金城(县名，治所在今甘肃兰州西北)举旗造反，发兵拘捕州县官吏，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百姓。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封其长子薛仁杲为齐公，封次子薛仁越为晋公，招集各路义军，兵势十分强大。大业十三年(617年)，薛举在兰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兰州市)称帝。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薛举率军攻打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秦王李世民率军队前去讨伐，交战不利，李世民兵败而还。九月，薛举死，他的儿子薛仁杲即皇帝位。秦王李世民又挂帅出征，攻击薛仁杲。双方在折蔗城(在今甘肃泾川县东北，又名薛举城)相持六十余日，李世民命军队深沟高垒，坚守不出。薛仁杲的军队十余万人，士气十分旺盛，频频来唐军营外挑战，李世民坚守营寨，按兵不动，以消磨敌军的锐气。薛军十余万人，每日耗粮数量巨大，后方粮食一时运不上来，营中的存粮不久即将用尽，薛仁杲的部将牟

君才、梁胡郎率本部人马投降了唐军。秦王李世民对众将说道：“敌军的士气已经衰落了，我军现在应该向敌人发起进攻了。”于是派遣将军庞玉先在浅水原的南面列阵以引诱敌人，薛军将领宗罗喉引军前来交战，庞玉的军队几乎战败。不久，秦王李世民亲领大军从浅水原以北冲杀过来，使敌人出乎意料。宗罗喉望见唐军以铺天盖地之势冲杀过来，急忙回军抵抗。秦王李世民率领数十员勇将冲入敌阵，唐军两面夹击，使宗罗喉军大败，被斩首数千级，跌下山涧峡谷而死的不可胜数。李世民率身边的二十余名骑兵追击敌人，直到折蔗城下。薛仁呆极为恐惧，据城自守。日将落时，唐朝大军追了上来，将折蔗城四面包围。第二天早晨，薛仁呆请求投降，唐军俘虏了敌人精兵1万余人，男女5万余口。

事后，众将纷纷向李世民祝贺，并问道：“当初，大王在野外与敌人交战，击败敌人，敌人的主将还保有坚固的城池，大王您没有攻城的器械，只率轻装的骑兵飞速追赶敌人而不等待步兵，直逼敌人城下，我们都心存疑虑，担心不能得到敌人的城池，可是终于夺下了敌城，这是什么原因呢？”

秦王李世民说：“这是以权谋逼迫对方，使对方的计谋来不及施展，因此能够打败他们。宗罗喉倚仗往年曾打过胜仗，更兼长期养精蓄锐，见到我军不出战，心中轻视我们。后来看到我军出战，自然十分高兴，出动全部军队来交战，我军虽然打败了他们，可是擒获、消灭的敌人很少。若不急速追赶敌人，使敌人得时间逃回城内，等薛仁呆把他们收拢在一起并安抚他们之后，我们再想捉到他们就很难了。而且，那些士兵都是陇西(甘肃西部)人，一旦败退，不暇回顾，他们逃回陇西，那么折堆城内自然空虚，我军紧跟着逼近城下，这正是薛仁呆之所以心内恐惧而投降的原因。这是预先谋划好的策略，难道众卿都看不出来吗？”众将说：“这样稳操胜利，不是平常人所能赶得上的。”

这次战役俘获的薛军精壮士兵极多，秦王仍然让薛仁杲兄弟及薛军统帅宗罗喉、翟长孙等人带领。秦王与这些降将一起游猎驰射，亲密无间。这些降将深蒙恩宠，又深被秦王的威势慑服，都愿意为秦王效死力。但遗憾的是，回到京城以后这些降将无一例外地被处以斩刑。

### 【简评】

战场上的主动权是由人来操纵的，而这种人又是指能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谋略家。

兵法上说：“避其锋锐，击其堕归。”就事说在敌人士气旺盛时，要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当敌人士气衰落时，再集中优势兵力去攻击敌人。那如何才能有效地使用这一计谋呢？就需要军事指挥者审时度势，预先进行谋划，再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而灵活运用。

李世民采取的就是这一策略。他先按兵不动，命军队坚守营寨，使敌人锐气尽消，给养供应不上。然后趁敌军疲惫不堪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击败。这种一鼓作气，速战速决的战术，也值得称道。它往往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正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

所以，我们应从中受到一些启示，即做事要预先谋划，不能草率行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 赵普献计安天下

人们对自己所经历过的事，往往有深切的体验。

汉初的统治者，目睹秦朝暴政致使秦亡天下的事实，所以在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后，长时期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

南朝刘宋的开朝皇帝刘裕，是在东晋王权衰弱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实力从东晋司马氏手中取得天下的。所以他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实集权，以防止再有强者从自己手中夺取江山。

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利用手中重兵迫使后周幼主让位而取天下的，所以对握有重兵者也疑忌万分。

于是，便有了赵普献策，劝皇帝控制政权、财权、兵权的一幕。

从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灭唐建梁，到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代周建立宋朝的50多年时间里，中原地区先后建立过梁、唐、晋、汉、周5个王朝。同时，在中原地区四周的汉族聚居区先后还存在过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前蜀、后蜀、北汉

10个政权。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攻伐征战不断，烧杀劫掠，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分裂局面更加严重。

五代十国统治者多以地方藩镇起家。他们不仅在其势力范围内掌握着万民的生杀大权，大肆征兵征税，掠夺百姓，扩充自己的实力，而且依靠其手中的军队，互相吞并，兵变易帅，一旦有机可乘，便兴兵作乱，改朝换代，成为新的朝代的统治者。这样不断的兴王易姓更刺激了人们的贪欲，使得地方藩镇割据势力恶性膨胀。

五代十国后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藩镇起家的统治者，把强大的镇兵直接变成中央的禁军，使中央的力量不断增强，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遏制地方藩镇势力的发展。虽然发生了这样一些重大变化，但分裂局面没有改变，地方藩镇势力拥有兵权的局面没有改变，国家命运依然掌握在握有重兵的武人手中的局面没有改变。事实上，赵匡胤就是根据当时后周主幼国疑的形势，利用手中掌有

的重兵，经过精心策划，发动陈桥兵变，迫使后周幼帝柴宗训让位而夺取政权建立宋朝的。

赵匡胤亲身经历了五代战火不断，王朝频繁更替的混乱时期，深知拥有兵权的地方藩镇势力的危害。如何防止武人兵变夺权一幕再次发生，如何能使自己夺来的江山长治久安，传之万世，不再像前面那五个朝代那样短命，赵匡胤殚精竭虑，寝食不安。

961年，赵匡胤在平定了后周藩镇李筠、李重进的反叛后，不顾初秋的暑热，马上召见了心腹大臣赵普，把自己的疑惑、担心、希望合盘托出，向赵普问计。

赵匡胤说：“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的姓氏换了八个，战斗不息，百姓惨死，其原因是什么？我想结束天厂征战不已的局面，为国家做长久的打算，该如何去做？”

赵普回答：“陛下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社稷百姓的福气。这没有其他的缘故，只是因为藩镇的势力太大，君弱臣强，局势自然无法控制。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逐步削夺藩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入，将藩镇的精兵尽收于陛下手中，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了。”

还没等赵普说完，赵匡胤对赵普所说治国安邦之策已经心领神会，他打断赵普的话，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明白了。”

赵普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所以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将藩镇手中的政权、财权、兵权收到中央，由皇帝亲自控制，不仅使中央的实力大增，也使禁军将领和节度使更便于控制，而且也仿佛是釜底抽薪一般，从根本上摧垮了藩镇兵变割据、谋权夺位的基础，从根本上解决了君强臣弱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

赵匡胤在接受了赵普的建议后，便雷厉风行地采取措施，用巧妙的手段削夺了诸藩镇的兵权，将天下精兵编入禁军，成功地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宋初统治者对兵权问题的高度重视，在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后，军权完全集中到了皇帝手中，但同时也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作战要依皇帝钦定作战方案来进行等等一系列弊端。在后来宋军对辽、西夏的作战中，兵权高度集中的弊端显现出来，使得宋军屡遭败绩，形成了积弱局面。这又是赵匡胤、赵普当初在定计安天下时所始料不及的。

### 【简评】

北宋王朝，积贫积弱。战争连年，巨额赔款，造成其贫；高度集权，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其弱。

一个事物，本来就有利与弊、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北宋军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甚至连具体作战方案，都要以钦定批准。军权确是牢牢控制了，但这样军队能打胜仗吗？如果北宋皇帝能将军权适度集中，同时又给军队一定的自主权，情况恐怕会好得多。

## 杯酒释兵权

中国人对酒的使用，真是一种供人们研究的文化现象。

文学家借酒写出多少流传千古的诗文！

军事家借酒写出多少动人心魄的战争话剧！

政治家借酒解决多少棘手难办的政治难题！

“杯酒释兵权”讲的就是酒与政治的故事。

建隆元年(960年)春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史称北宋。

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赵匡胤废寝忘食，殚思竭虑。

赵匡胤亲身经历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又利用他担任殿前都点检、掌握禁军的机会，亲自策划了代周建宋的陈桥兵变。历史的经验使他认识到，谁控制了兵权，特别是控制了禁军的统帅权，谁就掌握住了国家的命运。为了不使兵变夺权的那一幕重演，为了宋朝不再是个短命的王朝，赵匡胤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牢牢地控制兵权。

建隆二年(961年)春，赵匡胤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蔡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赵匡胤曾以殿前都点检发动兵变，为了防止类似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赵匡胤便取消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他自己亲自直接掌握禁军，迈出了收取兵权的第一步。

对藩镇势力恶性膨胀所造成的危害，赵匡胤有切身的体验，所以很快就接受了赵普提出的逐步削夺藩镇的权力，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确定了进一步收兵权的方针。但是在是否收回拥立赵匡胤为帝的那些亲信将领手中握有的兵权的问题上，赵匡胤与赵普产生了分歧。

当时，王审琦、石守信等人作为赵匡胤的亲信，又有拥立之功，都在禁军中占据着重要的职位。赵普曾多次请求赵匡胤将这些

人从禁军中调出来，授以其他的官职，可是赵匡胤对赵普的这份苦心，并未能理解其真正用意，他对赵普说：“他们这些人是绝不会背叛我的，你又何必担心呢？”

赵普说：“我也不担心他们背叛陛下。但是我认真地考察过这几个人，发现他们都不具备驾驭属下的才能，不能很好地控制他们的部下。如果不能有力地控制部下，那么军中万一有人犯上作乱，到那时他们也只能是身不由己了。”

赵匡胤这时才明白赵普的良苦用心，认识到兵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一旦落入他人之手，便有可能成为叛乱夺权的工具。于是赵匡胤下定决心，将兵权彻底收归中央，由他一人掌握。

收兵权是件极为敏感而棘手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兵变，造成混乱。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前车之鉴。赵匡胤是个嗜酒之人，也许是酒精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决定把这种难办的事放到酒桌上来谈，酒桌上宽松、融洽的气氛有助于君臣达成共识。于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赵匡胤决定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来宫中饮酒。

酒席上，君臣痛饮，大家都十分高兴。酒酣之时，赵匡胤见摊牌的时机已到，便让侍立四周的人都退下，接着便向过去是自己的故人，现在又是自己的臣下的这些人诉起苦来。

赵匡胤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也当不了皇帝，我会永远感念你们的恩德。可是作天子也太艰难了，还不如作节度使快乐。”

石守信等人忙问为什么。赵匡胤便接着说：“这不难知道，试问在坐诸位，有谁不愿意作天子！”

石守信等人闻听此言，都惶恐不安，连忙向赵匡胤叩头说：“陛

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来？现在天命已定，谁敢还怀有野心，想作天子。”

赵匡胤说：“你们说的不对。你们虽然没有野心，但你们手下的人想贪图富贵，一旦你们也被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不愿意作皇帝，但那可能吗？”

石守信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便连忙向赵匡胤叩头，哭着说：“我们很愚笨，没有考虑到这些事，请陛下可怜我们，为我们指条活路吧。”

赵匡胤见他的一席话已经震慑住了石守信等人，便劝慰道：“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那些想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得些金钱，好自己享用，也使子孙无贫困之虞。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任节度使，多置良田，广建美宅，为子孙置下永远不可动摇的家业，再多置歌儿舞女，每日欢饮，以终天年。我再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这样咱们君臣之间，便不必相互猜疑，上下相安，不也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赶紧拜谢说：“陛下为臣等考虑的如此周到，正是给臣等指明了一条求生之途。”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称病，请求赵匡胤解除他们的军职。赵匡胤大喜，在重赏石守信等人的同时，便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武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侯、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罢去了这些人的军职。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从此取消了。

这样，赵匡胤便将统帅禁军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 【简评】

一顿酒、一席话，赵匡胤便收回了兵权，看似轻巧、容易，实际上，赵匡胤是举重若轻，经过了精心的谋划。

赵匡胤废掉殿前都点检一职，由他亲自掌握，这为杯酒释兵权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有利的保证。

利用酒宴解决棘手的兵权问题，既可使众将容易接受，又避免了流血，开创了和平解决兵权问题的先例。

恩威并施，既指出了众将对皇权存在着威胁，又指明了出路，防止了众将铤而走险。

采用赎买政策，对交出兵权的众将，以重赏的方式予以补偿，既使众将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保障，又安抚了人心。

赵匡胤正是以这样环环相扣的周密安排，顺利地完成了收兵权这件头等大事。

### 第三章 范仲淹安边有方（上）

大凡名人，都是因某个方面的特长出名。人们只知道他出名的方面，对其它方面则有所忽略。

提起李白，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诗仙，其实他还炼过仙丹。提起张飞，人们立刻想到他威武鲁莽，其实他也有巧用心思的时候。

提起范仲淹，人们立刻想到他的诗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范仲淹安定边塞也是相当有成效的。

宋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赵恒死后，其子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

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西夏王元昊正式称帝。宋仁宗对元昊称帝极为不满，派出人马准备攻击元昊。宝元二年(1039年)，元昊先发制人，向宋发动进攻。到宋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攻取了宋、夏之间重要的军事要塞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县东南)，兵锋直指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延州周围的各堡垒大多已失守，宋朝西北边疆又燃起战火。

范仲淹见西北烽火不断，便主动向宋仁宗要求去延州，于是宋仁宗调任范仲淹为户部郎中兼知延州，以抗击西夏进攻。以前，诏令规定按官位高低分统边兵：总管领兵10000人，钤辖统领5000人，都监统领3000人。当敌寇来犯时，就让官位低的将领先领兵出击抵御。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说：“作战不选派得力将领，而是按照官位高低来出战，这是自取失败之道。”于是范仲淹整顿州兵，精选出18000人，分为六队，每位将领统率3000人，分别进行训练，根据敌人来犯的多少，让他们轮番出战抵御敌人。当时塞门寨(今陕西安塞县西北)、承平寨早已经废弃，范仲淹就采用种世衡的方法，

在青涧筑城，占据敌人往来的要冲，大兴屯田，并且允许民间贸易，以互通有无。范仲淹又看到百姓远道输纳赋税很辛苦，便请求将鄜城(今陕西洛川县东南)建为军一级行政单位，让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南)、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今陕西华县)之地就近向延州输纳租税，春夏时节就调军队去这些地方取得给养，这样可以节省十分之三的购粮费用。宋仁宗下诏将鄜城改为康定军。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宋仁宗下诏令陕西各路出兵讨伐西夏。鉴于当时的形势，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建议，他说：“正月的塞外天寒地冻，我军势必露野挨冻，不如等春季到时再进兵，那时敌人马瘦人饥，势必容易制服。何况现在边防已逐渐修整，我师出战纪律严明，敌人虽然猖獗，但其气势已经受到震慑。鄜州、延州与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北)为近邻，又是西羌人来犯的必经之路。我们应按兵不动，静观其内部发生矛盾，让臣慢慢用恩惠和信义招纳他们来归附。不然，战争要长久地持续下去了。如果我的这些计策没有作用，那就应先举兵夺取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然后占据要害地区，屯兵坠田，作长久作战的打算。这样茶山、横山的少数民族必定会扶老携幼前来归顺。开拓疆土，抵御敌寇，这才是上策。”宋仁宗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

当初，元昊称帝攻宋时，暗中引诱已归属宋朝的羌人来帮助自己，而环庆路(今甘肃庆阳县)600多羌人首领相约去为元昊作向导，不久事情败露，范仲淹认为羌人反复无常，他一到环庆路便奏请巡视边境，以皇帝的名义犒赏羌族名族。范仲淹检阅羌族部落的人马，根据当时的情况，为他们立下规矩：“如果仇恨已经和解或了断，动不动又私自报复并伤人的，罚羊100只，马两匹，杀伤人命的处斩。因债务纠纷而引发诉讼，可以让他们到衙门告状，由官府处理，擅自扣押人质的，罚羊50只，马一匹。敌人的战马进入边

界，不跟随本族去抓捕马匹的，每户罚羊两只，扣押他们的首领。如果敌人大举入侵，老幼全要入寨，由官府分配粮食；如果不立即入寨，本家罚羊两只；全族不进寨的，扣押他们的首领。”羌族各部都接受这项诏命，从此开始为宋服务。

在范仲淹的谋划下，宋与西夏边境上的城寨开始修复，军队得到训练，对来归顺的少数民族都以诚相待，西夏军队不敢贸然浸入他的辖区，汉、羌人民相继回乡重操旧业。

每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不一样，谋略也就有大有小。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处理与西夏关系时，便从大局着眼，每项政策的出台，都切中时弊，因而也就能有良好的收效。

### 【简评】

智慧是人的一种本质的、内在的东西。智者从事某种社会实践活动，就会在这个领域里迸发出智慧的光芒。

恩格斯在商业、自然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军事等领域，都取得过突出的成就。

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思想、诗词、书法等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知。

陈毅不但会打仗，诗也写得很漂亮，围棋下得也不错。

只要是金子，在什么时候都会闪亮。

## 借古喻今论新法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运动声势浩大。但变法的一开始，

就遭到了相当部分大臣的强烈反对。主张变法者与反对变法者唇枪舌剑，引经据典，互不相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改革，相继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以期达到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局面，从而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王安石实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遭到了司马光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说服宋神宗放弃变法主张，司马光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机会、场合，对宋神宗进行劝谏。

当时，司马光为翰林兼侍读学士，经常为宋神宗讲解史书，而坚决支持变法而为王安石赏识的吕惠卿也被宋神宗任命为崇政殿说书。这样，坚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两派势力，终于在宋神宗面前就变法问题发生了面对面的激烈争论。

这天，宋神宗来到迺英阁，听司马光、吕惠卿等人讲读历史，当读到汉代曹参接替萧何为相后，凡萧何所立规矩，曹参都不加以丝毫改变地继承执行，史称萧规曹随时，正在谋划变法的宋神宗由此产生了疑问，他忍不住问道：“汉代总是按萧何定下的办法治国而没有丝毫改变，这样做可能么？”司马光乘此时机便向宋神宗进言道：“不用说汉代，假如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都是遵守他们的开国之君——夏禹、商汤、周武王所定下的制度，那么夏、商、周三代就是到现在也不会灭亡。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定立的法度，致使盗贼遍及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政策，汉代的家业也就开始衰败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祖宗之法是不可变的法。”

吕惠卿听到司马光的议论之后，便马上对宋神宗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每年正月开春，在宫门外公布法令；有五年

一变的，如天子巡守考察礼乐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如《尚书·吕刑》篇所说刑罚世轻世重。司马光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不对的，其目的在于批评陛下的朝政。”

宋神宗于是便问司马光有无这个意思，司马光说：“在宫门外颁布的法令是旧法，诸侯中变礼易乐的人，天子对他们要进行诛罚，并不是天子自己要变法。治世用轻典，乱世用重典，这才叫世轻世重，但这也不是变法。况且，治理天下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居室，破旧了就应进行修补，没有大的损坏，就不用再建新的。现在公卿侍从都在场，请陛下去问问他们该如何做。三司使是掌管天下财政的，缺乏才干不称职可以罢黜他的官职，但不能让宰相染指三司使的事务，现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不知是为什么？宰相是用道德来辅佐皇帝的，怎么用得上条例，现在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为什么？”

吕惠卿一时答不上来，便指责司马光在其他事情上的过失。宋神宗劝解说：“朕让你们相互讨论，辨明是非，何必这样呢！”

论战双方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的争论已趋白热化，受到指责的司马光便又将问题引到现实的变法中来，他说：“平民百姓放债收息，还能使贫困的人破产，更何况具有催督之威的官府向百姓放债呢。”

吕惠卿说：“按青苗法，愿意借钱的就借给他，不愿意的也不强求。”

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债时的好处，不知道还债时的难处，不只官府不勉强百姓借钱，富裕人家放债时也不是强迫别人的！当初太宗皇帝平定河东(今山西太原)时，立糶米法，当时一斗米有十钱，百姓愿意将米卖给官府。后来米贵了，而官府仍按一斗米十钱

买百姓的米，于是这籴法便为祸河东有好几代了。臣担心，用不了多久这青苗法也会成为国家的祸患。”

宋神宗说：“由粮仓来籴米如何？”

司马光站起来说：“这样不合适。”吕惠卿也站起来说：“籴米百万斛，可以把省下来的东南地区的漕运费用送往京城，以满足京城的需要。”

司马光说：“现在东南地区钱少而米多，现在如果官府不籴米而送钱来，这是弃其有余而取其所无，这样本末都会受到损害。”

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说的很对。”这样双方的争论当天也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几天，宋神宗又将司马光留下来问话，宋神宗说：“现在天下纷乱，就和孙叔傲所说的‘国家想这样做，而众人却厌恶’一样。”

司马光说：“是这样的，陛下应分清孰是孰非。现在条例司施行的政策，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等人认为做的对，难道陛下就和这三个人一起治理天下吗？”宋神宗觉得司马光的话有道理，便想重用司马光，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宋神宗决定去同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商量一下。

王安石听了宋神宗的打算后，他对宋神宗说：“司马光表面上以直言上谏之名，内心却怀迎合下情之实。他说的都是干扰朝政的事，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有害朝政的人，陛下要把他安排在身边，让他们参与国政，这可是变法消长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是不能有害于国家的，但如果他身居高位，那些反对变法的人便能借助于他的地位和声望来反对变法。韩信树立起汉朝红色的旗帜，赵军的士气就低落下去了，现在陛下要重用司马光，这是给那些反对变法的人

树立红色的旗帜。”

于是，王安石让韩琦上书宋神宗，说他卧病在家请求辞官。宋神宗想让司马光作枢密副使，司马光只希望宋神宗放弃变法，而不愿只作个高官，便反复推辞不肯接受。王安石又复出视事，重用司马光的事也就作罢了。结果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湖北阳新县)。一场关于变法的争论也就以王安石的胜利而暂告一个段落。

### 【简评】

北宋时期，积贫积弱，外忧内患，政权极不稳固。有识之士如。王安石等，提出改革、变法，是有利于当时的社会进步与国家的稳定的。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衰败，可以看出其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商鞅如果不变法，秦国何以强？赵武灵王不胡服骑射，赵国何以强盛？……时代在前进，死守祖宗之法者不足取。当然，如何“变”、如何顺应历史潮流，需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现实问题，进而提出改革的措施。这一点，王安石做得并不够，以至变法之中出现了毛病，出现了偏颇，这方面也是后代有志于改革者所应该汲取的教训。

## 王安石变法图强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始而轰轰烈烈，终于沉寂失败。但变法的精神与意义却是巨大的。在“王安石变法”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东西。

北宋发展到宋仁宗时期，对外采取以岁币换取和平苟安的作法，一味守内虚外，致使辽、西夏不断讹诈、侵犯；内部随着官吏、军队人数的急剧增加，出现了冗官、冗吏、冗兵。这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甚至发展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形成了积贫积

弱的局面，国力在大大衰落。

面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行变法改革，以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王安石实行的改革变法，就是变法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成效的一个。

王安石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要以天下为己任，作一番大事业。从他步入仕途开始，他便致力于富国强兵，竭尽心力经营他的变法大业。

王安石思维活跃，不被陈腐的思想所羁绊，当时的人往往认为他的观点高深新奇。为了在全国实现他的变法图强的主张，他向宋仁宗上万言书，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和蓝图，在万言书中，王安石针对宋仁宗因怕人议论而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法先王”的口号，主张法其意不法其政，为变法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吏治败坏，朝臣得过且过，因循守旧的弊端，他主张要培养能够富国强兵的人才，以适应变法改革的形势。但是，这次上书未被宋仁宗接受。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来到京城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刚当皇帝的宋神宗很快召见了王安石，听取他的改革意见，王安石便趁此机会再次向宋神宗提出了变法改革的主张，并写了《本朝百年大事札子》，剖析了北宋的形势，指出了因循守旧，苟且贪图进取的恶果，说明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危害，阐述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年仅二十多岁的宋神宗正想有所作为，改变朝廷积贫积弱的局面，于是，在王安石的鼓励下，宋神宗便于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

王安石虽然有一套变法的理论，但在当时如果按往常的处理政务的方法和程序，很难在短时间内推行变法，于是宋神宗专门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鉴于当时因循苟且之风日久，朝中官员难以接受突然而来的变法，王安石又特地选拔了

积极支持变法的吕惠卿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推荐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为实行变法提供了人事保障，使得在朝中形成了以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为核心的变法力量，开始推行变法。由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中全是积极支持变法的人，所以能使王安石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一系列新法。在变法实施的过程中，王安石还利用他身居相位的有利条件，不断越级提拔中下层支持变法的官员，以加强变法派的实力，同时对反对变法的人，运用各种手段，将他们从各级官员中清除出去，以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

王安石不仅有一套变法理论，而且他还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任鄞县(今浙江宁波市)知县时，他便采取过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的办法，以减轻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同时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变法，其中有些法令，便同王安石在鄞县采取的措施一致，不过此时王安石实行的变法措施，是为了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问题，因此变法的范围，影响也就更广泛、更深入了。

针对国家财政匮乏，王安石采取了开源与节流并得的方针，“青苗法”、“家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法令的实施，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促进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均输法”则在合理调备国家物资，节省开支上起到了作用。

针对国家军队人数庞大但战斗力极低的现象，王安石通过“将兵法”精简军队，节省军费，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卒，大大地提高了军队战斗力；通过“保甲法”在农村建立了严密的治安网，并组建了保甲武装，达到了维护治安，抗御侵扰的目的，通过“保马法”节省了政府养马开支，也增强了保甲武装的战斗力量。在解决积贫积

弱的同时，王安石还改革科举与学校制度，统一思想，培养变法改革的人才。

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朝中权贵的经济利益受到了直接冲击，特别是在抑制高利贷对农民盘剥、减轻农民负担等问题上，朝中权贵们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态度，各种议论蜂起，他们运用各种手段诋毁，阻挠新法的推行。对此，王安石同反对变法的人展开激烈的辩论，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运用各种手段打击反对变法的势力。由于主张变法的宋神宗对王安石采取的变法措施的成效认识不清，因而也一度动摇，再加上推行变法的人中亦有些人谋求私利而发生分裂，使得王安石两度罢相，但由于王安石变法以求富国强兵的目的与宋神宗的希望一致，所以在王安石罢相之后，变法仍能继续进行。

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变法开始，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终于有了些转机与起色，在王安石苦心经营下，变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财政收入大增，军力作战实力明显增强，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由于朝中权臣的激烈反对，致使王安石在颁布法令之后，大部分精力用于同反对者论战，无暇对变法进行完善、深化，所以新法弊端便成为反对者攻击的口实，因此在宋神宗死后，新法便被废除殆尽。

### 【简评】

变法就是改革，改革就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在北宋时期国力大为衰退的情况下，改革更是势在必行。年轻的王安石站在变法的前列，敢于与强大的保守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殊嘉。而他所提出的变法意见和措施，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也是切实可行的。历史的每一进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王安石的变法也不例外。变法的成功、失败、成功……回环往复，坎坷曲折，有志之

士就在此中奋斗，拼搏……封建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是如此，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难道会那样一帆风顺吗？我们需要的也是要奋斗、拼搏的精神。

## 计除奸相阿合马

有奸佞无道之徒的倒行逆施，就会有忠臣义士的拍案而起。元代奸相阿合马终因恶贯满盈而遭诛，正是因为义士王著的有心讨贼……

阿合马，中亚回回人，元世祖时大臣，历任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中书平章政事兼制国用使，主管国家财政。他阿谀奉上、专权自恣、横征暴敛、贪赃不法、打击异己，朝野上下敢怒而不敢言。因其善于敛财，元世祖忽必烈对他格外赏识，擢升他为丞相。

阿合马的暴行，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以太子为首的许多大臣也极为不满。益都(今山东青州)的军官千户长王著是个嫉恶如仇的侠士，平素就爱抱打不平。他让人铸造了一个大铜锤，发誓要亲手杀死奸相阿合马。僧人高和尚善施法术，常在军中走动。王著和高和尚秘密合谋，暗中结交天下义士，准备为民除害。至元十九年(1282年)春，世祖与皇太子北幸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阿合马留守京城大都(今北京市)，他更加目无法纪，百姓怨声载道。王著、高和尚决定乘此机会下手。他们率领几十人亲信进入京城。

三月十七日上午，王著派两个西藏的喇嘛到中书省，诈称当晚太子与国师(大喇嘛)一起到宫中作佛事，让他们来置办斋戒用具。中书省的官员并没有得到太子返京的消息，有些怀疑，便叫来太子东宫的官员来辨认他们。东宫总军高黼等不认识这两个喇嘛，用藏语问他们，皇太子现在行至何处？两人支支吾吾，神色很不自然。

高黼、工部尚书兼东宫总管张九思恐怕有诈，加强了东宫的守卫。

中午，王著又派人找到太子的亲信、枢密副使张易，矫传圣旨，命令他当晚带兵到东营门前待命，参加铲除阿合马的行动。张易对阿合马十分仇恨，听了“圣旨”，大喜过望，根本没有细想，慨然应命。

晚饭后，王著亲自去见阿合马，向他传达太子的“命令”，说太子就要回宫，让中书省官员入宫迎驾。

阿合马听说太子返京，赶忙派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率人前去迎驾。他们出城走了十多里地，果然遇到了“太子”一行。其实，这是王著早已布置好的，他召集了上百个平日结交的义士，组成了“太子”的仪仗队。“太子”斥责脱欢察儿等怠慢无礼，喝令处死了他们，随后来到城下，守城的卫士闻“太子”驾到，哪敢阻拦？进得城来，已是夜里二鼓。

张易已经领兵来到东宫前。高黼出来问他这是干什么？张易神秘地说：“半夜你自然就知道了。”在高黼的一再追问下，张易附在他耳上说：“太子要诛杀阿合马啊！”

此时，正当万籁俱寂，远远就传来人马的“踏踏”声。“太子”的仪仗来到东宫门前，有一人上前传呼开门。高黼对张九思说：“太子殿下以前还宫，总是派完泽、赛羊两人来通报，让我们见此二人才开门。”高黼便喊二人的名字，结果无人答应。他们不敢贸然开门。

王著等义士进不了东宫，索性直奔中书省。“太子”传令中书省的官员前来拜见，早已等候在省中的官员一个个出来行礼。“太子”列举了阿合马的几大罪状，阿合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早已被王著用大铜锤敲碎了脑袋。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中书省的官员们吓得战战兢兢，魂飞魄散。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值班的官员远远地看了，也莫名其妙。高黼张九思大喊：“快杀贼党！”率领东宫卫士赶来。王著等义士毕竟寡不敌众，一阵苦战后，只有少数几个脱围，大部分人战死，或被擒。

王著、高和尚等以叛逆罪被杀。临刑前，王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大声说：“我王著为天下除害，虽死无憾，后人自有公论。”

阿合马死后，人心大快，大臣们纷纷表奏他的罪恶。世祖幡然悔悟，叹道：“王著做得对！”下令剖开阿合马的棺木，戮！”。

### 【简评】

阿合马残暴无道，人人得而欲诛。王著、高和尚等，为天下除害，计杀阿合马，实属大快人心。从王著等设计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王著不仅仅是徒有一腔义愤的匹夫之勇，而且是颇懂用兵之道的谋略家。否则，以阿合马的权势，防范的森严，性格的奸诈，而最后身首异处，也难矣。王著最后被围，临刑之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陈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其浩然正气，永留青史。

## 李孟计定宗庙

元代国祚虽不算长，但宫廷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成宗与武宗期间，就又演出了一幕争夺皇位的斗争，而武宗的师傅李孟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元成宗病逝。因为太子早死无后，成宗的皇后卜鲁罕与左丞相阿忽台等商议，图谋立拥兵镇守河西的

安西王阿难答为帝，由卜鲁罕垂帘听政。

成宗兄答刺麻八刺的长子怀宁王海山正在漠北镇守，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与母亲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作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嫡亲，成宗既歿，海山兄弟成为众望所归。卜鲁罕派军队截断了海山返京的道路，对手无实权的爱育黎防范稍松。

右丞相哈刺哈孙秘密派人去与海山兄弟联络。同时，他以大位未定为由，命令有关部门把印章、符节交上来，藏在了密柜内。然后，他托病在家，不再上朝。卜鲁罕、阿忽台多次催他出来办公，甚至送来了拟好的文件，让他签署，他都推托重病在身，一概谢绝。

接到哈刺哈孙的报告，爱育黎迟疑不决。他的老师李孟劝他说：“世祖有遗训，支子不得继嗣。眼下先皇驾崩，怀宁王远在朔漠，皇后卜鲁罕违犯祖训，阴谋立支子安西王为帝，天怒人怨，宗庙社稷危在旦夕。殿下您务必陪伴着母亲尽快赶回宫中，挫败他们的阴谋，早日安定人心。否则，国家的安危，吉凶难卜啊！”爱育黎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毕竟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过了两天，李孟再次劝导他说：“殿下，事不宜迟啊！如果彼等奸谋得逞，一纸诏书令你们母子回去，你们再不从，那就是抗旨，属谋逆大罪。到那时，性命难保，哪顾得上社稷江山啊！”爱育黎感激地说：“先生的这番话，可谓社稷之福。”

李孟，出身于儒士家庭，自幼博学强记，满腹经纶，喜谈古今治乱得失的道理。他曾经开门授徒，远近的学生竞相拜他为师。后来，他奉诏入朝修史，海山、爱育黎兄弟拜他为师。海山出镇漠北后，李孟随爱育黎母子出居怀州。他对爱育黎精心辅导，诲之不倦。爱育黎早年丧父，把老师当父亲一样孝敬，经常向他请教齐家治国的道理。

李孟让爱育黎母子乔装改扮，只带了几名随从，悄无声息地回到京城。李孟先去拜访在家“休养”的哈刺哈孙。进门后，正好碰上卜鲁罕派人来询问病情，他与哈刺哈孙交换一下眼色，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来，坐下给哈刺哈孙诊脉。卜鲁罕的家仆以为他是看病的郎中，告辞了。哈刺哈孙向他介绍了宫中的情况，并就斗争策略交换了意见。

李孟回来对爱育黎说：“形势万分紧急！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卜鲁罕一旦垂帘听政，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

爱育黎手下的人意见很不一致。有人对他说：“卜鲁罕皇后深居九重，大权在握，控制着成千上万的卫兵；安西王拥兵自重，回到京城后，从者如云。殿下赤手空拳，怎能斗过他们呢？不如暂时静观事态的发展，等怀宁王提兵南下，里应外合，行动不迟啊！”

李孟心急如焚，但他仍然耐心地向爱育黎陈述着利害。他说：“那些奸臣违背祖训，党附中宫，阴谋拥立支子，这是天命人心都不答应的。如果殿下敢于在朝廷上晓之以理，有君臣大义的大臣，一定会弃暗投明。相反，若是安西王窃取了位号，就是怀宁王回到京城，他怎么会甘心拱手相让呢？一定会挑起内战，使黎民涂炭，社稷动摇。况且，您若不采取果断的措施，不仅自身难保，还使母亲罹患，兄长患难，这有失孝悌之心。您坐失良机，当断不断，有愧于您的聪明才智和超人的勇气。”

爱育黎左右为难，便让人去找一个算命先生来占卜。一个身穿儒服的人被请了进来，李孟远远地出来迎接他，嘱托他说：“先生，此事关系社稷安危，全靠您了，一定要说是吉卦！”算命先生果然摇出一个乾睽吉卦，并说：“君子乾乾，可以举事；飞龙在天，可以大治。”爱育黎听了大喜，下了决心。

李孟派人与哈刺哈孙、判大宗正事兼两城兵马都指挥使阿沙不花商定举事的计划。三月初三，哈刺哈孙、阿沙不花密迎爱育黎入宫，诈称怀宁王派人来召安西王、阿忽台等商议国事。安西王等先后赶到，被早已布置好的兵士一一抓了起来。

阿忽台等大臣被立即处死，安西王等宗王被押送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不久也赐死。爱育黎以太子的名义监领国事，派人去迎请怀宁王。五月，怀宁王返京即位，以爱育黎为皇太子，确定为皇位继承人，这就是元武宗、元仁宗。

武宗返京前，爱育黎任命李孟为参知政事。李孟推辞说：“执政大臣，也应该由天子亲自任命。天子尚未回京，我怎敢接受任命呢？”不久，他悄然离京，出外过起隐居的生活。

### 【简评】

李孟老谋深算，辅助武宗登基，大有诸葛孔明遗风。而功成身退、淡泊名利，又与汉代张子房相媲美。其“先发制人者制人，后发制人者制于人”之言论，深得兵家之奥旨，假使李孟生于春秋之际，当是孙、吴之材矣！

## 朱元璋复学诲将

兴教办学，是历代明智之君的作为，朱元璋就是其中一位。即便在天下还未安定、身处戎旅之中，他还是率先办学，重视教育的育人作用无疑应该受到称赞。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派遣胡大海进攻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但很久都没有攻下来。于是，朱元璋亲自统率10万精兵前去征讨，终于攻下了婺州城，并把婺州路改为宁越府。

当时，天下动荡，战事不断，学校都被迫关闭了。朱元璋有感于此，在安顿好婺州军政事务后，命令知府王宗显开办学堂，聘请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先生，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人为训导。婺州城里又能听到读书声了，百姓无不欢欣。

安抚好宁越，朱元璋打算进一步攻占浙东地区其他的州县。出征前，朱元璋召见诸将，告诫他们说：“攻占城池虽然要用兵动武，但平定战乱，安抚百姓必须用仁义。就象我军当初进攻集庆(今江苏省南京市)时，秋毫无犯，所以一下就平定了这个地区。如今才攻下婺州城，百姓开始复生，在治理时应该安抚、救济，让百姓乐意归附于我。这样，其他还没有攻打的州县，就会闻风归顺。我每当听到部将们攻下一座城池，占领一个州县，不胡乱杀人，就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军队的作战与行动，其兵势就像烈火一样，火力旺盛，人们必然要四处躲避。假如领兵作战的将领能以不杀人作为自己的准则，这不仅对国家有利，就是自己的子孙也会因此而得福。你们要牢记这个道理，不可掉以轻心！”诸将都点头称是，自此不敢滥杀无辜。

### 【简评】

重儒修学，培育人才，功在当世，利在千秋。朱元璋身为割据一方的义军首领时，能够用儒士，恢复学校，重视教育和人材的培养，说明朱元璋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智者。而身处战事之中，谆谆教诲部下将领以仁义安民，攻城掠地不妄杀无辜，以不杀人作为将帅的准则，于国于民于己都会有益等，这种作法和思想，正是乱世时安邦定国的大道。

## 仁宗施仁政

旱、涝、冰雹、蝗虫是人类经常遇到的天灾。

封建社会，自然灾害对百姓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对统治者来说，却是收买民心的好机会。

民心可以收买，而且其价因时而异。在饿殍遍野的大饥之年，减免税粮，开仓赈济，就可以稳定民心，换取百姓的好感。

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刚即位不久，就遇到了饥谨之年，山东、淮安、徐州一带粮食严重歉收，但为了应付朝廷的庞大开支，有司仍加紧征收税粮，以至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仁宗知道了这件事后，决心要减免这些地方的税粮。一次，仁宗故意当着众朝臣的面，问一位刚从南京来到京城的地方官员说：“你所经过的地方情况如何？”起初这位地方官还不敢照直说，在仁宗一再地逼问下，才回答说：“淮安、徐州、山东，很多百姓缺乏粮食，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有司正急着征税粮，造成地方上的混乱，甚至出现了抗税不交的现象。”

仁宗听完，又问众大臣：“众卿以为如何？”他见众臣不说话，便说：“民可载舟，也可覆舟，这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朕要免去这些地方的税粮，以稳民心。”随后他招来少保兼兵部尚书杨士奇，令其起草诏书，免掉这三地的税粮。

杨士奇听到皇帝的吩咐后，却有其顾虑，他想：此事应由户部、工部负责，我替皇帝起诏，下令免税，岂不有超越职权之嫌？

于是，他对仁宗说：“此事可先令户部、工部知道，方为妥善。”仁宗略加思索，便断然说道：“不必通过他们了！救百姓的穷困，应当像救火和救溺水者一样急迫，不能迟疑。有司总考虑国家用度不足，必会犹豫不决，一旦推脱下来，岂不误了大事？”仁宗见杨士奇还再思虑，索性让太监取来纸笔，逼着杨士奇就立在说话的门楼上，把诏书写完。

仁宗见诏书已就，又仔细阅览一遍，随即派遣使臣火速前往山东等地颁诏。然后，回头看了一眼立在那儿的杨士奇，开心地说：“现在，你可以去户部、工部了，告诉他们：朕对这些地方，已免去粮税了！”

当诏书颁布以后，有些大臣还曾提出异议，说：“这些地方总共有千余里，未必都是颗粒不收，应该有所区别，减免一部分就可以了。这样，才不致于滥施恩德。”

仁宗针锋相对地回答：“抚恤百姓宁可过厚，广施恩德。朕为天下之主，能与百姓斤斤计较吗？”

### 【简评】

“民以食为天”，每一个执政者都应把它奉为金科玉律。作为封建皇帝的明仁宗，都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的道理，主动减免饥馑之民的税粮，以换取百姓的信任。而当今有些地方，仍搞“乱摊派”，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不应该自省吗？仁宗深知免除税粮的紧要性和急迫性，视之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又了解实施起来的阻力之大，如经过户部、工部等机构的逐级贯彻，势必会延误时机，因此，他果断地采取直接下诏书的方式，让其迅速生效。这种治国方针和谋略，确实有兹借鉴之处。

## 第三章 范仲淹安边有方（下）

### 排众议赵王获救

据说女娲造人的时候，为了让人能听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特意在他们的头上一边捏了一只耳朵。

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主张“兼听”，用现在话讲，就是听取不同意见。

人要“兼听”，才没白长两只耳朵。

人要“兼听”，才会有公正的判断。

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就听到赵王朱高燧参与汉王反叛的议论，他将信将疑，一直拿不准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赵王与汉王的关系相当密切，朱高煦起事，赵王不可能一无所闻，间接地卷入进去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赵王是宣宗皇帝的亲叔父，感情甚好，先王在世时也很喜爱赵王，如果真要对他下手，还是真有些于心不忍。

宣德元年(1426年)秋，宣宗在返京抵达献县(今河北献县)单桥时，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前来迎驾。他与宣宗一见面，就提议：应该迅速移兵彰德(今河南安阳市)，捉拿赵王朱高燧归案。宣宗踌躇不决，便召见几位大臣商议。

杨荣马上赞同陈山的意见，称：这是关系国家的大计，决不能姑息养奸！还说：“陛下应下一道诏书，谴责他与朱高煦共同谋反，然后大军突然开抵彰德，就可将其擒获。”另几位大臣不敢不同意，也随声附和。宣宗见此便依从了杨荣的意见。

杨荣随即传达圣旨，令杨士奇草拟诏书，杨士奇却说：“指控朱高燧参与谋反，此事应有真凭实据，天地鬼神，岂可欺骗]而且草拟诏书，以什么为理由呢？”

杨荣马上厉声地说：“这是国家大事，岂可加以阻拦？至于证据二可以让锦衣卫迫使所拘禁的汉王府的人供认，说与赵王共同策划反叛，何患无辞？”

杨士奇坚决不同意，说：“锦衣卫如此逼供，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只有三个儿子，皇上亲叔仅此二人，汉王谋反定不能饶恕，但赵王如没有牵连，理应厚待，只有这样，才能安慰皇祖在天之灵。”

两人争执不下，宣宗也不想草率从事，因此，没有攻打彰德，而是下令返京了。

回到京城后，参赵王谋反的奏折仍如雪片般飞来，大多都奏请把赵王的护卫军全部削去，然后将其召到北京拘禁起来。宣宗并未听从，他想：就是多数人的意见也不能盲从，如果不慎重从事，不仅错杀亲人，也会使一些跟随先皇的老臣寒心。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还是多听听相反的看法吧！于是，他派人召来了杨士奇。

宣宗对杨士奇说：“进言者弹劾赵王的愈来愈多，怎么办呢？”

“陛下，”杨士奇回答说：“现在宗室的人，只有赵王最亲，应当设法保护他。因为有许多皇室宗亲，想利用这次机会，把赵王打倒，大臣们也各有所图，不能全信，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不要被群臣的言论所迷惑！”

宣宗听后连连点头，说：“朕也想设法保全他，他是朕唯一的叔父了！但应当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全他。”

最后，宣宗与杨士奇终于想出了一个妥善的办法。即把群臣弹劾赵王的奏疏封在一起，派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刘观带给赵王阅览，由赵王自己决定应该怎么做。这样一来，既消除了赵王的戒心，知道皇帝还是信任他的，又可以试探出他是否真的有反心。为了保险起见，宣宗也令杨士奇起草了一封敕书，盖好御印，交与袁容等人带给赵王。

果然，袁容等人一进赵王府，赵王就欣喜若狂，看到宣宗送来的大臣们的奏疏，及赦免他的敕书，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喊道：“我可以不死了！不死了！”急忙上表谢恩，并主动交出自己的护卫军，由袁容他们领进京城。

赵王这么一做，也就自然平息了进言的大臣们的种种议论。

判断复杂的情况，不能只重现象，妄加结论；更不能人云亦云，受所谓的舆论的操纵。明宣宗对赵王参与谋反一事，始终不肯轻信，既有看重亲情的一面，也有不偏听偏信的谨慎的一面，尤其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受所谓大多数人的看法的左右。当他确信了赵王没有卷进叛乱的事实后，巧用智谋，把大臣们的奏书交给赵王手里，不仅消除了赵王的疑虑，取得相互的信任，也平息了一场无休止的风波。

### 【简评】

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变成真理。

这当然是谬论。

然而这个谬论对那些耳根子软缺乏主见的人却很适用。当人们反反复复向他灌输虚假情况时，他竟能认假为真。当然，这是他在虚假面前变得昏头昏脑，丧失了判断能力，并不是谎言真的变成了

真理。

判断复杂的情况，不能只重现象，妄下结论；更不能人云亦云，受所谓舆论的操纵，明宣宗对赵王参与谋反的传言，始终不肯轻信，是出于一种亲情呢，还是由于他不偏听偏信呢？恐怕二者都有。

## 裴行俭平叛兵不血刃

唐代裴行俭是书法家，也是一个善于用兵的将领。其击败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斛延都支及击败阿史德温傅等事迹，军事史上永留英名。

仪凤三年(678年)，吐蕃背叛唐朝，洮河道行军大总管中书令李敬玄、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人率军与吐蕃战于青海之上，唐军大败，刘审礼被俘。

高宗降旨，任命裴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不久，又任命裴行俭为秦州镇抚左军总管，受无帅周王指挥。仪凤四年(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斛延都支和李遮旬煽动各部落侵犯安西(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他们还与吐蕃结成联盟，共同侵犯唐朝边界。高宗与朝臣商议对策，许多大臣认为应该出兵讨伐突厥，裴行俭建议道：“吐蕃叛变，朝廷出兵平叛，干戈尚未平息，李敬玄、刘审礼兵败将亡，元气大伤，怎么能又在西部地区发起战端？现在波斯王已经去世，波斯王子泥涅师师在京城长安充当人质，希望陛下派遣使者前往波斯，册立王子为国王，若如此则使者途经西突厥，可以见机行事，必可获得成功。”高宗采纳了裴行俭的意见，就命令裴行俭任唐朝使者，送波斯王子归国，册立为王，并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使者。

裴行俭受命之后，即率领军队护送波斯王子向西进发。途经莫贺延沙漠(在今新疆阜康县东)，突然大风骤起，黄沙弥漫，天昏地暗，连向导也迷失了方向。裴行俭命令全军就地扎下营寨，命令祭天的人告诉全军将士，水源离此地不远，让大家安心等待。不久，云散风停。离营地仅数百步，水草丰茂，全军上千都悦服裴行俭的预测。

队伍到达西州(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大小官员出城迎接裴行俭的队伍，裴行俭召集西州城内豪杰子弟一千多人随队伍西行。裴行俭故意扬言欺骗部下道：“现在正值暑热季节，沙漠中炎热难以忍耐，等到秋季，天气转凉之后，才可以慢慢西行。”西突厥百姓可汗阿史那匍延都支令人探知了这一情况，就不再安排防守事宜。裴行俭召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众部落的首长豪杰，对他们说：“回忆往昔到此游历，从未感到厌倦，即使回到长安，一时一刻也未曾忘怀。今天借着这次行程，想重游旧地，各位谁能陪同我一起打猎呢？”当时，各部落酋长的子弟应募者有1万人。裴行俭假装带领他们游猎，实际在教导他们行军打仗之事。经过几天的训练，裴行俭就率领队伍以加倍的速度前进。在距离阿史那匍延都支的部落十余里时，先派遣都支亲近的人前去问安，表面装出闲暇无事的样子。完全不像要袭击他。接着又派人前去召请他来会面。阿史那匍延都支在此以前与李遮匐约定好，秋季抵御唐朝使者，现在突然听说唐朝军队到来，手足无措，不知计从何出，就亲自率领儿、姪晚辈及众首领五百多人到唐军营前来拜见唐朝廷使者裴行俭。裴行俭便命令预先埋伏的将士，把以阿史那匍延都支为首的五百人全部擒获。当天，传出阿史那匍延都支的令箭，让各部落的首长都来听命，裴行俭将他们全部抓获，押送到碎叶城。裴行俭选拔精锐的骑兵，轻装倍道行进，准备捕捉李遮匐。中途，果然抓获了由李遮匐那里返回的都支的使者，李遮匐的使者与他们同来，也一同被唐军抓获。裴行俭释放了李遮匐的使者，让他回去告诉李遮

匐，都支已经被擒。李遮匐听说都支遭擒，唐军已到眼前，深感自己孤掌难鸣，难以抵敌官军，于是率众前来投降。裴行俭部下将士在碎叶城立石碑，以记录这次平定西突厥叛乱的功劳。

裴行俭留下部下得力的将领，带领大部分军队把守碎叶城，监押都支等西突厥叛变的首领。自己则带领部分军队，继续西进前往波斯，吊祭波斯老王，册立王子泥涅师为王，完成使命之后，返回碎叶城，押解着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等人回到长安。

高宗在朝廷上，当着文武百官慰劳裴行俭道：“当初因西突厥叛乱，要派卿总领军队前去讨伐。卿孤军深入敌境，长途行军1万余公里，靠了卿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及料敌如神的深远谋略，兵不血刃，便将叛党消灭，终不负朕的重托。”不久，又赐宴奖赏裴行俭。宴会上，高宗对裴行俭说：“卿文武兼备，所以现在授予卿两个职务。”当天就拜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 【简评】

裴行俭在阿史那匐延都支、李遮匐煽动叛乱，李敬玄、刘审礼新败于吐蕃的不利情况下，出奇谋，以册立波王为名？兼行平定西突厥叛乱之实。《孙子兵法》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裴行俭正是这样一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将军。他把平叛的真实目的完全隐蔽起来，把假象做得令敌人确信不疑，然后出其不意擒获敌人首领，使叛军完全瓦解。这样不费一刀一枪，不伤一兵一卒，以奇谋克敌制胜，比起大军进剿，与敌人正面拼杀，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 李光弼以少胜多坚守太原

李光弼为唐代大将，在“安史之乱”中战功卓著，其斩崔众，树

军威的事迹为历代所广为传诵。

天宝十五年(756年)，李光弼被任命为云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太守，兼任御史大夫，还担任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节度副史、知节度事。当年二月，李光弼率领朔方(治年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5000人与郭子仪军汇合，向东攻克井陘(今河北井陘县)，收复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史思明率领数万叛军来救援常山，李光弼率军追击敌人，将史思明军击溃，进而收复藁城(在今河北省中部偏西)等十多个县，向南攻打赵郡(治所在今河北省赵县)。三月，李光弼兼任范阳(治今所在北京城西南)长史、河北(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节度使。攻克了赵郡。

李光弼认为，范阳是安禄山的巢穴，应该先攻占范阳，以断绝叛军的根本。当时，唐将哥舒翰镇守潼关(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境)失利。叛军直逼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蜀郡(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全国人心震动。唐肃宗在灵武(郡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即皇帝位，整理军队，派遣中使追赶李光弼、郭子仪，让他们赶赴皇帝驻在之地，肃宗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率领景城(在今河北省)、河间(在今河北省)的士兵5000人赶赴太原。当时，太原节度王承业不整理军务、政务。肃宗降旨，命侍御史崔众把兵权交给河东(即太原)节度使。崔众看不起王承业，有时竟身穿铠甲，手持兵器冲入王承业办事的大厅，戏弄王承业。李光弼听说了这些情况，心中愤愤不平。到李光弼被任命为太原尹、北京留守之后，崔众就要把兵权交给李光弼。崔众率领部下来到李光弼的驻地，李光弼亲自出迎，双方的旗帜已经碰到一起，崔众居然不让部下回避，表现得极为无礼。李光弼对崔众的无礼已十分恼怒，崔众又不肯按旨立即交出兵权，李光弼便下令将崔众拘禁起来。这时，朝廷的使者来到，使者怀揣着肃宗的敕令，问崔众在什么地方。李光弼说：“崔众

有罪，我已经把他拘禁起来了！”使者把敕令给李光弼看，敕令上写着，授予崔众御史中丞的官衔。李光弼说：“现在只斩侍御史；如果宣布了敕令，就斩御史中丞。如果授予崔众宰相的官职，我就要斩宰相。”使者十分惧怕李光弼的威严，就收藏起了肃宗的敕令，返回肃宗的驻地。第二天，李光弼让军队包围了拘押崔众的房子，把崔众押到碑堂之下斩首示众。李光弼之威，使三军震动。

至德二年(757年)叛军将领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蚡等四人率领十多万军队来攻太原。李光弼经过河北苦战，精锐的军队全都派往朔方，部下只剩下乌合之众，不足一万人。史思明对众将说：“李光弼兵少而弱，可以很快攻取太原，进而向西进军，攻占河西(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石(治所在今青海东都县)、朔方，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李光弼部下的将领听说了敌情之后，都十分恐惧，纷纷主张修缮城墙，准备迎击敌军。李光弼说：“太原城周长四十里，叛军很快就要到达城下，现在动如此大的工程，敌人还未到来，我们就先搞得将士疲惫不堪了。”于是李光弼就亲自率领部下的将士及全城百姓，在城外挖掘壕沟，以作为固守的工事。李光弼的部下不知道挖这些壕沟的用处。等到叛军攻城时，李光弼就命令士兵和百姓用挖壕沟掘出的土打成土坯，随时修补、加固、加高城墙。叛军久攻太原不下，就在城外高声叫骂。李光弼就命令士兵把地道一直挖到敌人脚下，先用立木支撑，然后待敌人再来叫骂时，令士兵同时拉倒立木，只听轰隆一声，敌人全都陷进地道内，非死即伤，侥幸活命的全部被擒。从此，敌人一举一动都要仔细察看地面，不敢再靠近城墙。李光弼还命令部下将士用强弩发射石子，打击敌人，叛军将士被打死的有十分之二三。城中的官兵、百姓都非常佩服李光弼的指挥才能，使军民士气大振，纷纷要求出动出击。史思明深知太原城绝难攻下，就先率领部分军兵返回，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攻城。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唐军士气高涨，叛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李光弼率领敢死队主动出击，把叛军打得大败，斩

首七万余级，叛军仓皇逃走，军资器械全都丢弃，唐军大获全胜。

从叛军开始攻太原城，到叛军被击溃逃遁，共五十多天。李光弼在城东南角支起一顶小帐篷，就住在帐篷内，遇有紧急情况。随时登城指挥。这期间，即使从府门前经过，连看都来不及看一眼，更不用说回府探望家人了。叛军退去三天以后，李光弼处理完军务，才回到府第与家人团聚。

不久，肃宗降旨，对李光弼坚守太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功绩大加赞赏，封他为司空、兼兵部尚书、中书下平章事，进封为魏国公。

### 【简评】

治军威严，令行禁止，是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取胜之道。他在奉旨接管崔众的军队时，对故意违反军纪、冒犯上司、迟迟不肯交出兵权的崔众坚决拘捕、处斩，即使有敕令为他封官，李光弼也决不容情。斩了一个崔众，震动全军，在全军树立起严明的纪律。正是这样的严明纪律，才保证在太原保卫战中，全军一致、万众一心，实现他的作战意图，乌合之众变成了强有力的铁拳。这样，李光弼以一支临时凑集的不足一万人的弱小军队，抗击十几万如狼似虎的叛军，守住太原，进而消灭敌人，击溃敌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 不拘小节，志存高远

明太祖朱元璋说过：“建大事者，心勤远略，不急近功。”说的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必定会深谋远虑，不急于追求眼前的得失。的确如此。志存高远者，哪个不是胸怀全局、放眼未来的谋略家？他们从不拘于表面的细枝末节，患得患失，而是高瞻远瞩，放长线钓大鱼，在令人费解的行为背后，隐藏远见卓识。唐宪宗元和十三

年(818年)十月，经历了三年对吴元济的讨伐，最后以吴元济被活捉而宣告结束。

平叛有功之臣李愬率兵回文城栅驻扎，就地休整兵马。战斗虽然结束，但很多疑团仍然萦绕着众将士。李愬那奇妙的用兵之道；超乎常规的指挥方法，令众将士大惑不解。于是他们向李愬请教说：“起初，你在朗山战败了，但并不发愁；在吴房取胜了，但并不夺取吴房；冒着大风雪，但并不肯停止行军；带着孤立无援的军队深入敌境，但并不畏惧。然而，您终于因此获得成功，这都是大家所不明白的，请让我们冒昧地询问其中的原因。”

望着大家那疑惑的目光，李愬道出了征战吴元济之所以能胜利的原因。李愬说：“朗山失利，敌人便轻视我们，敌人便放松了警惕，给我们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条件，我们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总结了经验，坏事变成了好事。夺取吴房，吴房的人马便要逃奔蔡州，合力坚守，不利于我们下一步作战，所以，我们在吴房打了胜仗，但并不去占领它，以便分散敌人的兵力，待我各个击破，彻底消灭叛贼。急风暴雪，天色昏暗，便不能够用烽火取得联系，敌人就不会知道我们已经到来。孤立无援的一支军队深入敌境，破釜沉舟，人们便都献身效死，打起仗来自自然会加倍出力。”将士们听到此，无不点头称是，大家都十分佩服李愬的韬略。打仗不能只靠冲冲杀杀，作为指挥员更要有勇有谋。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李愬继续说：“一般说来，眺望远处的人不必顾及近处，计虑大事的人不必知悉细事。倘若夸耀小小的胜利，顾惜小小的失败，首先就把自己搅乱了，哪里还有余暇去建立功劳呢！”将士们更加叹服了。

李愬日常生活节俭，但对将士们的供养却是丰厚的；他见到可以实行的事情，便能够立即做出自己的决断；他了解到一个人是贤能的，就不会对他产生疑心。

## 【简评】

是谋一时，还是谋长远？谋“得失”，还是谋全局？智者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宁有一时之失，也不放弃长远。李恕指挥作战中，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不顾及小的得失，因谋划长远，终于完成了几年的征讨使命。

## 李嗣源因乱即帝位

凡是历史上成就大业者，都能顺“天”应人，因时谋变，哪个改朝换代的开国君主，起事时没背工一个“乱臣贼子”、“弑君篡位”的“罪名”？没有“乱世”，何来的“英雄”？

从斩白蛇起义的刘邦，到举“靖难”之师的朱棣，无不主动适应变乱的形式，当机立断，以暴力的方式取天下而代之。后唐时的李嗣源虽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但也顺时而谋，成了帝业。

后唐主李存昫灭后梁之后，迅速腐化。他宠任伶官，荒淫奢侈，恣意暴敛，滥杀大臣，与灭梁前判若二人。同光四年(926年)，庄宗听信谣言，诛杀枢密使郭崇韬全族，又听信伶官景进谗言，冤杀夙著威望的护国节度使、尚书令朱友谦全家。一时间，功臣宿将，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纷起，下层军官、士卒，尤为忿忿不平。李存昫的荒唐昏聩，终于激起了四方兵变。

戍守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的魏博镇士卒，期满轮调回镇。走到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庄宗因为邺都(今河北省大名县)空虚，恐怕他们回去以后发生变乱，于是下令他们留在贝州，不准回乡。在流言四起，人心惊骇惶惑之际，兵士皇甫晖率众哗变，杀死统领军官，胁迫军校赵在礼为首领，长驱南下，攻入邺都。变军推举赵在礼为魏博留后。魏博兵是后唐的一支精锐部队，战斗力颇强。庄

宗闻讯，急忙派遣素所宠信的归德节度使元行钦率军进讨，岂料交战即败。庄宗大怒，说：“破城那一天，老少不留！”元行钦率各镇的增援部队，再次进攻邺都，又遭失败。变军知道朝廷决不饶命，所以顽强守卫，死守不降。这时，变兵四起，各道纷纷告急。庄宗不得已，只得起用他平日猜忌的李嗣源率侍卫亲军讨伐邺都变军。

侍卫亲军号称“从马直”，是庄宗从诸军中挑选骁勇士卒组成的，分为四指挥。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伶人，以军功擢升。郭崇韬掌权时，郭从谦把郭崇韬当作叔父敬奉，睦王李存义则收郭从谦为义子。二人先后被冤杀，郭从谦怨愤不平，暗用私财结交从马直军校，替二人辩屈喊冤。亲军在洛阳饥寒交迫，军士王温策划兵变，事泄被杀。庄宗偶与郭从谦闲谈，开玩笑说：“你过去依附郭崇韬、李存义，现在又教唆王温造反，你到底想干什么？”郭从谦本来就心虚，听到此言，更加恐惧不安。于是，他暗中散布谣言，说皇上因为王温的缘故，等到邺都平定后，要把亲军全部坑杀。消息传出，亲军官兵更加人心惶惶。而庄宗对此，却全无知觉，反倒强遣他们出征，无异于火上浇油。李嗣源虽遭猜忌、冷遇，并无异志，奉诏即率军前往征讨。

李嗣源率亲军渡河北上，来到邺都，在城西南扎营。他下令第二天拂晓进攻。可是，当天晚上，便发生了兵变，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率变军劫持李嗣源，声言：“将士们追随皇上十年，身经百战，终于得到天下，可是皇上却恩断义绝，为了立威，一味诛杀。贝州那些出征官兵，不过思念家乡。想回去看看而已，皇上竟不饶他们一死，发誓说破城后要把他们全部坑杀！近来从马直几个弟兄喧哗吵闹，皇上竟要把全队处斩。我们当初并没有叛心，只是怕死。大家商量的结果，愿意跟城里赵在礼联合，击退各道军队，请皇上在河南当皇帝，大帅在河北当皇帝，做我们的统帅。”李嗣源声泪俱下地劝说解释，变兵不接受。李嗣源说：“你们不听我的话，那么就随你

们的意去做，我自己返回京师(洛阳)。”变兵们钢刀出鞘，把李嗣源围住，警告说：“这些人是一群虎狼，分不出谁尊贵，谁卑贱，大帅想去，能走得了吗？”不由分说便簇拥李嗣源等进入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可是魏州城里并不知道这些变化，拒绝他们进城。变军首领皇甫晖迎击，斩张破败、征讨军全部崩溃。赵在礼这时候才终于弄清楚真相，于是率各级军官迎接李嗣源进城，一面叩头流泪，一面请求宽恕，说：“我们辜负大师，怎么敢不听命令！”李嗣源身陷重围，无法脱身，遂假托收抚散兵，出邺都，至魏县(今河北省大名县西南)，李嗣源对各将领流泪说：“我明天就回镇州，呈递奏章，至于怎么定罪，听皇上裁决。”大将霍彦威说：“这个办法不好。您是大军元帅，不幸被变军劫持，元行钦不战而退，回朝廷后...定会拿您当借口。您如果直接回镇州，岂不是‘割据：上地，要挟君王’？正好印证那些奸邪的人对您的陷害诽谤。不如日夜不停奔往京师，亲自面见皇上，或许可以洗清自己。”李嗣源听他说的有道理，便答应了。

李嗣源本不想反叛，想把自己的心迹辩明？屡次上表申折，但都被元行钦中途拦截，不得达于朝廷。他十分猜忌恐惧。他的女婿石敬瑭趁机密劝他说：“事情的成功，由于决断迅速，事情的失败，由于犹豫不定。世界上哪有上将跟叛军一同进入叛军据守的城池，而将来能够永保平安的事呢？大梁是天下之要会，请让我率300骑兵发动奇袭。如果而幸夺取到手，大帅就率主力急行东进，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全自己。”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皇上生活荒淫，治国无道，军人平民全都怨恨不平。您跟大家站在一个立场，就可活命。如果坚持效忠守节，恐怕难逃一死。”李嗣源思忖良久，终于下定了决心，向各道将领发出命令，征调军队集结。李嗣源本是成德节度使、蕃汉马步军都总管，威望夙高，所以决计南下之际，河北诸镇纷纷拥戴，得以顺利渡河，不到半月，便进入汴梁。

起初，因变军四起，军心动荡不安，而国库空虚，士卒无法吃饱，谣言纷纷。宰相发觉情势险恶，惶惧上疏说：“现在国库已空，宫库里却有大量储存，皇家各军将领士卒，连父母妻子儿女都养不活，如果再不救济的话，恐怕军心生变。请陛下动用宫库救他们不死，等过了荒年，原先宫库里的财富，仍然会回来的。”李存勖本已答应，可是刘皇后说：“我们夫妇身为君王，管理万邦，虽然依靠军队武力，但也是由于天命。既然天命在此，别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宰相又在便殿向李存勖口头奏报，刘皇后派人在屏风后暗中偷听，过了一会儿，她派人携带了一个梳妆台、三个银盆，以及三个年幼的皇子出来，告诉宰相说：“人们都说宫里积蓄很多，事实上不了解真相。各地进贡的东西，随手都赏赐光了，只剩这些东西。请把他们卖掉、犒劳官兵！”宰相恐惧惶然，不敢再说。等后来庄宗听说李嗣源已率军南下，这才出钱帛赏赐诸军。士卒们得到这些钱帛，并不感激，破口大骂说：“我们的妻子儿女已经冻饿而死，现在要这些有什么用！”庄宗率军向汴梁，途中听说李嗣源已入汴梁，只得仓皇逃回。到荥阳时，兵士已逃走了一半。他再三温和地抚慰士卒，答应给他们重赏。士兵们直接了当地回答：“陛下的赏赐来得太晚了，没有人会感谢圣恩。”李存勖哑口无言，只是流泪而已。刚到洛阳，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便率众哗变，与京城驻军混战起来。庄宗在乱兵中为流矢射中身死，左右全都逃散。只剩伶人善友收集走廊上的乐器，堆到庄宗身上，纵火焚烧，庄宗才免尸骨暴露之灾。李嗣源随后进入洛阳，称监国，旋即帝位，这就是后唐明宗。

### 【简评】

历史往往给有些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非要逼迫他们应潮流而动，做出青史留名的事情来。你说可笑不可笑！但时机再好，也不是举手之劳就能获得成功的。要想创出一番令人垂涎的功业，除了机会把握以外，还必须有智谋做坚强的后盾。

就拿李嗣源来说吧，尽管庄宗无道，他也实在无心背叛，怕背上犯上作乱的黑锅。后来机遇似乎光顾于他头上，受形势所迫，他别无选择，只好走上了起兵谋“反”这条道。这时的他，才显出谋略家的本来面目，以超出常人的眼光和智谋，果断地率兵南下，一举夺取了全国的心脏汴梁。

因此，人们要善于抓住机遇，争取事业上的成功。

## 斥佞臣太后保幼主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则是男人的附属品。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讲究长幼尊卑的社会。即使是女人，随着由幼变长，其地位也会相应地提高。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媳妇变成婆婆，就有了对媳妇施威的权力。

皇后变成太后，其权威就不仅仅限于对家庭、对子女了。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皇帝去世，皇太子即位，就是明英宗。当时皇上尚年幼由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人辅佐，太皇太后也经常过问皇上的饮食起居。但太监王振却利用曾在东宫侍奉皇上的身份，逐渐把英宗控制在手，擅自作威作福，皇上懵懂无知，对他宠信之极，居然呼他为先生而不直称其姓名。这样，满朝文武也惧王振三分。

一次，辅臣们正在商议为皇帝讲解经史之事，王振却径自闯入，引诱皇上到将台(今北京朝阳门外)去阅武，害得文武大臣放下正事，都一起跟着皇上去看京营各卫武官比试骑马、射箭。各位大臣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纷纷哀叹：“先皇开创的基业，真是毁

在这小小宦官的手里呀！”

杨士奇、杨荣等重要辅臣们，更是心急如焚，他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王振扰乱朝政，把皇上引到邪路上去。大家一商议，觉得只能让太皇太后出面才管事，让她老人家以关心皇上为名，好好整治一下王振，最好把他从皇上的身边赶走。于是，他们一起去面见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对王振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一听大臣们的禀奏，更为震怒，说：“这还了得！一个太监胆敢如此放肆，岂不乱了朝纲！”但转念一想：皇上年幼无知，难于识别好坏，如果用太深奥的道理开导皇上“远小人”一类的，恐怕一时还接受不了，反起不到驱逐王振的目的，不如……。想到这儿，她就和几位大臣说：“你们为皇上着想，忠心可鉴，明天我会亲自劝导皇上的。”众臣告辞而出。

第二天，太皇太后在便殿召见几位辅臣，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前来朝见，因为太皇太后在座，皇上也只能在东边站立着。太皇太后先问了一下皇上的饮食起居之类的事，似乎表示不太满的样子，然后看着皇上说：“这五人，是先朝挑选留给你的，有什么事，一定要与他们商议，不是他们五人赞成，不可施行！”英宗连连点头称是。接着，太皇太后宣召太监王振觐见。

不一会儿，王振便快步来见，俯伏在地，叩拜不止。太皇太后故意不叫他起来，慢条斯理地说：“听说近来皇上饮食不周，常去外边走动，可有此事？”

“奴才精心侍候皇上，不敢稍加怠慢，只是有时怕皇上烦闷，常带皇上出外散心。”王振答道。

太皇太后顿时面呈不悦之色，说：“你身为皇上近臣，不劝皇上

爱惜身体，还教唆皇上不直呼你的名字，这不是犯上是什么？”

王振惊慌失措，连忙辩解，但太皇太后不容他分辩，厉声喝道：“大胆奴才！你侍候皇帝起居多不遵守成规定法，违背祖训，大胆犯上，今当赐你一死。来人，……”

皇上未等话落，便急忙跪在地上为王振求情，几位大臣也只好跪下。太皇太后余怒未消，说：“皇帝年少，如何能知道此辈会害家祸国！今日不除此贼，必酿后患。”

王振见太皇太后真的要处死他，吓得魂飞魄散，哆哆嗦嗦地求饶道：“太皇太后息怒，奴才再也不敢了！”

皇上与大臣们也为王振求情不止，太皇太后这才脸色稍缓，说：“看在皇上及各位大臣求情的份儿上，我饶你不死，但此后只许在宫中照料皇上，再也不许干预国事了！”

经过此事，王振确实收敛了许多，不敢过于猖獗，但太皇太后死后，王振又死灰复燃，重新把持了朝政。

### 【简评】

皇帝世袭制度曾经造就许多先天不足的“真龙天子”。

有白痴皇帝，如西晋惠帝。

有孺子皇帝，如东殇帝、桓帝。

白痴和孺子无能治国，他们需要强者代劳。一些强者如明英宗的太皇太后确实以自己的权力和智慧弥补了皇帝的先天不足。

然而，长者死后，白痴成不了智者，孺子不能一下成人。再大

的权威，再高的智慧于此能有何补益呢？

## 杨业巧计护民内迁

再周全的计划，如果得不到有力地实施，也只能变成一纸空文。所造成的损失也将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似乎就成了带有某种宿命论色彩的“公式”。面对难以抉择的现实，智者不免也会发出一两声无奈的呼喊。

下面讲到的杨业，就是一位谋划失败的悲剧主人公。雍熙三年(986年)初，宋太宗赵光义决定兵分三路，大举伐辽，以期先克幽州(今北京市)，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当时，赵光义任命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监军，率大军出兵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雁门关西雁门山上)，作为伐辽大军的西路，策应中路、东路攻取幽州。西路大军出关后，连战连捷，很快就攻克了云(今山西大同市)、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朔(今山西朔县)四州，很快抵达桑乾河的上游，正欲东进配合中、东两路大军攻打幽州，却传来曹彬率领的东路大军兵败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的消息，田重进率领的中路大军也退入飞狐口(今河北蔚县东南)，潘美、杨业等人接到赵光义的命令，回军代州(今山西代县)。在宋军进入云、应、寰、朔四州时，四州民众纷纷配合宋军击杀辽兵，投奔宋朝。伐辽失败后，宋军撤走，赵光义在谋臣建议下，下诏将云、应、寰、朔四州民众迁到宋朝内地，这样既可使这四州民众免遭杀戮之祸，又可以削弱辽的经济、军事实力。民众内迁需要有军队保护，赵光义便命令潘美派兵护迁，最后这一任务落到了杨业的身上。

杨业原是北汉的名将，对山西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十分熟悉，鉴于当时契丹萧太后在打败东路曹彬统帅的大军之后，亲率10万人马西进，并已克复寰州，杨业经过慎重思考，反复权衡，向潘美提出了他的护迁计划。

寰州位于应、代、朔三州鼎立的交汇处，正好挡住了代州宋军由雁门关北进的道路，而且当时辽兵来势凶猛，杨业认为现在辽兵士气正旺，不宜与驻扎在寰州的辽兵进行正面的交锋，他对潘美说：“皇上只是让我们保护这四州的民众内迁，我们只要率兵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南30里)，北上直趋应州，辽兵定会认为我们要切断他们后退的道路，必会回兵救援应州，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先派人秘密转告云州、朔州的守将，当我们大军由代州出兵时，云州的守将立即护送民众先南下，当辽兵前来救援应州时，再让朔州的民众赶快南下，直接进入石碣谷(在今山西朔县南)，在石碣谷口的两侧埋伏下千名弓弩手，并以骑兵在中路援助，这样三州的民众安全就有了保证。”

应该说杨业的这个护迁计划是非常巧妙的，不仅避开了辽兵的锋芒，而且每一步都占有先机；通过威胁辽兵退路，迫使辽军回师救援，从而使辽军战线出现漏洞，这样宋军就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完成保护民众内迁的任务，可以说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上策。

但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监军王侁、刘文裕的反对，他们主张出兵雁门关，然后直接北上攻打寰州，杨业极力反对，认为这样做必败无疑，结果反而遭到王侁、刘文裕无端的辱骂和威胁，杨业无奈，只好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亲自率领人马直攻寰州。结果杨业兵败被俘，绝食三日，死于敌营，赵光义内迁云、应、寰、朔四州民众的计划也失败了。

## 【简评】

记得大诗人杜甫在缅怀蜀相孔明时写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未捷”是指他生前终没有实现统一中原之志，给后人留下难以磨掉的遗憾，致使后世英雄闻之挥“泪”。

中国近代史上“流产”了一次变法维新运动，即“戊戌变法”。康有为等人虽精心谋划，自认为胜券在握，不想还是失败了。慷慨赴义的谭嗣同临死前曾写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句，又说明什么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伟人说的话。任何谋略思想都应该建立在实施的基础上，否则，只能是空想。杨业的护迁计划设计得完美无缺，却受到层层阻挠，以失败告终，但其谋其略常令后人赞叹不已。正像孔明“三分天下”之谋，没有因为他的“身先死”就失去了光彩，反而为后世留下一笔珍贵的遗产一样。

## 第四章 赈灾民不待皇命

中国的老百姓喜欢清官。

清官受到同时代百姓的欢迎和爱戴，因为他们确实比那些贪鄙的赃官有益于民。

清官事迹受到后世人民加工、提炼、传颂。他们把清官的事迹作为自己寄托理想的所在，作为抒发愤闷的一种形式，作为鞭笞贪赃枉法者的工具。

明代王竑赈灾事迹被编入《救荒录》，恐怕就出于上述原因。

景泰二年(1451年)，凤阳、淮安、徐州一带突发大水，千里田地被淹，许多村庄被冲毁，百姓无家可归、无粮可食，一时间饥民遍野，饿死不计其数。不久，山东、河南的流民，也纷纷涌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饥民大军。地方官员个个慌了手脚，不知如何赈济灾民，为了保险起见，也只好向朝廷奏报了。

这时，奉了朝命巡抚江、淮诸郡的右佥都御史王竑，刚巧遇上了此事，起初，他也想急报朝廷，再开仓赈济灾民，但面对嗷嗷待哺的几百万饥民，眼见死亡人数每日直线上升，再也坐不住了。他想：如果上报朝廷的话，路途遥远不说，等到奏明皇上再批复大臣办理，不知要耽搁多少日子，其间又会有多少灾民因得不到救助而死去！既然如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我能否代朝廷行使一次“君命”呢？何况我曾上书皇上，说“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皇上也欣然接受，此举不正是“收民心”的好机会吗？想到这儿，他毅然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当时各地库中的粮食已所剩无几，只有徐州广运仓还有积余，

王蛇想把余下的粮食都拿出赈灾，但看守仓库的宦官却执意不肯，说他只听皇上的旨意，王竑亲自前往劝说，他还是不开仓放粮，王竑便故意威胁说：“民已无粮可食，如再不放粮济民，恐怕旦夕就要抢粮为生了，到时盗匪遍地，酿成大乱，你可担当得起？那时我只好先把你杀了，然后自请死罪，也就罢了！”宦官听后十分恐惧，早就知道这位御史历来是说一不二、敢做敢为的，因而他不得不打开仓库，把粮食发放给饥民。

王蛇为了多救济一些灾民，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近处的饥民，每日供给米粥，远处的饥民，则发放粮食，不得冒领或重复支取，他还用官银赎出被卖的人，将他们送回自己家中；并且腾出六十多处堆积谷物的房子，让有病的流民居住，挑选四十多位医生为他们治疗，死者也供给棺材，集中埋葬。

就这样，王竑夜以继日地操劳，处心积虑地奔走，尽量做到事事合理、件件落实，在他的感召下，公务人员也恪尽职守，不敢稍加懈怠，使救灾工作井井有条、按部就班，没有出现大的混乱。老百姓更是交口称赞，说他是“百年不遇的好官”！

据后来的统计，王蛇共动用大米**160**余万石，救活数百万人。人们将其赈济灾民的事迹编成一本《救荒录》，为后世广为传扬。

再说，赈灾已经进行很长一段时间了，明景帝才收到各地方官的奏报，得知淮安、徐州一带大饥，起初，他异常震惊，大叫：“这可怎么办呢？”后来收到了王竑的奏报，一颗心才落了地，十分高兴地说：“好御史，不然就会饿死我的百姓了！”

可是，有人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参奏王竑擅自开仓济民、有违圣命之罪，景帝大为盛怒，又见王竑奏报中有自请其罪的言辞，马上下诏褒奖王竑，并责令各级官员全力赈灾。后来，在尚书金濂等

人的称颂和保举下，同年十月，王蛇就升任左副都御史一职。

### 【简评】

王竑作为封建朝廷的一名官员，能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不等向皇帝申报，“先斩后奏”，擅自开仓赈济，救民于水火，确实难能可贵。

他被朝廷提升为左副都御史也是受之无愧。

然而并不是所有清官都像王站那样幸运。

同样是明朝的清官海瑞，不是落得个被罢官的结果吗？

同样是清官，其荣辱升降的命运却因皇帝不同而异，然而在百姓的口碑上，他们永远是被讴歌的对象。

## 夺门之变巧用计

政变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

当一些人觉得必须改换现有掌权者而又不能采用和平手段时，就选择了这种冒险的形式。

政变是改变国家最高当权者的常用手段，因此，在专制的封建社会，政变多发生在新旧君主交替的关键时刻。

景泰八年(1457年)春，明景帝一病不起，又因皇太子至今迟迟未立，朝廷内外很是忧虑担心。群臣恐怕皇帝真的驾崩之后，朝廷将出现无主的局面，因而纷纷要求早立太子，以安人心。但当时还有一个太上皇，即英宗，从瓦刺迎回后一直住在南宫，如果考虑谁即皇位问题时，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所以，一些大臣的心里，也

暗暗在打太上皇的主意，想扶他重新登上皇位。起先，大臣们为立谁为皇太子争个不休，以兵部尚书于谦为首的廷臣，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因为当初废黜他，本身就不太近情理；而大学士王文等人，却想通过皇太后的影响，迎召襄王的世子入主东宫。都御史萧维祯曾召集御史们商议此事，众御史大多还是主张立朱见深，但也有认为“既然废了，就不可再立”。如何起草奏疏呢？萧维祯见争执下去也不可能有什么满意的结果，即拿起笔说：“我改一个字。”于是便改“早建元良”（元良，即太子的代称）为“早择元良”，然后将奏疏呈进。就在这些大臣喋喋不休地讨论立太子之际，有人却在秘密地谋划拥立太上皇即位。武清侯石亨，早派人探察出景帝已病入膏肓了，于是他找来都督张轨及太监曹吉祥，说：“二公想立功得赏吗？”两人一听，不禁惊诧起来，忙问：“石公，说的是何事？”石亨与他们耳语道：“皇上的病日见深重，大家吵着立太子，我看不如请太上皇恢复皇位。一旦事成，岂不立下奇功！”吉祥跃起叫道：“石公好计！石公好计！”石亨又说：“这只是我个人之见，还需要有老谋深算的人帮助筹划方可。”张轨连忙出主意说：“太常寺卿许彬，这人怎样？”石亨表示同意。当下三人就一同来到许彬的家中，与其密商。

许彬满口承应，说：“这是社稷之功呵！我年纪老迈，无能为力，何不与徐元玉商量？”徐元玉，就是曾劝景帝南迁避难的徐理，后改名为徐有贞。石亨也曾想到他，真是不谋而合。于是，三人拜辞了许彬，当夜就赶往徐有贞的家中商议。

徐有贞对立太上皇一事表示赞同，并问：“你们所谋划的这件事，太上皇知道吗？”张轨回答说：“一天前已秘密告知了。”徐有贞说：“那还不行，得等到太上皇的确切答复才行。”他看石亨等人不太理解其中之意，又接着说：“我们谋的是复辟之计，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如果不争得太上皇的首肯，一来‘名不正，言不顺’，师出无

名；二来今后万一有人追究其责的话，我们也可以打出太上皇这张王牌。”石亨三人连连称善，随即离去了。

到了一月十六日傍晚，石亨、张轨又前来徐有贞家中密商。石亨说：“已经得到了太上皇的明确答复，下一步该怎么办？”徐有贞便登上房顶，向天空望去。他在观看与帝位相应的星象。不一会儿，他急忙下来，煞有介事地说：“紫薇垣已有变象，事在今晚，机不可失。”随后与他们耳语一番，定下周密的计划。这时，石亨又接到边境官吏告急的文书，说边塞关卡吃紧，徐有贞听后说：“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不妨利用它，以防备非常事件发生为名，调兵进入宫中，谁敢不同意！”石亨、张轨都表示赞成，马上分头去准备。

二人走后，徐有贞焚香对天祷告，然后与家人说：“此事成功，是社稷之吉利，大家同享荣华富贵，否则，必遭杀身之祸，除非是做鬼回来。你们要提早安排，想好退身之路，不要事到临头，再去怨天尤人。”说完，他不顾家人的一再劝阻，便匆匆赶去与石亨等人汇合了。

参与这次事变的，除石亨、张轨、徐有贞外，还有曹吉祥、王骥、杨善和户部侍郎陈汝言等人，石亨清点一遍，看人已到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先把各宫门的钥匙收齐，交给专人看管，再让卫士打开宫中禁门。因为守宫卫士已接到朝廷旨意，放护驾兵士进宫，所以叫开宫门易如反掌。大约在四鼓时分，石亨等人率领千余兵士，从打开的长安门中长驱直入，进入宫中。宿卫兵士见这么多人马闯入宫里，惊愕地不知所措，但没有一个敢上前阻拦，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皇宫中出入。

当时天色昏暗，星月无光，石亨感到很恐惧，便找到徐有贞，惶惑不安地问道：“此事能成功吗？”徐有贞大声回答说：“时分已

到，不要退缩！大丈夫建功立业，当在此一举！”说完，带领众兵士直逼南宫。

到了近前，才发现宫门紧闭，叩了半天也不见动静。徐有贞当机立断，马上命令兵士取来一根粗木，用绳子悬在木上，让数十人举木撞击宫门。不想，宫门右侧的墙垣却被意外震塌，众人一拥而入，进入宫中找寻太上皇。

石亨等人进入内宫，发现太上皇在烛光下独坐，见到这么多人突然闯入，不觉惊问：“你们要干什么？”众人伏在地上，同声说道：“请陛下登位。”太上皇心有余悸地说：“这可非同小可，需要审慎从事。”众人也管不了许多了，一同上前拥起太上皇，扶掖着出门登车而行。

这时，忽然天色放明，星月皎洁，太上皇借着光亮才看清周围的一切。他回过头问徐有贞等都是什么人？徐有贞等各自说了自己的姓名、官职。当行至东华门时，门卫大声呵斥，令他们停步，太上皇厉声喝道：“我是太上皇，有事入宫，何人敢挡驾？”门卫听到熟悉的声音，近前一看，果然是太上皇，立即开门请入。于是，太上皇由徐有贞引领着登上奉天殿，坐在皇帝的宝座之上，顿时钟鼓大作，宫门四启，又在昭示天下：皇帝登基了！

这一天，百官入宫等候景帝上朝，见徐有贞慢步走来，一脸得意之色，就知事情有变。果然，徐有贞招呼百官说：“太上皇已经复位了，赶紧进去朝贺。”百官个个震惊恐惧，但木已成舟，新皇已君临天下，谁还敢拒不从命？于是，众臣只好按朝班次序，进殿祝贺。再说，明景帝听见上朝钟鼓声，大为吃惊，经询问，才得知太上皇已复位，连声说：“好！好！”

第二天，太上皇临朝，下诏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因迎复英

宗即位有功，徐有贞不久被升任兵部尚书，封石亨为忠国公，其他有功之臣，也各有封赏。

### 【简评】

中国历史上有成功的和失败的政变，有具有积极意义产生积极影响的政变，也有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和影响的政变。

无论何种政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隋场帝上台，是通过逼疯哥哥，杀死老子而实现的。

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是以杀死同胞兄弟而告终的。

明英宗的夺门之变，虽然兵不血刃而实现，但谋臣们的精心策划和周密布置不知要耗费多少心血。

心血和鲜血都是一种代价。

当人们不再为政变流鲜血、耗心血，而是将智慧和热血用于富民富国时，才是民族之幸，生灵之幸！

## 李贤智谏明英宗

“诛”也有道，尤其是被诛者为“天子”、“人君”的时候，功谏的方法方式就必须有所讲究。触龙如果不讲究方法方式，恐怕结果也要被唾了一脸的唾沫。明代大学士李贤的规谏就令人为之耳目一新。

天顺元年(1457年)，“夺门之变”后，明英宗大肆褒奖有功之臣，对石亨、曹吉祥等人更是恩宠备至，无以复加，这反倒助长了他们居功自傲的心理和狂妄的气焰。他们专横跋扈，党同伐异，简直把朝廷当成自己的“家天下”，可以自由地发号施令。英宗看在跟

里，心里虽隐隐有几分不安，但一想到他们不遗余力地拥立自己重登皇位的功德，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念之情，也就不再过问了。

一次，英宗皇帝召见了自己最信任的大臣、大学士李贤，屏退左右侍从后，就对他谈及此事，不免流露出一些隐忧。其实，李贤也早想找个机会劝谏一下皇上，他深知石亨等人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皇上如果老是心慈手软，念念不忘所谓“夺门”之功，总有一天会酿成大乱不可。于是，他忧心忡忡地对英宗说道：“陛下，您可是一国之君，权力万万不可下移，只有独断才行。”英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朕何尝不知此理，但他们都是有功之臣，如何忍心下手呢？”李贤见英宗还是念及“夺门”之事，想：看来一下子很难说动皇上，等找机会再劝吧！于是，他就告辞而出。

不久，便发生了石亨的侄子、大同总兵石彪被捕入狱的事，因牵连到石亨，石亨不得不上表谢罪。英宗思来想去，不知该如何处置他，只好又召来李贤询问。

英宗一见面就问道：“石亨当日有‘夺门’之功，朕想宽恕他的罪过，不知爱卿意下如何？”李贤见皇上又提及“夺门”之事，想：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一定要说服皇上彻底打消此念，然后才能清除奸党。于是，他直接了当地说：“陛下怎么总是用‘夺门’二字，难道它是一个美名吗？说迎驾是可以的，‘夺门’二字怎能传示于后世？陛下顺天命、应人意而恢复皇位，门何必用夺！而且内廷宫门难道是可以夺取的吗！当日之事也只能算侥幸成功，假如事先败露的话，石亨等人死不足惜，但将会把陛下置于何种境地，难道他们就不作周密的考虑吗？”英宗徐徐点头。李贤见皇上已被打动，便故意说：“当时也有以所谓‘夺门’来邀臣的，但臣却辞了未参与。”英宗急忙打断他的话，问其中缘故。李贤回答说：“如果景泰皇帝果真像后来那样病重去世，群臣自当奏请陛下复位。这样做名正言顺，不

会引起任何疑虑，何至于夺门！石亨、曹吉祥等人，不过是借陛下复位给自己谋取富贵罢了，那是为宗庙社稷着想吗？”英宗听完如大梦初醒，连连说道：“太对了，真像你所说的那样！”

即日，英宗皇帝就颁诏说：今后一切奏章，都严禁用‘夺门’字样。对石亨、曹吉祥等人，他也渐渐疏远了。

没过多久，石亨就因谋反被逮捕，死于狱中。当时掌管刑法的官员奏报，对石亨等冒功升官的人，都要追究。英宗又召来李贤问道：“此事恐怕要惊动得人心不安。”李贤便出主意说：“不如让这些人自首，免掉其罪。”英宗依计施行，使冒功升职的四千余人，都能主动自首，改过从新了。

### 【简评】

李贤的“智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相机而动”。所谓“找个机会”、“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就说明了李贤的老谋深算。试想想，如果没有石亨侄子石彪被捕入狱的契机，“谏”的效果是要打上疑问的。二是洞悉对方心理，对症下药。大凡帝王不管他是用什么手段夺取到皇位的，他都愿意听到人们用“顺天命，应人意”来歌颂他的登极，李贤说出了这一点，恰是搔到了英宗的痒处，因而也就把石亨等人扬“夺门之变”的功劳轻轻一笔抹煞。最后把石、曹等的用心重重一揭：“（他们）不过是借陛下复位给自己谋取富贵罢了”，水到渠成，“智谏”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效益。

## 大夏计除弊政

人与人之间有强弱之分。

高大粗壮的身材与瘦小枯干的身躯，是体能上的强弱对比。位高权重的高官与人微言轻的属僚，是地位与权势的强弱对比。

但是，无论在体能上，还是在地位和权势上，弱者战胜强者的现象都不罕见。

成化年间(1465—1487年)，宫廷上下都喜好珍宝奇玩，尤其是明宪宗，更是喜爱之极，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派人到各地打探，四处收罗，虽获得奇珍异宝无数，但仍不知足，恨不能要将天下瑰宝尽归己有。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宦官们无不挖空心思地争相竞献，根本无暇顾及朝政大事。

一天，宪宗正在为近来未获取珍奇之物而愁眉不展，有位宦官走上前来，轻声说道：“皇上，您忘了先帝在世时，曾派遣王三宝出使西洋，听说带回奇珍异宝不计其数。皇上何不效法先帝，也派人出使西洋，一定能找回什么稀世珍宝。”宪宗听后大喜，他想那是宣德年间的事，离现在不太远，肯定还保存着出使西洋的大量资料。于是，宪宗立即命这位宦官到兵部，细查王三宝出使西洋的水程。

当时，项忠任兵部尚书，刘大夏只是在他手下任车驾司郎中。项忠听说皇上派人来查找出使西洋的资料，便让都吏到库中翻检保存的旧档案。正巧刘大夏也在边上，马上察觉了皇上的用意，心想：宣宗皇帝派王三宝下西洋，耗资巨大，所得甚少，几乎把国库捣腾空了，真是劳民伤财！此次如果再出使西洋，不知又要花费多少银子、动用多少人力。不行！一定想办法阻止它！想到这儿，他机警地抢先一步进了库房，把察验到的出使西洋的那份档案，藏到了别处。

都吏到库中翻了很久，就是找不到，便去向项忠禀报。项忠大为恼火，不停地骂下吏无能，又派人去反复查找。刘大夏心里暗暗发笑，但故意装作一幅焦急状，在一旁直跳脚。前来的宦官看实在找不到，也只好回宫禀明皇上去了。

正好遇上许多有头脑的大臣，纷纷上疏谏阻此事，宪宗才不得不打消此念，出使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项忠仍觉得有些蹊跷，便叫来都吏诘问说：“库中案卷，怎么会遗失！莫非你私自藏匿不成！”都吏吓做一团，不停地申辩，刘大夏在旁边摆了摆手，微笑着说：“别再冤枉他了！案卷是我藏起的！”“你……”，项忠不知说什么好。刘大夏这才郑重其事地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费去钱财数十万，军民死去的也数以万计。这是一时的弊政，但会殃及后人，虽然旧案还在，也应该毫不犹豫地烧毁，以彻底拔掉坏根，造福于子孙，为什么还要追究案卷的有无呢？”

项忠听后受惊似地站起身，从座位上下来，对刘大夏一边作揖，一边感谢说：“刘公阴德不小啊，有千秋之功！这兵部尚书的位置不久就应当属于你了。”

### 【简评】

道家主张以柔克刚。道家认为柔能克刚。

弱者战胜强者，卑者制服尊者，大都采用以柔克刚之术。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面的刘庸，为乾隆皇帝烹煮“荔浦芋头”时，又是备茶，又是敬酒，是多么柔顺。但在这柔顺的背后，却偷偷地将真正的荔浦芋头换成与之酷似但味道极差的另一种东西，使乾隆爷一提起荔浦芋头便大倒胃口。

刘大夏为明宪宗查找出使西洋的航海资料又着急，又跺脚，恨不得马上把资料送到宪宗面前，表现也够柔顺。但在这柔顺背后，正是刘大夏自己将资料转移藏匿，以此绝了宪宗往西洋寻宝的希望。

刘庸与乾隆之间、刘大夏与明宪宗之间，到底谁强谁弱呢？

## 刘大夏改制征饷粮

一架机器，只要运转起来，就会有消耗和磨损，因此就要修修补补。

国家是社会的机器，要维持它的正常运转，也要进行必要的维修，这就是人们说的改革。

中国封建国家机器运转了几千年，在此期间，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改革者对其进行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改革。

刘大夏改制征饷粮，可以说是封建国家机器运转中一个极小的局部中的极小改革。

明孝宗时，塞上豪强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利用远在边塞、朝廷鞭长莫及的优势，与官府勾结在一起，不仅自己不按时交纳军饷，还肆意克扣已经征收来的粮饷，甚至采用套购民间粮草的手段以中饱私囊。边民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忍无可忍，常常聚众闹事，成为朝廷的一大隐患。皇上也曾多次派员前去查处，但往往治表不治本，无功而返。

弘治十年(1497年)，朝廷又委派已兼任左都御史的刘大夏，前往处于塞上的宣府整治军饷。刘大夏欣然受命，准备即日启程赴任。

临行前，户部尚书周经特意赶来送行。他怕刘大夏过于刚正直用，弄不好得罪了地方上的权豪势要，会影响自己仕途升迁，故再三告诫道：“宣府是塞外之地，不比天子脚下，可不能凭一时的意气

用事！那里，也确实有些权势家的子弟，仗着他们朝中有人，为非作歹，听说常常大量套购民间粮草以谋私利，但这绝不是你我能杜绝了的，你还是学聪明一点，稍一不慎就会招来祸患，到时悔之晚矣！”

刘大夏先表谢意，然后自信地说：“处天下事情，以理不以势，我到那里自有办法，大人不用多虑！”说完，便跨马而去。

初到宣府时，刘大夏并没有风风火火地到处查禁，而是不动声色地明察暗访，把查到情况汇总起来，细加分析。他想：此地情形确实如周大人所述，权势之家大多贪污克扣军饷，使百姓深受其害，不加以整顿，遗患无穷，但怎样整治呢？他下决心要彻底根治。因为，之所以权势人家能大批套购粮草，是收购制度使然。按照塞上收购制度的规定，必须一次交付粟一千石、饲料一万束，否则拒收。正是这么大的收购数目，才使有权势的宦官、武臣之家有机可乘，从中渔利。

根治的唯一办法是改革不合理的收购制度！他进一步考虑，制度是为人定的，先前的制度是既得利益者自己制定时，为他们牟取好处大开方便之门，要想彻底刹住这股歪风，必须还要从制度本身入手，才能正本清源，既治标又治本。因此，他连夜修订了收购粮草的制度，准备按此颁布执行。

第二天，派人四处张贴告示，晓谕边民：凡粟十石、饲草百束以上的都允许告纳，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拒收。接着，刘大夏又整肃掌管收购权利的官吏，所交纳饷粮一律登记造册，由专人看管，定期将收购的数目上报有司，有不遵照执行者、贪污克扣者，一经查出，统统按律当处。

不到两个月，粮草就源源不断地收集上来，库存充裕，边民也

从中获得了一些好处。刘大夏功不可没，也因此得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

### 【简评】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的一种调整。

封建国家是人民的对立面，它所进行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不会代表人民利益的。但封建国家的改革，阻力常常不是来自百姓，因为这些被侵害利益的平民，不到活不下去时是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

封建国家的改革有时也会侵害一些权贵豪强的利益，由此而遇到的阻力常常令改革出现不同结果。

西汉景帝时，晁错针对诸侯势力增长、危害国家机器运转的情况，提出削藩的改革措施，结果招来诸王反对，自己也变成改革祭坛上的牺牲品。

刘大夏在宣府改革粮饷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地方豪强的利益，然而他却成功了。

刘大夏自己说，处理事情“以理不以势”。固然，刘大夏反对地方官吏贪污克扣粮饷，增加国家收入有其有理之处，但是如果他不掌握处理宣府事物的行政大权，会成功吗？

理与势，再加上术，都是不可偏废的。

## 巧用征兆防火

有时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在手段上尽可以不必苛求完美无

暇，甚至巧借一些无伤大雅的“欺诈”之术，在一定情势下，也应该是行得通的。

明孝宗时，京城经常发生火灾，损失惨重，但官、民仍疏于防范，往往真的遭到大火侵袭时，才去怨天尤人，追悔莫及。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傅马文升，对火灾却异常重视，时常告诫部下要多加防范，但收效甚微。他想，怎样才能让大家注意防火呢？许多人都认为他有先见之明，不妨利用人们对自己预测能力的信任，找个机会假传出现了火灾的兆头，不是能起到一些警示的作用吗？但这一招术，连他也不清楚是否能灵验。

弘治十一年(1498年)六月，一日清晨，有一只熊突然从京师西直门入城，惹得许多人都前去观看。马文升见机行事，马上告诫人们：“野兽入城，不是好兆头，应当严格注意武备库，及其它重要设施，以防止不测之事发生。”可是他想，这还不足以引起大家对火灾的重视，只有……。于是，他传来自己的下属、兵部郎中何孟春，与之说道：“熊不是吉祥之物，不能等闲视之。你尽可能去四处散布，就说：‘马尚书已预测出了，熊进京城决非吉兆，一定会有火灾降临！’何孟春怀疑地问：“如果众人不信怎么办？”马文升思忖片刻后，胸有成竹地告诉他：“你就如此这般说，众人一定会确信无疑！”

何孟春回到兵部，立即对同僚说：“熊进城是个不祥的征兆，会有火灾发生，应该注意防火。”起先，众官员都不信，何孟春便说，是马文升大人说的，然后又把马文升教给他的话学了一遍，许多人才相信。顿时，预测起火的讯息，就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城。

碰巧的是——不久，京城就有不少处发生火灾，连宫中都燃起大火，差点把乾清宫给烧毁。幸亏有人听了马文升的预言，早做了防范，再加上扑救及时，没造成太大的损失；但没有引起重视的一

些地方，却损失惨重，像礼部几乎被大火吞噬。这样一来，众人更相信马文升料事如神了。

那究竟何孟春说了什么，才让大家深信不疑的呢？原来，当有人追问起“你根据什么先兆就能断言要起火”时，何孟春便按照马文升事先教给他的回答说：“我不知道占卜一类的东西，但觉得马大人说的话确实有理。因为，我曾经读过《宋纪》，记得在宋高宗绍兴年间，永嘉(今浙江温州市)遭受火灾的前几天，有一熊来到永嘉城下，永嘉州知府高世则对他的副手赵允绦说：“熊”字为‘能、火’，郡中应该注意防火。后来，果然发生了火灾，大火蔓延，官民房屋的十分之七八都被烧毁。我正是根据这个记载，才相信马大人所预测的。”于是，众人不得不相信了。

至于为什么偏偏此时火灾绵延不断？恐怕是当时六月天旱无雨，易引起失火罢了！

### 【简评】

“防患于未然”，恐怕做什么事都离不开这条准则。火灾是人们最容易疏于防范的事，但它造成的损失却是难以估量的。马文升能预见火情，并非靠着占卜一类的把戏，而是出于一种未雨绸缪的防范心理。为了警醒人们的防火意识，他不惜采用预兆的“欺骗”手段，还引用古书的实例，来达到“防患”的目的。这是巧用了一般人容易迷信征兆的心理，把手段充分“合理化”的一种决策谋略。

## 张永计诛阉党

《说苑》中说：“谋先事则昌。”凡事都应经过周密的筹划，不然难以取得成效的。尤其是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的舞台，更需要“导演”预先进行策划、布局，然后才能“上演”出精彩成功的一幕。

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攻克了许多城市，告急文书雪片般地飞来。当时因刘瑾乱政，朝中能统兵的文臣武将寥寥，明武宗只得起用都御史杨一清，让他总制宁夏、延绥、甘肃凉州军务，令太监张永提督军务，前往讨伐。

杨一清与张永向西进发，途中谈论军务、国事，很是投机，经过初步试探，杨一清还发现，张永对刘瑾弄权也深为不满，不觉心中暗喜。原来，张永曾是刘瑾手下的爪牙，是“八虎”之一，后来两人有了龃龉，张永再说什么，刘瑾根本不信，甚至想方设法要把张永逐出宫去，幸亏张永巧于应付，才免于祸难。因此，张永对刘瑾一直貌合神离，结怨颇深。

一天，杨一清扼腕叹息，哭着对张永说：“藩王的祸乱容易消除，国家的内乱却难以预料，该怎么办呢？”张永问：“你指的是什么？”杨一清看他明知故问，便说：“这事您岂能忘怀一日！恐怕只是缺少为您出谋划策的人罢了。”张永诡秘一笑，示意把不好说出口的写在手上。于是，二人紧坐一起，各自在手上写了一“瑾”字。

张永这才打消顾虑，耳语道：“刘瑾日夜守候皇上身边，皇上一天见不到刘瑾就闷闷不乐。现在刘瑾的羽翼已经养成，耳目很广，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该怎么办才好？”杨一清略加思忖，便悄悄回答说：“您也是皇上宠信之臣，现在讨伐叛逆的重任不托付别人，却托付于您，可见皇上对您的信任。您若利用班师入京报捷的机会，借口要向皇上单独奏报平息叛乱之事，皇上必定向您询问。您在此时呈上安化王起兵反叛的文书，向皇上证明乱自刘瑾而起，并具体陈述刘瑾如何凶残狡猾，扰乱朝政，致使举国上下，无人不愁怨，天下大乱顷刻就要爆发。料想皇上英武，必能醒悟，以致怒而诛杀刘贼。一旦刘瑾被杀，皇上就会重用您，您再纠正刘瑾的倒行逆施，收拾人心，就同东汉末年的吕强和唐朝末年的张承业一样，建立不朽的功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马到功成，还怕不能

流芳百世么？”

一番话，说得张永喜上心头，但仍不无忧虑地说：“若事不成功，该怎么办？”杨一清又进一步劝说道：“若是别人向皇上进此言，事情成功与不成功，难以预料；此言若是出自您的口，必定成功。但是您在谈及此事时，必须谈得有条有理，把事情的开始经过都讲清楚。倘若皇上不信，您就叩头请死，表示愿意死在皇上面前，说完就退下。这样，刘瑾必定会被杀。但您还须记住：一旦得到皇上批准处死刘瑾，就马上施行，连片刻都不能延缓；如果泄露了机密，或当断不断，立刻就会大祸临头。”张永听后异常振奋，捋袖伸臂，起身说道：“我怎能爱惜自己的余生，而不去报答皇上呢？就依大人之言！”

等到张永奉旨还朝时，杨一清为他饯别，席间，特意用手指蘸着杯中余酒，又在桌子写了一个“瑾”字。张永点头会意，拱手作别。

这年八月，张永押解叛臣朱宸濠还朝，明武宗亲自到东华门迎接，赏赐饮宴，刘瑾业在席中坐陪。到了晚上，刘瑾显得坐立不安，先告辞退去。张永故意逗留，待人都散去的半夜时分，张永从怀中拿出奏疏，说了刘瑾专权激变宁夏、阴谋反叛的种种情状。武宗已有些醉酒，含含糊糊地说道：“先不说了，趁今日高兴，再多饮几杯吧。”张永仍不放松地说：“皇上不知，如今已大祸临头！若离开此地一步，臣就不能再见到皇上了。”武宗没醒过味来，醉醺醺地问：“朕不知刘瑾还能干什么？”张永说：“取天下。”“就任他去取吧！”武宗胡乱说道。张永紧逼不放，说：“那样的话，您皇上将置于何地？”武宗被他一激，不觉酒醒了一大半，吃惊地说：“刘瑾真有篡位之心？朕如此好待他，难道他真会负朕么？”

正说着，太监马永成进宫来报：“皇上不好了！刘瑾要造反

哩！”武宗慌问：“果真吗？”马永成说：“外面已多半知晓，只有皇上您还蒙在鼓里。再不动手，恐怕就成了人家的砧上肉了！”武宗这才下令派禁兵逮捕刘瑾。

时已三鼓，刘瑾正在熟睡，做着他的皇帝梦，忽然听到嘈杂的脚步声，刚要起身，便被赶来的禁军按住。张永走到近前，大声传旨道：“皇上有旨，速去见驾！”刘瑾知道大势已去，整冠更衣，昂首阔步地走出门去。走了没几步，就被禁兵捉拿捆绑住，囚禁到天牢。

第二天早朝，武宗将张永所奏，晓示诸位内阁大臣，有人奏道：“不查抄刘瑾府中，不足证明他谋反的真假，也难以让他服罪。”武宗觉得有理，便派锦衣卫去他的宅中抄查。除了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以外，还查出八爪金龙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盔甲三千副，弓弩五百个。武宗不禁瞠目大怒道：“好大胆的狗奴才！他果然谋反了。”立即将刘瑾交付监狱囚禁，又大肆搜捕其叛逆余党。随后，共罗列出刘瑾罪状三十余条，命法司锦衣卫把他押到午门，由廷臣一起审讯。

审讯时，刘瑾仍猖狂已极，大言不惭地说：“满朝公卿大臣都出于我的门下，谁敢审我！”群臣被刘瑾的威势所震，面面相觑，不自觉地慢慢向后退去。驸马都尉蔡震却站了出来，说：“我是皇帝的贵戚，不出于你的门下，可以审问你吗？”刘瑾无言以对。蔡震先指使左右卫士，抽打了刘瑾几十个耳光，然后厉声说道：“公卿大臣，是朝廷所任用的，为什么会由你任用？再说，你为什么藏匿盔甲？”刘瑾支吾一会儿，才吞吞吐吐答道：“这、这是用以保卫皇上的。”蔡震冷笑地说：“保卫皇上，须放在宫中，为何要藏在私人家里？再说龙袞蟒袍，也是你可以服用的？分明是图谋不轨，阴谋篡位夺权。这已昭然天下，你还有什么可辩的呢？”刘瑾哑口无言，只好低头服罪。

武宗听完廷讯，当即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并将其头悬在闹市，示众三天。众多被他害过的人，争相来买刘瑾的肉吃，不一会儿就抢得精光。刘瑾的亲属都被斩首，余党多被治罪。

### 【简评】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条谁也逃脱不了的法则，宦官刘瑾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要除掉这个受皇帝宠幸的佞臣，也绝非易事，需要精心谋划和随机应变。杨一清利用宦官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机智地劝说曾是刘瑾同党的张永，借安化王反叛的有利时机，向皇帝进言除奸。张永对武宗晓之以利害，又适时揭出刘瑾谋反的种种迹象，并当机立断，连夜捉拿刘瑾，不给他以喘息的机会。这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捉奸行动，似一气呵成，显得滴水不漏，正是智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我们应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谋划周全，不打无准备之仗，并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这样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单骑人险解仇怨

中国自古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处理好民族事物，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和解，是关系到治国大计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历史上出现许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明朝的郭绪就是其中之一。

弘治年间(1506—1521年)，云南孟密宣抚司与孟养宣抚司，为了土地之争相互构怨。起先，孟密宣抚司是占了木邦宣慰司的土地而设立的，但孟密宣抚思揲却侵占了木邦的其他一些领地，木邦屡次索还都被拒绝，不得不请孟养宣抚思禄出兵相助。思揲虽出于无奈归还了抢去的土地，可是杀了许多孟养的士兵，思禄咽不下这口气，又侵占了孟密的一些领地。这样，他们之间的怨仇越构越深，

以至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安宁。因而云南巡抚陈金，特派郭绪与副使曹玉、参将卢和前往调解。

郭绪是一位有胆有谋的将领，对这件棘手的外交使命，他显得胸有成竹，欣然接受了。他知道此行的关键是招抚孟养的思禄，一旦思禄同意和解，两家便会自动地息兵罢争。于是，他让卢和率领小部人马先行，自己随后赶到。

卢和在离两宣抚司不远的地方驻扎，然后派使者前去通报孟养宣抚思禄，但派去的人被扣留，还扬言要抓住卢和做人质。卢和吓得率军返回。半路上碰到了正赶来的郭绪，他向郭绪诉说了撤军的理由，极力渲染此行的危险程度，并劝郭绪打消去的念头。郭绪根本不为他说的所动，骂他是个“胆小鬼”，毅然要率军前往。而副使曹玉却吓得要命，借口生病要辞掉官职。郭绪一见也不勉强，索性单骑走险，完成使命。

他率领几个随从轻装前进，经过十几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金沙江畔的孟赖。他想：对这些当地的土著官员，动硬的显然不行，天高皇帝远，才不听你天朝使臣这一套呢？何况我又是单骑前来，还是好生抚慰，先解除他们对我的敌意，然后不偏不倚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于是他亲手写了言辞恳切的招抚文书，派人送过江去。

过了一天，郭绪正准备渡江时，当地许多蛮人听到此讯，纷纷赶过江来。因为他们对郭绪的到来很是惊讶，不相信地说：“朝廷的使臣竟然到这里来了吗？”又搞不清郭绪来的真实意图，所以带着长矛劲弩，率着象、马队，浩浩荡荡冲过江来，把郭绪等人重重围困起来。

郭绪的随从都很害怕，请求郭绪不要再前进了，在此坐等孟养

那边来的消息。可是郭绪想：如果此时退却了，岂不显得我们理不直、气不壮吗？而这样单枪匹马过江，正说明我是和平的使者，反倒不会有什么危险。想到此，他拔出佩刀来，厉声说：“明天我一定过江，谁敢阻拦就杀了谁！”随从一见此状，都慢慢退了下去。

这时，有人来报：“思禄派来的大酋长到！”郭绪闻听大喜，心里说：大功告成了！他连忙把酋长请进帐里。叙礼后，酋长向郭绪转达了孟养宣抚思禄的意思。

原来，起初思禄对郭绪派卢和带兵前来充满了不信任，看到卢和措辞强硬的书信后更增加了敌意，一怒之下，把使者扣留了。后来，见到郭绪的亲笔信，不觉为文中的深明大义和晓以利害所打动，又听说才来了几个人，便放下心来，于是派手下的酋长带着厚礼前来慰问，自己也随后赶到。

不多时，思禄率领几位酋长来到了，郭绪出帐迎接。分宾主落座后，郭绪不紧不慢地说：“烦你能亲自前来谢罪，又带来这么多礼物，看来是真心反悔了！关于你与孟密宣抚思揲引起纷争之事，事出有因，也不能完全怪你，但你拥兵自重，抗拒朝廷使臣的做法就太过分了。此次我奉命而来，并非要追究谁的责任，主要想为你们两家调解纠纷，永修和好。”

众酋长听了这番话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都伏倒在地上山呼万岁，并主动提出归还侵占孟密的土地。

第二天，在郭绪的主持下，孟密宣抚司宣抚思揲与孟养宣抚司宣抚思禄，在有归还土地、赔偿损失等条款的协议上签了字，并发誓永世修好。

完成使命后，郭绪带着放回的使者和随行人员返回了。

## 【简评】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并不平等。由于长期的民族冲突。一些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并不信任。因此，要想处理好民族事物，就必须得到他们的信任，要想得到他们的信任，就得表现出相当的诚意。

《三国演义》中有个“七擒孟获”的故事。诸葛亮为了使南方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心服口服，对他七次生擒，七次放还，终于将他感化，发誓永不与朝廷为敌。

郭绪为了表示促进民族和好的诚意，只身单骑深入险境，终于取得了蛮族的信任，完成了使命。

诸葛亮、郭绪所表现的“诚”，既包括不畏艰险的大勇，也包括随机应变的大智。

## 杨廷和设计除佞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当中国封建王朝的头子“驾崩”之后，好些时期出现了许多“秘不发丧”的情形。秦始皇出巡突然身亡，李斯与赵高的假传遗诏、瞒天过海，可以说是肇其端。明代中叶武宗的猝亡，也必须“封锁消息”、“不许外传”，此中因由，扑朔迷离；国丧之中，又隐藏着怎样一派刀光剑影、咄咄杀机？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突然去世，朝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大臣知道此事。当时张太后一直守候在身边，见武宗咽气后，马上封锁了消息，严令任何人先不许外传。因为朝廷正逢多事之秋，宁王的叛乱刚刚被平定，江彬等奸佞之徒仍在不断地兴风作浪，随时准备抢班夺权，一旦他们获知武宗死去的消息，必定要提

前发难。当今最紧要的是扶新皇即位，以定人心。于是，张太后立即召来大学士杨廷和，商议立储之事。

杨廷和深受太后信任，也想在此生死危亡之际，为朝廷立下汗马之功。他示意太后屏退左右，然后悄声说：“江彬狼子野心，谋反之意已昭然若揭，若得知皇上晏驾，必会勾结外藩，借机兴兵作乱，那将不可收拾。请太后要早作防备！”太后心里一阵慌乱，忙问：“那该如何是好？”杨廷和出主意道：“如今只有秘不发丧，先定下大计，等新皇登基后，再慢慢图之。”太后闻听，也顾不上伤心了，马上着手安排此事。

杨廷和与内臣商议决定，草拟出皇帝遗诏，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熹为帝，即明世宗。然后，由太后发出懿旨，告谕群臣。紧接着，杨廷和又以先皇遗诏的名义，解散了由江彬提督的各威武团练营，招来的边兵一律发放银两遣散归乡。这样，很快就使政局趋于平稳，并削弱了江彬等人的实力。

再说江彬，直到此时，才得知武宗已经逝去，自己统领的团练营被强行取缔。他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恼恨地说：“皇上真的归天了么？这帮混帐大臣，瞒得我好紧哩。又削我兵权，真要反了不成广都督李综恰好在旁边，便趁机献计道：“太后等人如此封锁消息，恐怕对我们早有戒备，说不定已经筹划妥当了。不如先下手为强，速速调兵起事，如果侥幸能成功，自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万一不成，还可以撤到塞外，保全自己的势力。”江彬犹豫不决，即传来党羽许泰商议。

许泰也正为此事伤脑筋，踌躇再三，才对江彬说：“杨廷和老奸巨滑，他们既敢遣散团营的兵马，想必已作好周密的部署，防备森严，有恃无恐，千万不可草率从事！依我之见，还是慎重为好。”江彬表示同意，说：“要不先探探虚实，再行动也不迟。”许泰自告奋

勇地说：“且让我前去一探，不知可否？”江彬点头同意。

许泰从江彬处出来，直奔宫中，半路恰巧遇到杨廷和。杨廷和一下就猜到许泰此行的目的，便想将计就计，引江彬等人上钩。他故意装作尴尬的样子，和颜悦色地说：“许伯爵来的正好，因皇帝猝然晏驾，头绪纷繁杂乱，真忙得我们几个不可开交。一直想邀诸公进宫商议，定夺一些实难抉择的大事，像皇帝遗诏上的罢团营、遣边兵一类的事，都需要仰仗您和江提督呀。但一方面事情紧急，不容商议；另一方面此事涉及到江提督，怕一时难以接受，故未敢惊动诸公，望多多包涵！”许泰忙说：“江提督也正为此事挂虑，特派兄弟前来探问，究竟关系军国大事，不知怎样裁夺？”杨廷和回答说：“奉太后之旨，已去迎立兴献王世子了。但还需要多日才能迎到，加上国事繁重，百废待兴，我几人毫无把握，请伯爵大人务必转告江公，能否与诸公同来，商定机宜，共辅新王登基。”许泰欣然允诺，告别而去。

杨廷和料定他会中计，连忙招集司礼监魏彬，及太监张永、温祥，四人共入密室，促膝谈心，实则商议对付江彬等人的办法。

杨廷和等众人坐定后，先开口说：“立储大事，在太后主持与诸位公公的鼎力相助下，已圆满解决，可免此一虑。但大患并未消除，仍危及社稷之安，我们几位大臣力单势薄，恐难独撑局面，只好仰仗各位先帝近臣，挽乾坤于既倒，建奇功于后世。但不知有何良策？”魏彬问道：“今杨公所说的大患，莫非指那‘水木’偏旁之人么？”未等杨廷和回答，张永接过话题说：“何不从速诛杀此奸贼？”杨廷和拱手说道：“过去诛杀刘瑾奸党，就计出张公，如今又要仰仗您老人家的神机妙算了。”张永微笑不答。杨廷和又将与许泰所言重叙一遍，然后耳语说：“这般，这般，可好么？”张永点头称好，再转告魏彬、温祥，二人都拍手赞成。计议已定，他们就去分头准备。

次日，江彬带着卫士，跨马前来，准备入宫到武宗灵前哭祭。

魏彬事先在宫门等候，见江彬来到，便上前恭迎道：“江公，请稍候！坤宁宫刚落成，正要安置大殿上的兽吻，昨已奉太后旨意，让几位近臣及工部前来致祭，江公来的凑巧，可前去祭拜。”江彬内心欢喜，说：“太后旨意，哪敢不从！”魏彬假去通报，在宫中转了一圈，捧着太后懿旨出来，宣读令提督江彬等恭行祭典等语。江彬连忙领旨，换了服饰，入宫祭拜武宗亡灵。

江彬祭罢出宫，却被太监张永拦住，说：“我已在此守候多时，专门为你备下酒席，请务必赏光！”说完，拉着江彬的手就走。江彬推辞不过，只好到张永住的宫室内饮酒。

酒过数巡，江彬已有几分醉意，正要说上几句贴进的话，却突然闻听太后旨到，要将江彬捉拿下狱。他推案而起，随手扔掉酒杯，大踏步地向外奔去。等跑到西华门，才发现宫门已上锁，又转身向北飞奔，将近北安门时，远远望见城门幸好开着，刚要穿门而出，却被四处埋伏的守城卫兵，团团围住，门卫官大声说道：“奉旨留下提督，不得擅自出宫。”江彬叱骂说：“你们奉的是哪家的旨？分明是谋害先帝功臣。还不滚开！”话音未落，众兵士一拥而上，将他掀翻在地，牢牢捆绑起来。江彬被逮以后，又接连把他的同党许泰、李综等人下到狱中。不久，江彬就被在闹市中车裂处死。

### 【简评】

历代奸佞之臣，往往在庇护他们的“主子”死后，才能得到应有的惩处，但也常常会引发大的骚乱。为了防止武宗皇帝死后的变故，杨廷和为皇太后大胆谋划，采用秘不发丧这种非常时期不得不实施的非常手段，赢得了确立新皇帝的宝贵时间，使动荡的政局趋

于相对平稳，也掌握了今后斗争的主动权。但除恶必尽，杨廷和先托皇帝遗诏，靠解散团练营的方式来削弱奸党手中的兵权，然后巧妙地利用宦官与奸党之间的矛盾，把党魁江彬骗进宫里擒获，最终将其党羽一网打尽，为和平移交权力铺平了道路。因此，谁成功地掌握和运用了谋略，谁就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计杀文龙

搜刮民财的贪官、横行乡里的恶霸是社会的疾瘤。治理国家、社会，往往要先向他们开刀。

但是，割除社会疾瘤也不可鲁莽行事，因为这些人或有后台，或有势力。因此，整治者也要讲究一些谋略。

崇祯元年(1628年)，明怀宗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等地的军务。在袁崇焕入朝受职时，明怀宗专门向他问起有关辽东的方略，袁崇焕回答说：“陛下若能给臣五年权力，让臣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就可以收复整个辽东。”明怀宗欣然允诺，并赐予他尚方宝剑，让他在特殊情况下，有自行处理事务的权力。

袁崇焕在赴辽的一年时间里，坚固城池，修筑了大量城堡，还在戍边的军队中开展屯田制，搞得颇有起色。但镇守东江的左都督毛文龙，却拥兵自重，仗着自己势大位尊，不受袁崇焕的节制。他曾多次拒绝袁崇焕提出的派官监督军饷的建议，并口出狂言，似乎他不在袁崇焕之下；因此，袁崇焕决心要除掉这一心头之患，以解后顾之忧。

毛文龙原是明军一位将领，曾以都司身份援助朝鲜，后就在辽东驻扎。不料辽东失陷，他从海上逃回后，却乘虚攻破镇江，杀死

后金守将，被提升为总兵。以后居然时来运转，不断受到提拔，竟官至左都督，挂将军印，受赐尚方宝剑。而且还特许他同内地一样在皮岛设置军镇。皮岛又称东江，因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可以与登州构成犄角之势，阻止后金南下，故才得此殊用。

但毛文龙并无雄才大略，与后金交战时屡吃败仗，而每年却糜费无数军饷。他还常做一些不法之事，诸如侵盗军粮、擅开边市、剽掠商船、强娶民女之类，阉党魏忠贤未倒台时，也多次与其贿赂交好。不少人曾上疏参劾他，但因受到兵部的庇护，被强行压了下来，以至他仍逍遥法外。

袁崇焕决计要除毛文龙之后，便假借阅兵为由，带领精兵强将前往东江。毛文龙不知他此行的目的，虽然表面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他，但暗中却处处小心提防。袁崇焕看出毛的心思，故意显得格外谦和，还装出很投机的样子，常与其宴饮到深夜，很少谈及军务。没过几天，毛文龙就打消了疑虑，不再加以防范。袁崇焕见时机已到，就主动邀毛文龙去山上观看将士们射箭，并提议只带几个亲随，不要让卫兵跟护左右。毛文龙不知是计，一口应承下来。

第二天五更时分，袁崇焕召集自己的将校，向他们密授机宜，然后趁着晨光熹微时，便率众上山，等一切布置停当，才派人去催促毛文龙。

毛文龙匆忙起身，草草盥洗一番，就带着几个部将、亲随，赶上山去。

此时天已大亮，袁崇焕正立马在山上等候，见毛文龙匆匆赶到，忙下马来迎。不等他上前参见，便笑容可掬地说道：“不必多礼，还是一同上山吧！”说完，挽着他的手，拾级而上，不一会，就到了半山腰。跟随毛文龙前来的部从，被袁崇焕的卫兵挡在了此

处，不得再继续前行。

二人携手并进，袁崇焕故意对毛文龙说：“明天我就要回去了，今日特向你辞行。毛公担负海外重托，劳苦功高，请受我一拜。”说着，即要停步跪拜，吓得毛文龙慌忙阻拦，答礼不迭。这时已走到帐外，二人鱼贯而入。

等坐定之后，袁崇焕突然变色，喝道：“还不将此人拿下！”几位彪悍将士应声而出，将毛文龙牢牢捆绑起来。

毛文龙大声呼道：“我何罪之有，要将我拿下？”袁崇焕历数了他的十条罪状，然后说：“你抗命不遵，违背我意还是小事，但置朝廷大业于不顾，心中早已没有了圣上，仅凭此条，即罪当处斩。”毛文龙忙跪在地上，叩头请求免死，袁崇焕不由分说，取出尚方宝剑，立即将其斩首。

袁崇焕随后率众下山，晓论文龙部将说：“罪只毛文龙一人，其余众将当免。”并找来毛文龙之子，好生抚慰道：“你父有违圣命，所以才将其正法，你本无罪，可代领你父之职，镇守此处。我会在圣上面前极力保举你的，将来再立功业，以光宗耀祖。”接着，他又周密安排了岛上防务事宜，怕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

临离岛之时，袁崇焕命杀牲祭奠文龙，还亲自到灵前哭拜说：“我虽斩杀了你，但那是出于朝廷的大法，不得不为之；今日在此祭拜你，是为了僚友之情，以慰在天之灵。”说完竟流下泪水。

再说怀宗皇帝接到奏报，得知文龙已被处斩，极为震惊，但因要仰仗袁崇焕抗击后金，故未去追究，还好言安慰了他一番。后来，此事终成为袁崇焕的死罪之一。

“先斩后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古来有之的一种“特

权”和计谋，它为部属独立行使权力和决策开了绿灯。袁崇焕是明代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将领，深通谋略，胆识过人。他正是利用了皇帝所赐的这种特权，才演出了一出计杀恶官毛文龙的好戏。对握有兵权的毛文龙，他先是以礼相待，麻痹其戒备心理，然后以观看将士射箭为名，将其骗上山去，又当机立断地加以诛杀，等奏报时已既成事实，也就只能应允了。这是处事之计。尤其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后，用抚慰其子、到灵前哭奠等方式，达到收买人心、稳定局势的目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政治谋略？

### 【简评】

武器，是人物质上的武装；警惕性，是人思想上的武装。

消灭敌人，首先要解除其武装；政治斗争，消灭政敌，往往要先以种种方法使其丧失警惕。

三国时，司马懿与曹爽互为政敌，司马懿利用装病的办法，使曹爽放松了对他的戒备，然后突然发动政变，置政敌于死地。袁崇焕计除毛文龙，也是首先麻痹毛文龙的戒心，然后采取行动，只不过所采取的方法与司马懿不同罢了。

## 高拱设计抚土官

军事上有“穷寇勿追”一说。这是因为敌人败退，以求生路。若连此唯一生路都要堵上，对方只好拼死挣扎，闹个鱼死网破。给出路不但用于军事，其它事情也如此。明朝高拱在处理贵州民族问题时，也采取了给出路的策略。

隆庆年间(1567——1572年)，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仇杀，地方秩序大乱。安国亨袭父官职、任宣慰司后，听信小人的谗言，借故将安万铨之子安信杀死，当时安信之兄安智却与其母别居

安顺州，听到安信被害的噩耗，便发誓要替兄弟报仇，但自己兵力有限，只好密告安国亨谋反，想借刀杀人。

巡抚王诤急向总兵安大朝请兵，要前去征讨安国亨，安智忙给安大朝出谋划策，还答应供应其粮草，并出兵相助。不想安智没有履行前诺，使征讨的兵马半路受阻，被安国亨所败。安国亨虽一时取胜，但内心十分恐惧，就遣使去朝廷乞求饶恕。朝廷未加应允，只委派阮文中代为巡抚，赴贵去戡乱。

阮文中临行前，特意去拜谒大学士高拱。高拱对贵州土官的内情知之甚深，告诫阮文中道：“安国亨并不会反叛，此次赴黔，一定要以安抚为主，千万不能激变！”他见阮文中尚有疑问，便进而分析说：“安国亨胸无城府，是受群奸拨弄挑唆，才杀死安信的。安智复仇心切，才故意状告安国亨谋反，是想借官军之手，达到除掉仇人及独霸一方的目的。王巡抚偏听信了安智的一面之辞，起兵征伐，才导致安国亨的抗拒不从。这很难构成叛逆的罪名，充其量只是拒捕。何况他们之间是部族间的仇杀引起的，矛头并未指向朝廷，我们大动干戈，兴兵征讨，只会激起真的兵变，到时再平息下来就不易了，而这对朝廷又有何益？自古权谋之士都懂‘张弛’之道，对夷族的治理，安抚比武力征服有时更见奇效，况且是尚未酿成祸乱之时呢？你此次前去，应审时度势，秉公处理二安之间的仇怨，尤其对安国亨，不能加之以谋逆之罪，要以仇杀和违拗相处罚，逼其改过从善，听命服法。这样方可使其服心，也不会再有谋反之意了。”

阮文中茅塞顿开，于是，他拜别高拱登车启程。到达贵州以后，阮文中经过秘密走访，摸清了事变的来龙去脉，果不出高拱所料。他平心静气地给安国亨致书一封，没有加之任何罪名，只是提出五个具体条件，其中包括：责令安国亨交出拨弄是非、挑唆作乱之人；按照当地习俗赔偿安信等人命所需；令其分出属地安置安信母子等，最后又明言相告，若无条件照办的话，可免其罪，不然，

定要奏明朝廷，严惩不贷。并约定安国亨来省中谢罪，延误期限按抗命不从、罪加一等处罚。

安国亨见到书信后，心有所动，想：这位新巡抚能秉公办事，所提条件也能令人接受，看来的确是要赦免我的罪过。但他又一想：安智岂肯善罢甘休？如今长居省中，仍在四处游说，何况我终归有谋反之嫌，与官军交过手，朝廷真能免我死罪吗？可能阮文中使的是缓兵之计，要诱我放松警戒，然后再徐图谋杀之。安国亨越想越怕，干脆放弃谋求赦罪的打算，只是上疏极力为自己申辩。

阮文中见安国亨仍拥兵自重，不知悔改，心里很是恼怒，便奏请朝廷，以大兵进剿。

高拱得知此事，心里也犯难了，一方面进剿决非长远之计，弄不好激起更大的骚乱；但安国亨又不听安抚，若不加惩处，难以服众不说，也有损朝廷的天威。如何是好？他反复权衡利弊，还是决定以安抚为上策，不到万不得已，不加以武力。于是，高拱授意兵部，让他们出面保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要他出使贵州，勘察安国亨一案。

安国亨本想在劫难逃，已做好拚死抵抗的准备，没料想，听说朝廷又派给事中前来复勘，不禁大喜过望，说：“我是奉旨前去听候勘察，巡抚一定不敢擅自杀我，我可以辩明原委，请求宽宥。”因而，安国亨主动交出唆使作乱的元凶，一同携其到省城听审。

阮文中仍不加深究，只是让安国亨一一答应所提的条件，并彻底悔过。安国亨表示真心服法，并愿罚银三万五千两以自赎其罪，还允诺割地以妥善安置安智母子。安智却耿耿于怀，执意不肯就此了结，直至阮文中将拨弄离间的罪魁祸首正法，免去安国亨的官职，才无话可说，不再追究了。宣慰司一职，由安国亨之子袭任。

朝廷派来的给事中还未抵达贵州，此事已得到平息。

### 【简评】

善用兵者，能以交为谋，以交代兵，用和平手段取代武力征服，以换得长治久安。高拱能站在战略的高度审视局势，对贵州土官之间引起的仇杀，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并主张以计来安抚，达到息事宁人、保民安境的目的。他先是面授机宜，教新巡抚阮文中不要滥用罪名，这会逼迫安国亨采取铤而走险的手段，使局面愈加复杂。正是听了高拱之策，阮文中才慎重行事，没有造成激变。当安国亨心存疑虑，暂时不肯接受招抚时，又是高拱提议派给事中贾三近前往调解，终于使安国亨回心转意，平息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不然，要动用多少兵马、耗费多少粮饷，才能打赢这场本是部族之间引发的战争呢？因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处理因纷争引起的冲突上，如何因势利导，不使矛盾激化，不妨借鉴一下前人的谋略。